

● 邓小平理论与广东实践研究丛书

用改革精神建设党

曹子鑣 周其若 著
张小杰 任宝根

广东人民出版社

用改革精神建设党

——邓小平执政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曹子铤 周其若 著
张小杰 任宝根

广东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梁 钊

责任编辑：曾宪志

责任技编：黄秉行

责任校对：曾宪志

资料校对：林 松 林晓琼

封面设计：迪 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用改革精神建设党：邓小平执政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曹子鑣等著. —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12

（邓小平理论与广东实践研究丛书）

ISBN 7-218-02071-2

I. ①用… ②邓…

Ⅱ. 曹…

Ⅲ. ①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 ②邓小平-党的建设

Ⅳ. D26

用改革精神建设党

——邓小平执政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曹子鑣 周其若 张小杰 任宝根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世纪电子媒介有限公司排版

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1995年12月第1版 1996年4月第2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0.375 插页：2

字数：216千 印数：5,001—8,000册

ISBN 7-218-02071-2/D·249 定价 24.00 元

《邓小平理论与广东实践研究丛书》编委会

主 编：于幼军

副主编：张难生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于幼军	马恩成	刘 嵘
刘斯奋	刘景泉	李权时
李新家	张 井	张难生
张 磊	周燎刚	钟阳胜
柯木火	高齐云	梁 钊
黄家驹	曾牧野	

总 序

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当今时代特征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它初步系统地回答了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基础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长期困扰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成为新时期中华民族团结奋进、改革创新、繁荣振兴的精神支柱。正如江泽民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党的十四大提出了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这是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的迫切需要，是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重大措施，也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根

本保证。”^①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下简称“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这项战略性任务做得怎样，能否落到实处，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兴衰成败、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因此，必须把深入学习、宣传和研究邓小平理论作为长期的战略任务，认真组织实施，不断拓展深度和广度，务求取得实效。

邓小平理论从实践中产生，又指导了实践。同全国一样，广东 17 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走过来的，是对邓小平理论的实践。邓小平同志非常关心、支持广东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1984 年，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珠海时亲笔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珠海经济特区好。”^②1992 年春，邓小平同志到南方视察，在广东发表许多重要谈话，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大胆地闯，判断改革开放的标准主要看“三个是否有利于”；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① 江泽民：《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 3 卷报告会上的讲话》，见《人民日报》1993 年 11 月 4 日第 1 版。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10 月第 1 版，第 51 页。

不等于资本主义；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我国的经济的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发展才是硬道理；要坚持两手抓，两个文明建设都搞好了，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点，消除了多年来困扰人们的疑虑，排除了干扰，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指明了方向。他还勉励广东力争用20年时间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一切给广东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广东自觉地把邓小平理论同广东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取得了新的进步。如果没有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指导，没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广东绝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广东在实践邓小平理论方面走在前面，为深入研究邓小平理论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广东的理论社科界有责任在研究邓小平理论方面多作努力，多出成果，作出应有的贡献。运用邓小平理论总结广东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就和经验，又根据广东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体会和经验来充实和丰富邓小平理论，这对于我们加深对邓小平理论的理解，更自觉地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实现用20年时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雄伟目标，具有重大的意义。基于这种认识，我们从1994年冬开始策划、组织广东理论社科界和党政机关近百名的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撰写《邓小平理论与广东实践研究丛书》，并努力使这套丛书做到求真、求

实、求深、求新。求真，就是要认真钻研邓小平原著和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著作以及党的文献，力求全面、准确地把握和领会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求实，就是用实事求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实际出发的思维方法去研究和阐述邓小平理论的思想观点，并总结、概括广东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求深，就是力求立足广东，胸怀全国，放眼世界，尽可能吸收各方面最新最有价值的信息和成果，做到理论分析有深度，有说服力。求新，就是鼓励大胆探索，勇于创新，认真研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热点难点，提出有价值的新见解。经过一年半的努力，现在这套丛书的第一批和读者见面了。我们期望这套丛书有助于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进一步深入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理论，并学以致用，用以指导自己的思想方法，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指导各项工作的开展，为把2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两个文明全面进步的宏伟蓝图在南粤大地变为现实而努力奋斗！

《邓小平理论与广东实践研究丛书》编委会

1995年12月

序

于幼军

执政党建设的理论，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事情要办好，“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①而要把党建设好，就必须有一个科学的理论为指导。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立足于我们党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建党学说，创造性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381页。

地提出了一整套执政党建设的理论观点和思想主张，初步地解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如何走出一条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求的党的建设的新路子等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现实课题，从而把无产阶级政党学说大大地推向前进，为新时期搞好党的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科学指南。

邓小平同志关于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包含着十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已初步形成了比较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

首先，确定了执政党建设的总体目标，为新时期搞好党的建设指明了正确的努力方向。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按照马列主义的建党原理和原则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这是整个党的建设历史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的根本目标和方向。但是，党的建设总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党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不同，党的建设的具体目标和要求也需要随之做出相应的充实、调整。在执政以前，我们党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中，面临着发展、壮大力量，夺取全国政权的历史任务。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从这一形势和任务出发，提出了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

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①的党，使党的组织成为“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②并围绕着这一目标，卓有成效地开展党的建设，为夺取全国革命胜利提供了关键性的保证。

执政以后，特别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初步确立、阶级斗争已不再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新阶段，由于受“左”的错误思想影响，我们党逐渐形成了一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并相应地提出了一个错误的“五十字建党方针”，即“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在这一错误的路线和建党方针的指导下，党的建设偏离了正确的目标和方向，党的事业遭受了严重损失。

总结、吸取了历史的经验教训，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指出：要认真地研究解决“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③等事关新时期党建工作的目标和方向的重大问题。在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全面拨乱反正，端正党的思想路线，逐步形成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60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3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276页。

点”政治路线的同时，邓小平同志娴熟地运用毛泽东建党学说关于党的建设必须紧密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开展的基本原理，明确地提出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总体目标，就是要努力“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①这一目标的确立，从根本上扭转了执政党建设的方向，使党的建设重新走上了正确的发展轨道。

其次，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一系列基本方针和重要原则，全面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把党建设成为合格的无产阶级政党？怎样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围绕上述问题，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和思想主张，为新时期搞好党的建设确定了一系列基本的方针和原则，全面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

——在党的领导问题上，邓小平同志明确地指出：“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②他认为。党的领导应该是大政方针政策的领导，党委要“管大事”、“抓方针”。他强调，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逐步理顺党政关系，实行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9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68页。

党政分开；必须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完善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必须遵循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原则，走依法治国的路子；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中心，保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和各项工作的全面进步；等等。

——在党的思想建设方面，邓小平同志大力倡导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统一，恢复和发展了党的正确思想路线。他提出了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①等思想，促进了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他提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②从而为我们党在新时期全面正确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开展反对错误思想和倾向的斗争指明了方向。

——在党的组织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方面，邓小平同志重申要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在充分发展民主的同时坚决维护集中统一，特别要维护党中央的权威；他提出了新时期干部队伍建设的“四化”方针，强调要把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并有政绩的人大胆选进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构里，大力推进并实现了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集体交接班；他亲自倡导和推行干部人事制度的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

改革，提出要建立起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有效机制。

——在党的作风建设方面，邓小平同志立足于执政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提出要把党风廉政建设摆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突出位置，坚持不懈地切实抓紧抓好。他认为，端正党风要先从领导干部做起；党风廉政建设一靠教育，二靠法制；要贯彻“从严治党”的方针，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坚决惩治腐败分子。

.....。

第三，屏弃了过去靠搞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来建设党的思想和做法，初步开创出一条依靠改革和制度建设开展党的建设的新路子。

在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以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曾经是我们党进行自身建设、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的主要方式方法。实践证明，这种方式方法“后遗症”很多，并且已无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继续沿袭这种方式方法，将会妨碍党的建设的胜利开展和党的领导作用的正常发挥，将会给党的事业造成危害。为此，必须努力探寻新时期执政党的建设新的有效途径。早在1980年8月，邓小平同志就发表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高瞻远瞩地指出：与领导者个人的思想、作风相比较，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更带有根本性、全

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①在此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讲话中，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在党的建设方面要高度重视和发挥制度建设的重要作用，要坚决革除现行制度的弊端，逐步建立健全党内各项规章制度，包括领导制度、干部制度、组织生活制度、党风廉政建设制度等。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党的十三大明确地提出了要在党的建设上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从而使党的建设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了创造性的新贡献。

此外，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一些怀疑、否定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的错误言论和思潮，邓小平同志还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多种角度进行了批驳，充分有力地论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既是党的性质、宗旨和特点所决定，也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更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现实要求。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会有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今天，也不可能有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明天。

《用改革精神建设党》一书，比较准确地把握住邓小平同志执政党建设理论的时代特征和精神实质，较为系统、全面地概括论述了邓小平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基本内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

容及其在实践中的运用。与其他同类的论著相比较，该书能够突出改革精神，篇章框架设计较为合理，比较注意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对邓小平执政党的建设理论的源流，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建党学说的概述较为清楚，特别是在论述邓小平同志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建党学说方面，能够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状况和要求出发，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观点鲜明，有说服力。

当然，如前所述，邓小平执政党的建设理论包含着十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对这一理论的学习、研究，需要不断地往深度和广度拓展。在这方面，本书的作者还需要作进一步的努力。而且，在理论联系实际，运用邓小平同志执政党的建设的思维方法和理论观点，去总结、概括广东改革开放中党的建设的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探索、研究新时期党的建设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等方面，该书也尚有一定的差距，希望作者今后能作进一步的探讨研究。

1995 年 12 月于广州

《邓小平理论与广东实践研究丛书》

- 《社会主义学说的第三次飞跃》
- 《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哲学基础》
- 《唯物辩证法的运用与发展》
- 《邓小平市场经济理论与广东实践》
- 《社会主义本质与广东所有制改革》
- 《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与广东实践》
- 《深圳经济特区的探索之路》
- 《“一国两制”与香港》
- 《三步走发展战略与广东现代化建设》
- 《邓小平共同富裕理论与广东山区建设》
- 《邓小平精神文明建设理论在广东的实践》
- 《用改革精神建设党》

目 录

序	于幼军 1
总 论	1
一、邓小平执政党的建设理论形成的历史条件	3
二、邓小平执政党的建设理论的基本架构	9
三、邓小平执政党的建设理论的基本特征	14
四、研究和学习邓小平执政党的建设理论的意义 和方法	16

领导篇

第一章 坚持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和现实的要求	23
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	24

党的诞生，使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从此有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理论为指南	26
党的诞生，使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从此有了一个正确的行动纲领和崇高的奋斗目标	27
党的诞生，使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从此有了一个组织严密、作风严谨、纪律严明的先锋队为领导	29
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现实要求	31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始终保持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	32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健康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既生动活泼、又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	34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包括了经济富强、政治民主和精神文明三个基本目标。坚持党的领导，是这三个基本目标的内在必然要求	38
第二章 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	46
一、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	47
坚持党的领导是改善党的领导出发点和归宿；改善党的领导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党对社	

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	47
努力改善党的领导，既是党的事业不断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从党的现状和党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出发而得出的科学论断	50
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把握正确的方针、原则	56
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的有机统一	56
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各级党委要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	61
遵循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原则，走依法治国的路子	65
改善党的领导，还必须掌握运用“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方针，保证两个文明建设和各项工作的协调发展	70
第三章 逐步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实行党政分开	74
一、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实行党政分开，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又是现实形势的要求	75
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后，如何建立起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国家政权的关系，这是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长期未能解决好的重要问题	75

逐步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实行党政分开, 是新时期改善党的领导,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 关键	79
二、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实行党政分开, 必须把握正确的方向和步骤	83
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实行党政分开,不 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而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加强 党的领导	83
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实行党政分开,不 是对党的传统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的全盘否定, 不能照搬西方国家那一套,而必须立足于本国国 情,有所继承,有所借鉴,有所创新	86
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实行党政分开,既 要积极、大胆、坚决,又要循序渐进,不能操之 过急	89
第四章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改善党的领导的重 要内容	93
一、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94
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丢掉思 想政治工作就会使我们党丧失政治优势	94
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是新时期改善党 的领导的一个最主要方面	96
二、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和总体 目标	102
教育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做“四有”	

新人，是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和总体目标·····	102
在培育“四有”新人的任务中，要特别强调理想和纪律，重点抓好对青少年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纪律的教育·····	103
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努力学习掌握科学文化知识，也是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	105
三、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正确的方针、原则·····	107
党的建设必须围绕党的基本路线进行，这是党的建设基本规律，也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总方针·····	108
搞好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革命精神与物质利益相结合·····	109
搞好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思想教育与健全制度、严肃法纪相结合·····	111
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发扬民主，以理服人，不能搞政治运动，以势压人·····	113
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密切联系实际，敢于正视现实，增强针对性·····	115
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解放思想，创新方法，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117
恢复和健全思想政治工作机构，建设一支忠诚于党的事业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才能为新时	

期思想政治工作提供切实有力的保证	118
第五章 按照“四化”方针建设干部队伍，培养	
选拔接班人	121
一、“四化”方针的确定，为新时期干部队伍	
建设指明了方向	122
按照“四化”标准，建设一支能够胜任领导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党的干部队伍，是	
新时期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	
问题.....	123
“四化”方针的逐步形成和完善发展，为新	
时期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确立了目标，明确了方向	
.....	126
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一个紧	
密联系、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是党的任人唯贤、	
德才兼备干部路线在新时期的具体运用和发展	129
二、突出抓好领导班子建设，顺利实现第二、	
三代领导集体的交接班	133
立足于新的形势、任务和领导干部所处的特	
殊位置，对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思想工作作风	
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	134
把培养选拔接班人当作老同志的首要责任，	
顺利地推进并实现新老交替，完成党和国家领导	
权的集体交接班	142
三、改革不合理的干部制度，建立起有利于优	
秀人才脱颖而出的有效机制	148

现行干部制度的弊端,主要是官僚主义现象、 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 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149
改革和完善干部人事制度,使党的干部工作 逐步走上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为优 秀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	152
第六章 发展统一战线理论,完善多党合作制度 ...	156
一、新时期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	157
历史经验教训表明,统一战线的兴衰与党的 事业成败息息相关,什么时候用好了这个法宝, 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什么时候忽视或丢弃这个 法宝,党的事业就遭受挫折和失败	157
新时期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 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不是可以缩小,而是 应该扩大	159
二、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性质、范围和任务	161
新时期统一战线,已经发展成为全体社会主 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 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	161
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 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现代 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完成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 宏图大业服务	163
三、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 政治协商制度	167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167
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根本方针，同各民主党派建立起真诚相见的诤友关系	170
人民政协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实现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的重要组织，也是我们政治体制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实行互相监督的重要形式	172

建设篇

第七章 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关键是把党的

自身建设好	177
-------------	-----

一、中国的事情要办好，关键是我们共产党

内部要搞好	178
-------------	-----

中国的事情要办好，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这个论断，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	178
--	-----

只有把党的自身建设好，我国现代化建设才会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才能动员和组织亿万人民艰苦创业，团结奋斗	180
---	-----

二、密切联系党的基本路线，把党建设成为社

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	184
坚持党要管党和从严治党,把党建设成为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 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站在时代前列的 马克思主义政党	184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恢复并发展党的 正确思想路线	187
坚持正确开展反倾向斗争,要警惕右,但主 要是防止“左”,坚定不移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	188
不断完善党规党法,实现党内生活民主化制 度化,大力加强党的制度建设	189
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强党的团结统一, 努力搞好党的组织建设	191
坚持干部队伍“四化”方针,造就一支朝气 蓬勃的领导干部队伍	192
毫不留情地反对腐败,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和 作风建设	194
第八章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提高全党 马克思主义水平	196
一、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 路线,推动了全党思想大解放	197
坚持党的正确思想路线,是党的事业发展的 前提	197
坚持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的辩证统一,是邓	

小平执政党的建设理论的精髓	198
二、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努力提高全党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199
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是时代赋	
予我们党的历史任务	199
努力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必须	
贯彻“精学管用”原则	201
三、确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的方针，坚持不懈地反对僵化和资产阶	
级自由化	205
我们党的历史，就是在不断反对“左”和右	
的错误倾向中发展和壮大起来的历史	205
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	
以史为鉴提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两点论和重点	
论的统一	208
第九章 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增进全党的	
 集中统一	211
一、民主集中制实行得好坏，关系到党和国家	
的前途命运	212
我们党选择了民主集中制作为根本的组织原	
则和组织制度，这既是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	
也具有坚实的哲学基础和群众基础	212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什么时候民主集中制坚	
持得好，党就能够团结统一，党的事业就兴旺；反	
之，党的力量就遭到削弱，党的事业就遭受挫折	215

二、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发挥和调动全党的积极性	217
民主是集中的基础和前提,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党今后长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	217
发扬党内民主,实现党内生活民主化,必须尊重党员权利,使党员参与党内各项事务的权利得到切实行使	220
发展党内民主要以实现党的纲领为目的,要以引导、保护、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积极性为出发点	221
三、加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	223
民主集中制的集中,是全党意志、智慧的凝聚和行动的一致	223
铁的纪律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优势,强调集中,首先要强调党的纪律	225
“四个服从”原则最重要的是全党服从中央,强调集中,最重要的是维护中央的权威	228
第十章 贯彻从严治党方针,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	232
一、党风廉政建设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	233
执政党的作风直接关系到党的性质和面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要求我们更要搞好党风廉政建设,经受住双重考验	233
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腐败现	

象令人担忧,主要原因是体制上存在弊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体制并存·····	234
二、端正党风先要从领导干部做起·····	237
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是党的事业成败的决定因素,也是党风建设成败的重要因素,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对实现党风好转具有决定意义·····	237
领导干部在端正党风上的表率作用是多方面的,关键是要率先纠正不正之风,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尤其是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	238
三、党风廉政建设一靠教育,二靠法制·····	241
端正党风的根本问题是抓好思想教育,着力提高党员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	241
法制,是国家对社会发展实施管理的重要手段,同样也是党风廉政建设的治本之策。靠法制,就是把反腐败和党风廉政建设纳入制度化、法律化的轨道·····	243
四、坚持从严治党,坚决惩治腐败分子·····	246
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必须从严治党,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高层的腐败·····	246
惩治腐败,要一抓到底,决不手软;要坚持长期性与阶段性的统一,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	248

第十一章 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251
一、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	252
中国共产党是有组织的整体，基层组织是党的组织基础，作为执政党在新形势下尤其要重视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252
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社会基层单位的政治核心。基层组织是否坚强有力，直接关系到党的领导能否得以实现，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否顺利建立	253
基层组织是党联系广大群众的基本纽带，能否发挥作用，直接影响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影响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	255
二、用改革的精神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切实改进基层党组织的活动内容和工作方式	256
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体制要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用改革的精神加强和改进基层党组织建设，必须大胆探索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基层党建新机制	257
坚持分类指导，明确责任，理顺关系，采取新措施，抓出新成效	261
用改革的精神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还必须切实改进方法，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继承与创新、	

形式与实效等关系，提高党的活动的有效性、
针对性 264

三、在改革开放中加强党性锻炼，提高党员
干部的素质和能力 266

加强党性锻炼，提高党员干部素质，不仅是
保持我们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使党经受住
执政和改革开放考验的大事，而且是完成党的任
务的关键 267

加强党性锻炼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自觉
的过程，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特别要加强理论修
养、思想道德修养、优良作风修养、组织纪律修
养，以及科学文化和业务素质的提高，以全面提
高党员、干部的素质和能力 269

第十二章 走依靠改革和从制度上建设党的新路子
..... 273

一、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
和长期性 274

强调制度问题的重要性，既是对我们党历史
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又是改革开放新形势的客
观要求 274

制度问题的重要性，还可以从制度本身的特
征去加深理解 277

二、新时期制度建设的目标、重点和应遵循的
原则 280

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切实解决以党代政、党

政不分的问题	280
改革党的干部制度，建立起有利于优秀人才	
脱颖而出的有效机制	282
健全民主集中制，形成全党统一的意志，增	
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283
加强党风廉政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反腐保廉	
的防范、约束机制	285
三、大胆学习、借鉴外国一切有用的东西，	
逐步建立健全“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	
制度”	287
由于过去长期忽视、起步晚、理论准备和实	
践准备都不足等原因，当前制度建设还存在不少	
问题	287
解决现存问题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大胆学习、	
借鉴外国制度建设的经验，逐步建立健全有中国	
特色的更加定型的制度	289
后 记	294

总 论

世间一切学说和思想体系的产生都必然有其独具的社会历史条件，都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而且都有着历史的继承性和对未来发展的预见性。

邓小平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是在继承毛泽东建党学说的基础上产生的。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的原理，根据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在农民、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的包围中，并肩负着领导人民群众推翻“三座大山”的伟大历史使命的历史条件下，成功地解决了如何把党建设成为一个思想上完全成熟、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武装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问题。这一

理论体系，在党的历史上闪耀着不可磨灭的光辉。然而，历史的长河滚滚向前，世界上没有永恒的、不受任何历史条件限制的真理。理论要成为一株长青的大树，就必须深深扎根于生活、实践的土壤之中。由于种种的原因，在执政以后，我们党包括毛泽东，未能完全适应国际国内客观环境和党的中心任务的变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存在某些失误，因而在党的自身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上，都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一段时间，甚至使党陷于危险的境地。邓小平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在纠正党和毛泽东的错误的基础上，继承毛泽东的建党学说的。如果不反对“两个凡是”，不首先在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党就不可能继续向前发展。因此，邓小平的建党思想是在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前提下对毛泽东建党学说的继承，而不是简单的继承。

同时，由于时代主题的变化和党的中心任务的历史性转移，如何增强执政意识、提高执政本领，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已经成为我们党的建设的主题。邓小平的建党思想，就是紧密围绕这个主题，在科学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执政40多年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毛泽东建党学说的发展。

由此可见，毛泽东建党学说与邓小平执政党的建设理论，是互相衔接、互相包容的，是我们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作为执政党，我们不仅面临着异常艰巨复杂的任务和矛盾，而且在党的自身建设方面也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果我们不研究解决这些问题，

党的自身建设搞不好，党就不能真正成为领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我们的事业就不可能成功。因此，加强对邓小平执政党的建设理论的研究，是一件非常有意义而又非常紧迫的大事。

一、邓小平执政党的建设理论形成的历史条件

任何一种正确的理论体系的产生，都是一个时代的产物，都是一个伟大的实践孕育出来的成果。

（一）邓小平执政党的建设理论是适应时代主题转变的结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前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来，世界上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然而，由于各种政治和经济因素变化的影响，从 50 年代中后期开始，国际形势逐渐发生了一些带有根本性的变化，使时代的主题逐渐发生了转变。

首先是 50 年代中期以后，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日新月异地发展，使原先在这些领域内早就占据优势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迅速发展起来，经济上出现了一个所谓“黄金时代”。而主要在落后国家中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方面却处于后进的状态，同时更由于体制上的原因或政治因素的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远远被发达国

家所抛离。即使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整体发展水平最为先进的苏联，由于上述原因，科学技术也很难迅速转变成为生产力，国民生产总值也因此由原先相当于美国的 50% 下降为 30%。

其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为了自己的生存，对本国的政治、经济政策进行了调整，对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所形成的旧体制进行了适度的改良，从而缓和了内部的矛盾，使现代资本主义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稳定和发展。这些调整和改良的措施，主要包括：用允许工人运动（及其政党运动）合法化的手段，把工人运动控制在资产阶级国家宪法和法律范围之内，以缓和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实行“福利国家”的政策，推行高工资、高福利、高消费措施，以缓和社会上贫富的对立；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保持社会需求的相对稳定，以缓解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实行现代企业制度，变私人占有、私人经营的资本家为股份持有者，以缓和生产社会化与资产阶级私人占有的矛盾，等等。这些政策的实施，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但毕竟起了某种缓冲作用，使现代资本主义呈现出一些与过去不同的特点。

再次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列强迫于原来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不得不实行新殖民主义，允许这些国家独立。因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第三世界的崛起，对世界上政治格局的变化和各派政治力量的对比，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最后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严重失误，对时代主题的转变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许多领导人急于求成，在理论上受“左”倾思想的影响，在实践中程度不同地推行了一条受“左”倾思想严重影响的路线。因而在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我们所建立的政治、经济体制都存在比较严重的弊端。虽然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初期，由于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由于人民群众的革命激情高涨，这些弊端在一个时期之内没有明显暴露。然而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深入发展，这些弊端越来越严重地束缚着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的发展。此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这些弊端，并进行了一些改革和调整，但由于未能从根本上认识到产生这些弊端的深层次根源，这些国家的改革都未能真正成功。这就导致了社会主义体系各国经济的发展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越来越大地拉开了距离，致使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矛盾，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党与党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80年代末以后，更出现了苏联、东欧等10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易帜的历史悲剧。

这些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变化，改变了时代的主题。实际上可以说从60年代开始，时代的主题已经发生转换，已经不同于列宁所概括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然而，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同志还一直强调世界大战随时可能爆发。认为国际形势的主要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是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强调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党的根本任务是搞阶级斗争，把党的斗争策略简单地界定为支援世界革命，消灭资本主义。并相应

地为党制定了一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及一系列有关方针政策。因此，在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我们党的自身建设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有一个时期还把党推到非常危险的境地。

邓小平临危受命，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以后，冷静地进行了反思，勇敢地提出要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倡导以实事求是为前提的解放思想运动。他首先提出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这一时代的主题，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和平共处的状态，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发生大规模的全面性的世界战争。因而他认为发展是硬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缓慢也不是社会主义。要求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人，要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在全党接受了这些思想以后，我们逐步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党的基本路线。

随着时代主题的变化，党的中心任务和党的政治路线的转移，党的自身建设的目标和指导思想，必须相应加以改变。

（二）邓小平执政党的建设理论是在吸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和教训基础上，在理论上的新起点。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如同人类社会的一切运动一样，在曲折中前进。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历了两起两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曾经极大地鼓舞了全世界共产党人和一切进步人士。社会主义国家也曾经有过一个辉煌发展的时期。在这当中，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都在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尤其是在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

级专政和共产党的核心领导方面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然而，不可否认，由于执政党本身在思想、路线、策略上和党的自身建设上的失误，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特别令人沉痛的是一些已经建立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及其领导核心共产党，瓦解、解体或蜕变于一旦。个中缘由，理所当然地引起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深刻的反思。早在1956年，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就根据苏共的教训，提出了必须反对个人迷信，健全民主集中制的问题。60年代初期，又在党的工作会议上提出执政党要加强自身建设、党要管党等问题。70年代末，邓小平根据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给党造成巨大影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造成重大损害的历史教训，更加深刻地指出，要特别注意消除封建传统的影响以及个人崇拜的危害。并指出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在领导体制上的主要弊端是党包揽权力过多。因为这个弊端，再加上民主集中制的不健全，因而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家长制”、“一言堂”、个人专断的现象比较严重，从而导致官僚主义、特权思想、贪污受贿等消极腐败现象的产生，使党逐渐脱离群众，发展下去还会造成党的行政化和国家政权的官僚化的危险。因此，如何在执政党建设理论方面进行突破，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在改革社会经济体制的同时，对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在内的政治体制逐步加以改革和完善，就是摆在执政的共产党面前的一个不可回避的任务。同时，这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出低谷，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重新走上新的高潮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三）邓小平执政党建设理论，是邓小平以其独特的历史

地位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品格对党和人民群众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创造的新鲜经验的总结。

错误和挫折一方面教训了人们，另一方面又往往成了能够真正从中吸取教训的人们走向成功的先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在痛苦的反思之后，重新奋起，努力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党是在两条战线的斗争当中发展起来的。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领导核心的共产党，一方面肩负着改造社会，振兴中华的历史重任；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正视在汹涌澎湃的社会改革的大潮中，党组织和党员本身的问题和党的自身建设面临的新课题。面对这些问题，有的人坚持僵化的观念，重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调，对党的改革开放的路线横加指责，甚至武断地认为这是党的蜕变和“复辟资本主义”；有的人则站在根本否定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的立场上，拾人牙慧，也在中国唱起“市场经济必然走向私有化与政治多元化”、“一党制必然导致执政党腐败与解体”的陈词滥调来。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情况，党和人民没有动摇，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并从中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

邓小平是我们党早期的党员之一。在党的历史上担任过多种领导职务。在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中，他作为党的总书记，发挥过重要作用，对党在这一时期领导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和失误，都十分了解。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开创了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他还是我们党从党的创建时期就开始参与了建党活动并至今健

在的为数不多的党的元老之一。这种独特的历史地位，不仅在中国共产党内，就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是不可多得的。更加值得称道的是，邓小平历来以知识渊博、经验丰富、原则性强和实事求是的品格而闻名于世。在他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过程中，他非常清晰地认识到中国现代化建设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党，在于能否真正把党建设成为这一伟大事业的领导核心。因此，他根据党的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实践，提出了以用改革的精神建设党为基本特征的执政党建设理论，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二次飞跃，增添了一笔瑰丽的色彩。可以这样认为，如果没有邓小平这样独特的历史地位与在党内外和国际共运中如此崇高的威望，以及他特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品格，在现实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其执政党建设理论，是不可能如此顺利地在中国确立起来的。

二、邓小平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基本架构

邓小平执政党建设理论是根据新的时代特征，围绕着我
国现代化建设的中心，对执政党自身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
题所进行的新的探索。其内容十分丰富，观点非常新颖，同
时对解决现实问题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指导作用。其基本架

构是：

(一)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是邓小平执政党的建设理论的总题目。

中国共产党在我国的执政地位的形成是历史与人民群众的正确选择。尽管党执政以后，在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也犯过不少错误，并且如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至今仍然是一个必须继续解决的问题。然而，就我国的现实状况来看，除了中国共产党以外，不存在任何一种能够提出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正确可行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够基本控制和逐步解决我国客观存在的复杂的社会矛盾，能够使国家保持独立、统一、稳定和发展状态的另一种政治势力。因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不仅有悖于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意愿，而且必然会造成我国社会的动乱与倒退。而从共产党执政以来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状况来看，无论从领导体制、领导方式、工作方式，还是从内部结构来看，目前都还存在不少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的地方。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出了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这个总题目。就是说，在党的建设的问题上，必须一方面考虑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动摇，另一方面又必须适应时代发展的潮流，适应领导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需要，对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在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建设等各个方面，进行逐步的适当的调整、完善和改进，使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真正站在改革开放、开拓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新局面前列。那些墨守成规和无所作为的观点，是十分错误和有害的。为此，邓小平首先要求全党恢复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

路线，并身体力行作出榜样。当然，解放思想仅仅是解决问题的先导和思想基础，要比较全面和彻底地解决问题，则必须在党和国家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做大量的细致扎实的工作，切不可操之过急和鲁莽行事。因而，邓小平对上述问题也分别作出了非常深刻的论述，并且提出了诸如要逐步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党政分开”、要贯彻干部“四化”方针等一系列十分明确的要求和目标。

当然，这些问题牵涉的范围十分广泛，内容十分丰富，还有待于我们结合实际生活面临的问题去研究、发掘，才有可能比较好地解决这些问题。

(二)加强和改善党的建设是邓小平执政党建设理论的总核心。

毛泽东在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大法宝”——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的关系时，曾经指出党的建设的状况决定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的进退成败，是“三大法宝”中的关键。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在党的中心任务已经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以后，邓小平多次指出，党的建设是党的现代化事业成败的关键。如果党的自身建设搞不好，连个群众组织也不如，现代化事业就不可能成功。并强调，如果将来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由此可见，我们党的第一、二代领导核心对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问题是在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怎样才能把党的自身建设切实搞好，把党建设成为真正的坚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

邓小平是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典范。他在对国际共运特别是我们党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科学的反思之后，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10多年来，作为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对党的自身建设的改革也进行了精心的设计。他首先提出要加强党的建设，必须对党的自身建设进行改革的总构想。同时，对党的建设的几个主要方面也提出了改革的总的方向。对党的政治建设，他领导全党提出和逐步确立了党的基本路线，提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把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作为对全党各级组织和党员的基本要求和根本任务。对党的思想建设，他强调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根据已经变化了的实际情况，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敢“闯”敢“冒”，勇于突破。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他提出要精要管用。他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要深入人脑，就必须改变过去那种“我讲你听，我打你服”的状况。对党的组织建设，他首先提出现代化事业的成败，国家的长治久安，在一定意义上讲关键在人。并在80年代初期就提出了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提出了要调整和加强领导班子建设，选拔、培养一批又一批年轻的、跨世纪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接班人的战略任务。他还从总结党的历史教训出发，提出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以及破坏民主集中制的种种错误倾向的要求。对党的作风建设，他强调要继续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要根据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新形势，加强党风与廉政建设，要采取综合治理的办法，深入持久地开展反对腐败的斗争。他强调在反腐败的问题上，越

是领导干部，越是名人，越要严格要求，对他们当中的腐败现象的处理，也要更加严格，等等。

邓小平这一系列的思想和理论充分表明，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基础的变革，党的自身建设与其他上层建筑领域一样，也必须坚定不移地进行改革。只要我们沿着邓小平提出的这些思路，在实践当中不断探索，不断变革，不断总结，不断寻找新的途径和办法，我们就一定能够把党的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三）依靠改革和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是邓小平执政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总方向。

共产党成立以来，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以阶级斗争作为主要任务。甚至在党执政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党的建设的目标仍然被界定为领导阶级斗争的先锋队组织，亦即阶级斗争的工具。应当说，在革命战争年代，党以推翻反动统治阶级、夺取政权为目标，围绕这个目标去建党是正确的。然而，党执政以后，在党的地位、作用和中心任务以及国内阶级关系都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的条件下，我们仍然坚持按照这个方向进行党的自身建设，就不能不使党的建设偏离正确的轨道，酿成重大的失误，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严重损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吸取了这个历史教训，果断地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了党的中心任务的根本转移。在这个历史转折时期，党的自身建设的途径和方法，如何适应这个变化，改变过去那些不合时宜的做法，走出一条新路子？邓小平在这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果断地提出要抛弃政治运动的形式，要走出一

条通过改革和加强制度建设的党建新路子。他特别强调制度建设的重大意义，指出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他认为有一个好的制度，可以防止坏人做坏事；没有一个好的制度，好人也难免做坏事。众所周知，衡量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组织政治现代化的程度的重要标准之一，是对国家和社会组织事务管理的法理化的程度。邓小平对党的自身建设方向的抉择，无疑给作为我国唯一的执政党的自身建设指出了一个唯一正确的方向。

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标。而对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乃至执政党本身的内部事务的管理的法理化程度的逐步提高，则是达到这一根本目标的根本保证。虽然，从我国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条件出发，完全达到这一目标，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然而，只要执政党率先朝着这一总方向，在党的自身建设问题上，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和加强制度建设，我们就有可能到达成功的彼岸。

三、邓小平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基本特征

关于邓小平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基本特征，我们认为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方向上的坚定性。

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是贯串于邓小平党建理论中的一条红线。邓小平的党建理论，不管在论述到什么问题，不管搞什么样的改革，始终都把是否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作为思考和探索的前提。在他看来，现代化事业如果要以党的解体或者腐败作为代价，不仅现代化本身不可能实现，就是能够实现，对我们共产党来说，也是毫无意义的。因而早在全国开展真理标准讨论、刚刚开始思想解放运动之时，他就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且强调在四项基本原则中，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最关键的一项。不管在怎样复杂的情况下，当遇到危及这一政治方向的任何言论和行动，他都会立刻旗帜鲜明地予以批评、克服和纠正。

（二）理论上的革命性。

历史证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高潮走向低潮，最大的教训是，作为执政的共产党，长期以来受“左”倾思想的影响，犯“左”倾方面的错误，因而使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建立起来的经济、政治体制存在着严重的弊端。这些弊端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削弱了社会主义体系的力量。经过深刻的反思，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而改革必须首先在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因此，他首先举起反对“两个凡是”的大旗，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他指出，对我们党来说，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坚决排除不管是来自“左”还是来自右的方面的干扰。正是在继承正确的理论原则的基础上，科学地总结党和群众的实践经验，不断寻找理论上的新起点，从而使其执政党的建设理论，

具有鲜明的革命性。

（三）实践中的务实性。

邓小平执政党的建设理论来源于实践，服务于实践。他提出的理论原则，大部分都是他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以及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时，针对党的建设实践当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来的；有些是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在拨乱反正当中，针对过去的历史教训提出来的；还有的是根据群众的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此外，从邓小平的个人风格来说，他的理论观点往往都是用直截了当、一针见血的语言表达出来的。因而使人读来既感到其高屋建瓴，切中时弊，又感到其通俗易懂，便于实行。

（四）适应社会发展的时代性。

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老资格的领导人之一，不仅有着极其丰富的阅历和处理党务与国家政务的经验，而且学贯中西，洞明世事。尤其是作为社会主义运动改革的领导人，他深明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把握着时代的脉搏，因而他提出的理论原则，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既能指导现实的发展，又能预见未来的趋向。

四、研究和学习邓小平执政党的建设理论的意义和方法

邓小平作为当代世界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以其雄浑有

力的笔触极大地改变着中国的面貌,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在改变着世界的面貌。作为研究社会改革和转型的倡导者和领导者——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理论,虽然仅仅是这一伟大宏图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研究这个理论的伟大意义在于:

(一) 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众所周知,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的角度出发,中国的进退成败,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共产党的领导是否正确。因而党的执政地位巩固与否,不仅关系到党,而且关系到国家、民族和人民群众的命运与前途。而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与否又取决于党的自身建设能否日臻完善。邓小平执政党建设的理论,给人们以一种新的启迪、新的思路,使人们产生一种清晰的轮廓和坚实的信心。我们相信,只要全党加强对这个理论的研究和学习,在这些理论原则的指导下,不断探索,不断创新,我们就有希望逐步解决前进道路上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使国家长治久安、繁荣富强,并在此当中使党的自身建设得以不断地完善和发展。

(二) 有利于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自身建设。

水无常形,人无常态。一切事物无不处在变化发展当中。我们党也是一样。当前党内存在的问题,可以认为是一种社会综合症。也就是说,这是由于党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特殊的社会条件下,以及两种社会制度和平共处、社会主义运动暂时地处于低潮的特殊的国际环境中,在各种客观和主观因素的影响下造成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简单地完全按照现成的

理论——哪怕是正确的理论、历史的传统——哪怕是优良的传统、过去的经验——哪怕是成功的经验去做，党的自身建设还是搞不好的。面对这些已经或者正在变化的主客观因素，要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必须立足于改革。而邓小平的执政党建设的理论，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正确的指导思想，提供了一整套理论武器。只要我们沿着邓小平指引的方向，根据不断变化的主客观条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党的建设的理论，寻找新的行之有效的办法，我们就必定能够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的优良作风，积累新鲜的经验，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

（三）有利于正确开展党内两条战线斗争，保持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

无产阶级政党是在党内两条战线斗争当中发展起来的。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已经证明和经典作家早已指出的一条普遍的规律。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在这方面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过惨痛的教训。邓小平针对党执政以后，曾经长期以所谓反修防修为根本任务，主要运用政治运动的形式，甚至认为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阶级斗争越来越从党外转移到党内，阶级斗争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而把党推向了危险的边缘的历史教训，果断地废止了用政治运动来解决党内矛盾的做法，提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既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要反对思想僵化；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依靠搞运动，要允许人们有一个认识过程等一系列理论和原则，从而为正确开展党内斗争提供了正确的方针。

研究邓小平执政党建设理论的方法,最重要的还是要按照邓小平自己所说的“要完整准确地理解”这个基本原则,紧密围绕新时期执政党建设提出的新的重大的问题,既要深入研究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又要不断地总结党和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并使之逐步理论化和系统化。在学习、研究当中,切忌断章取义和语录式的罗列;也不能完全按照过去的理论体系,把邓小平的论断简单地往里套。只要这样,通过全党同志的共同努力,一个科学的、完备的邓小平执政党建设的理论体系,就一定会展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宝库之中。

正是根据以上对邓小平执政党建设理论的粗浅认识和总体把握,我们这部著作,取名为《用改革精神建设党》。全书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总论;第二部分为领导篇;第三部分为建设篇。笔者在本书的构思和写作过程中,力求在理论联系实际上下功夫,在理论的系统性和研究的深度上下功夫;力求透过邓小平有关执政党建设的论述和实践活动,准确地把握邓小平执政党建设理论的精神实质和时代特征。然而,由于水平所限,错漏之处在所难免。亟望得到同行和读者的指正。

领 导 篇

第一章 坚持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和现实的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在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指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这一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同时，也找到了代表着先进生产力，肩负着消灭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力量——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才能“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①列宁、毛泽东在分别领导俄国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也都反复地强调并始终如一地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第138页。

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的原则。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针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各种怀疑、削弱、甚至否定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作用的言论及行为，坚持并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这一重要原理和基本原则，从历史和现实两个基本方面，精辟有力地阐明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离不开党的领导这一新时期执政党建设必须首先回答的重大课题。

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 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

“领导不是自封的，要看群众承认不承认，批准不批准。”^①邓小平认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共识，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他指出：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面临着比我们强大得多的对手，但却能以弱胜强，以小胜大，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因为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是在为人民而战，取得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战争年代如此，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同样如此。“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必然四分五裂，一事无成。”^②“这是全国各族人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57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8页。

民在长期的奋斗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的真理。”^①“我们党同广大群众的联系，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是六十年的斗争历史形成的。党离不开人民，人民也离不开党，这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够改变的。”^②

众所周知，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展开长期英勇的斗争，但都没有取得成功。1851年开始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虽然轰轰烈烈地坚持了14年，终究因跳不出历次农民起义的窠臼而归于失败；此后相继兴起的洋务运动和变法维新运动，企望在不触动封建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通过兴办实业和政制改良的办法，借鉴、吸收西方列强的文明成果，效法某些西方国家的君主立宪制度，使中国走上强国富民的现代化道路，但由于历史条件的特殊性和洋务派、改良派自身的局限性，最终也避免不了夭折的结局；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王权统治，并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治国理论和纲领，但中华民族并没有因此而结束四分五裂的混乱局面，走上强国富民道路，而是陷于长期的军阀割据和战乱之中，继续饱受外国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和国内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新生的无产阶级为了摆脱水深火热的境况，也曾不断举行罢游行以至暴动起义等形式的反抗斗争，但实践表明，无产阶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2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66页。

级没有本阶级革命政党来组织领导，要战胜掌握着强大国家机器的统治阶级，求得自身的彻底解放是根本不可能的。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成立。党从成立之日起，就确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就自觉地肩负起组织领导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历史重任，义无反顾地站在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最前列。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它标志着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中国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党的诞生，使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从此有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理论为指导

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①“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②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夺取革命胜利，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党有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为指导。19世纪40、5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和根本利益出发，批判继承了全人类思想

①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第2版，第241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242页。

文化的优秀成果，总结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实践经验，创立了关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体系，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继马克思、恩格斯之后，以列宁、毛泽东为代表的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杰出领导人，正确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强大思想武器，去分析本国国情，把握时代脉搏，找到了适合本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具体道路，创立了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了俄国、中国等国无产阶级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在新的历史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深刻地总结了国内外、特别是我国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艰难曲折的探索历程，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继续推向前进，逐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中，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从而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新的科学的理论指南。

党的诞生，使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从此 有了一个正确的行动纲领和崇高的奋斗目标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共产主义理论体系、创建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同时，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制定了一个崇高的奋斗目标，即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一建立在

科学理论体系基础上的奋斗目标，一直成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共同的行动纲领和崇高的奋斗目标，成为集结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激励和唤醒人民群众的一面鲜明旗帜。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高举起这面旗帜，并立足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先后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最低纲领和党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路线。在执政前，我们党提出了一条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正确路线，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执政以后，党又及时地制定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总路线，提出了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总任务、总目标，从而使具有几千年封建历史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推进了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把党的工作中心重新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逐步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就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条基本路线的确立，标志着我们党经过长期艰难曲折的实践，已经初步摸索到了一条符合社会主义运动普遍规律和中国具体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条基本路线，已经成为现阶段全党和全国人民共同的行动纲领和奋斗目标。

党的诞生，使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从此有了 了一个组织严密、作风严谨、纪律严明的先锋队 队为领导

马克思、恩格斯在指导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的过程中，始终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在组织形式上必须同一切密谋组织和旧政党彻底划清界限，必须具有严谨的作风和严明的纪律。列宁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这一建党思想，在俄国建党实践中明确而完整地提出了民主集中制这一科学概念，并把它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根本的组织原则，不仅写入了俄国党的章程，而且把是否以这一原则作为自己组织机构和组织活动的指导原则作为各国党能否加入共产国际的必备条件。在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方面，列宁不仅从理论上作过许多精辟的论述，对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提出了一系列严格的要求，而且以其自身突出的典范作用，为俄国党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树立了一种革命胆略和求实精神相结合的崇高思想风格和良好的工作作风。在马列主义指导下和共产国际直接帮助下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就坚持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党的组织机构，开展组织活动。民主集中制的正确贯彻实行，把我们党的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紧密地、有机地联结在一起，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使全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充分调动和发挥，使党成为纪律严明而又生机勃勃的战斗集体。与此同时，我们党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培育出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一整套优良传统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

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①在执政后，我们党领导人民用先进的思想观念和革命的工作生活作风荡涤了旧社会残留的腐朽落后的不良风气，开创了自力更生，勤俭建国，舍己为人，助人为乐等一代社会主义新风尚。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进一步加强了民主集中制建设，并把作风建设摆到了关系党的生死存亡重要位置上，继承和发扬了党的三大优良传统作风，大力倡导艰苦创业、求实创新、勇于开拓、廉洁奉公的时代精神，并且针对新的形势下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把反对官僚主义和反对腐败作为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的重点，初步摸索出了一条不搞政治运动，靠改革和制度建设来端正党风的新路子，使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不断得到了巩固和进一步丰富发展。实践证明，我们党不仅能够经受得住严酷的革命斗争环境的考验，而且能够经受得起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继续保持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本色，保持同人民群众鱼水不分、血肉相连的政治优势。

正是基于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的全面回顾和总结，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中国革命，没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吗？不可能的。……因为有党的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千难万苦的奋斗，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党也犯过严重错误，但是错误总还是由我们党自己纠正的，不是别的力量来纠正的。就是粉碎‘四人帮’，也是由我们党代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来实现的。中国一向被称为一盘散沙，但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5月第1版，第1095页。

是自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成为全国团结的核心力量，四分五裂、各霸一方的局面就结束了。只要我们党的领导是正确的，那就不仅能够把全党的力量，而且能够把全国人民的力量集合起来，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①

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事业的现实要求

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党的领导权威的建立和执政地位的巩固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在新的历史时期，还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党的执政地位能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这不但取决于党的光荣历史，取决于人民的历史选择，更取决于现实，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需要。因此，邓小平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不仅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而且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他认为，我们国家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极其艰苦复杂的伟大历史工程。完成这项工程，需要有一个通晓社会发展规律、透彻地了解本国国情和洞察国际风云，具有崇高威望和丰富经验、能够协调各方利益的组织者、领导者。这个组织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66—267页。

者、领导者，只能是中国共产党。邓小平讲：在现阶段，“我们的政治路线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①而“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②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之所以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主要是由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性质、实现条件和具体内容等因素所决定的。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始终保持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

作为一种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现代化是同资本主义社会的诞生与发展结伴而来的，是指自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生产力导致社会生产方式的大变革，由此带动社会经济的加速发展，进而引起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各个领域的深刻变革的大趋势。考察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发展历程，通往现代化目标的基本途径无非是两条，一条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建设道路，另一条就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道路。两条道路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化，是在少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1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67—268页。

数剥削阶级和统治者欲壑难填的利益驱动下、以牺牲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代价而实现的，是与残酷的剥削、压迫和血腥的侵略、掠夺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后者则是以生产资料社会所有为基础的现代化，是为了满足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要，是与消灭剥削、压迫，实现各民族和国家的平等、独立、和平的人类美好愿望相一致的。而且，由于社会主义根本的经济关系，即生产资料的社会共同占有，以及与此相应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体系，较之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体系更能适应现代化大工业生产的要求，更有利于调动发挥大多数人投身于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创造性，因此，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能够比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建设速度更快，效率更高，可以大大地缩短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如前所述，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不少具有资产阶级进步思想的爱国仁人志士曾通过各种不同方式，试图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走上资本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道路，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也仍然有那么一些人置历史事实和现实国情于不顾，企图开历史倒车，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退回早已被历史证明行不通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这显然是绝对办不到和不允许的。“道理很简单，中国十亿人口，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

决摆脱贫穷的问题。”^①而且，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起点和总体发展水平已经比世界发达国家落后了整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只有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逐步缩短这一距离，使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总之，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之所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个别人的发明，不是少数人密谋的结果，而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必然。现阶段我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和艰难曲折的探索实践开创出来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而社会主义事业自始至终都离不开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这是毋庸置疑的。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健康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既生动活泼、又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

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建设，都需要以和平、稳定、良好的社会政治局面为前提。对此，早在1957年，毛泽东就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正确的构想，他指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7—208页。

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①这个设想应当说是非常好的，它体现了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社会主义的性质，适应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但是，由于后来“左”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不断发展，这一正确构想未能在实践中得到真正实现。邓小平一向高度重视毛泽东的这一构想。他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所作的讲话中就重申了上述这段话，并提出了创造这样一种局面要先从党内再到党外的具体步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不但从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这一正确思想。他着重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实现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两个方面，论述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社会环境与政治局面的问题，并进而揭示了这两个方面的目标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内在必然联系，指出了这两方面目标都必须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才能得以实现。

一方面，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是亿万人民共同的事业，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进行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十分艰巨复杂的任务。要完成这项任务，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没有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参与，不充分调动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56—457页。

和发挥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使整个社会政治生活充满生机与活力，是绝对办不到的。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在本质上就是民主的，社会主义应该、也一定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切实的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① 鉴于我国是一个曾有过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传统的国家，总结毛泽东晚年所犯的家长制和个人崇拜的严重错误，邓小平指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② 而要充分发扬民主，推进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以及社会各领域的民主化进程，就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必须首先发展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来逐步推进人民民主。“在今天的中国，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③ 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民主，我们不能再搞了，那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这是因为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利，只有在人民利益的集中代表者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真正实现；党也只有通过领导、组织和支持人民群众当家做主，才能完成自己担负的历史使命。所以，社会主义民主要发扬，共产党的领导要加强，这两者是密切联系而又不可分割的，都是不能动摇和不能怀疑的。针对有人借发扬民主而否定党的领导错误倾向，邓小平指出：“今天的党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4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0页。

中央坚持发扬党的民主和人民民主，并且坚决纠正过去所犯的
的错误。在这样的情况下，竟然要求削弱甚至取消党的领导，
更是广大群众所不能容许的。这事实上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
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覆灭。”^①

另一方面，邓小平又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
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一个内乱不止、外扰不休、人心
不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下，现代化建设将无从谈起。旧中国一
向被称作一盘散沙，自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才结束中
华民族四分五裂的局面。这期间，我们也有过沉痛的教训。十
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搞所谓的踢开党委
闹革命，不要党的领导，使全国各地派别林立，骚乱不停，人
民没有安定的社会环境，无法安心搞生产，结果使得我国的
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拉大了我们与发达国家经济和社会
发展水平的差距。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邓小平特别珍惜来
之不易的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特别强调维护社会稳定的极端
重要性，特别强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维护中国安定团
结政治局面的关键性意义。他认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
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
的成果也会失掉。”^②“只有稳定，才能有发展。只有共产党的
领导，才能有一个稳定的社会主义中国。”^③ 在现阶段，我们
党处于执政地位，拥有 5400 多万党员和 300 多万个基层组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170—171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84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57 页。

织，党的性质、地位和特点使中华民族的精英力量和各行各业的先进模范分子绝大多数都集中在党的队伍当中，党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光辉历程中，已经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起崇高的权威和声望，只要我们党的自身能够保持团结统一，党的领导作用能够正常发挥，不出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会有一个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局面。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包括了经济富强、政治民主和精神文明三个基本目标。坚持党的领导，是这三个基本目标的内在必然要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逐步形成并确立了一条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这条路线不但明确地规定了党在现阶段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而且全面、科学地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个方面基本目标，即要实现经济上的“富强”、政治上的“民主”和思想文化方面的“文明”。这三个方面目标紧密联系，互相推动和促进，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目标。而无论是哪一方面目标的实现，都同党的领导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归根到底，都取决于能否坚持党的正确领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5页。

导。

——从经济建设方面的目标看，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中国，是同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和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完全一致的。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②我国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财富极大丰富。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要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③那么，我们为什么长期忽视经济建设，忽视生产力的发展呢？究其原因，主要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原则，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和规律理解不透，认识偏误，是极左错误思想作祟的结果，而并非党的理论基础和理想目标使然。有人以党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失误为由，怀疑、否定党对经济建设的领导能力，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理论，认为共产党领导武装革命和阶级斗争是“内行”，领导经济建设是“外行”。这显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特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

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的抹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不但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而且立足于中国国情，制定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和具体步骤，更为重要的是，以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为标志，我们党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并围绕这一目标，制定了一系列配套的经济体制改革具体方案和措施，从而给我国经济建设注入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改革开放十几年，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圆满地完成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三个五年计划，提前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任务，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国家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经济发展水平同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我们党又提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这一跨世纪的宏伟纲领。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并将进一步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但能够成功地领导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夺取政权，取得革命胜利，而且也有能力成功地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取得经济建设的新胜利，把中国建设成为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经济强国。中国革命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经济建设同样也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

——从政治建设方面的目标看，如前所述，社会主义在本质上就是民主的，社会主义应该而且也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切实的民主。民主不但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

必需具备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条件，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目标之一。我们党从本世纪20年代初登上政治舞台开始，就高举起民主、自由的旗帜，为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而奋斗牺牲。在残酷的武装斗争环境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提出并开始实践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领导工农大众在根据地和解放区推行了许多切实有效的人民参政议政、行使当家做主民主权利的政治形式，为建国后领导实行社会主义民主积累了宝贵经验。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领导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并在较短时间内，形成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社会自治制度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的民主政治制度，充分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投身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积极性、创造性，初步显示出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方面的决心与能力。遗憾的是，因遭受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和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进程一度延缓和中断，甚至出现了“个人崇拜”这种根本违背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的逆潮。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路线以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和发展。这些年来，我们党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下，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基本途径，以建立健全党内各项民主制度、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为载体，有步骤、有秩序，积极稳妥地推进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无论深度和广度都取得了长

足的进展。更重要的是，我们党总结吸取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初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理论，其中主要包括：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理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理论；以党内民主带动整个国家和社会民主，逐步实现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制度化的理论；民主政治建设必须立足于现实国情，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循序渐进，不能操之过急的理论；以及要区分两种不同性质民主观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标志着我们党已经初步摸索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正确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们这个背负着几千年封建专制的沉重历史包袱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走向民主自由、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目标的真正希望所在。

——从思想文化建设方面的目标看，“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①“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②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过许多精辟论述，不仅揭示了精神文明的科学涵义，指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为确立精神文明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应有的重要地位，积极有效地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还通过揭示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特别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坚持党的领导。邓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7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4页。

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两个基本方面。就思想建设而言，最重要的是要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对全国人民进行共产主义理想、道德和纪律教育。搞好这方面工作，关键在于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发挥党的思想指导作用；从文化建设来说，不论是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体育、新闻、出版等事业，都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把握正确的方向和科学的思想工作方法。因此，邓小平强调：思想文化战线的同志，“作为灵魂工程师，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学、讲演、表演，教育和引导人民正确地对待历史，认识现实，坚信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鼓舞人民奋发努力，积极向上，真正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为伟大壮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英勇奋斗。”^①

邓小平还认为，社会风气的好坏，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否有成效的重要体现。而要改善社会风气，就必须首先端正党风，发挥执政党的表率作用。他指出：“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首先要着眼于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②“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③因此，“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特别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0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4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7页。

是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同志以身作则”。^①“在目前的历史转变时期，问题堆积如山，工作百端待举，加强党的领导，端正党的作风，具有决定的意义。”^②他认为，加强党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要着力抓好两件事：一是加强自身的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搞好党风；二是以模范行动和艰苦工作，组织和推动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和任务明确提出来以后，围绕着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和任务，我们党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已经逐步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系统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体系，提出了一系列有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正确方针和原则，创造了许多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行之有效的具体形式和方法，初步找到了一条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 new 路子，从而为进一步领导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另外，邓小平还分别在不同的场合、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进行了许多阐述和论证。他曾经指出：第一，自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来，就证明没有无产阶级政党就不可能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二，自从十月革命以来，更证明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社会主义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7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8页。

建设。第三，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中国。第四，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建设，就不可能实现中国的四个现代化。^①他还说过：“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党的领导，艰苦创业的精神就提倡不起来；没有党的领导，真正又红又专、特别是有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队伍也建立不起来。这样，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祖国的统一、反霸权主义的斗争，也就没有一个力量能够领导进行。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②

总之，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和现实的要求。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中国的昨天和今天，也决不可能有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明天。

①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9—170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66页。

第二章 坚持党的领导必须 努力改善党的领导

邓小平在深刻、全面地阐述论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重大意义的同时，从维护党的领导权威、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根本立场出发，特别强调党要善于领导，要努力改善党的领导。1980年1月，他在题为《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重要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了“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①这一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的重大问题。他讲：“怎样改善党的领导，这个重大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不好好研究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坚持不了党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68页。

的领导，提高不了党的威信。”^①在这篇重要报告中，邓小平还谈到：改善党的领导，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除了改善党的组织状况以外，还要改善党的领导工作状况，改善党的领导制度”。^②在此后发表的一系列讲话和文章中，又多次论及这一问题，对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坚持党的领导与改善党的领导的关系，为什么要改善党的领导，切实改善党的领导必须坚持哪些正确的方针原则等一系列问题，都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使之成为邓小平执政党的建设思想中一个富有创意的基本内容。

一、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

坚持党的领导是改善党的领导的出发点和归宿；改善党的领导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

坚持党的领导和改善党的领导，这是党的领导问题的两个方面。坚持党的领导所要解决的，是社会主义事业要不要党的领导和为什么必须由党来领导的问题；改善党的领导所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1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69页。

要解决的,则是如何更好地实现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不断提高党的执政本领和领导水平的问题。这两者紧密联系,相辅相成,构成了一个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

作为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国共产党杰出的领导人,邓小平始终把党和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牢牢地把握住整个工作大局的政治方向 and 基本原则。在论述如何改善党的领导,推进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以至整个改革开放大业的过程中,他时刻都把是否有利于更好地坚持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作为出发点和归宿。他指出:我们的改革,“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① 1979年,当我国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时候,邓小平就明确地指出: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针对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散布怀疑甚至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政治多元化”、“多党制”的错误言论,而党内也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言论的危险,甚至直接或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纵容和支持的情况,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各种怀疑甚至否定党的领导言论进行有力的反驳,并多次严肃地批评了党内一些同志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面前表现出来的涣散软弱状态。他要求:“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1页。

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①要求党的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必须有坚强的党性。在选拔任用干部的问题上，邓小平始终强调要把革命化摆在首位，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的前提下实现干部队伍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政治上可靠的人手里。在总结1989年春夏之交那场政治风波的教训时，邓小平又多次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②他还说：“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并不是选的时候不合格。选的时候没有选错，但后来他们在根本问题上，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栽了跟头。”^③坚持党的领导，归根到底，就是要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邓小平特别强调：“中央要有权威。”^④他认为：在民主集中制“四个服从”原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全党服从中央。“只有全党严格服从中央，党才能够领导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为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任务而战斗。任何人如果严重破坏这一条，各级党组织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就必须对他严格执行纪律处分，因为这是党的最高利益所在，也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所在。”^⑤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4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7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1—272页。

努力改善党的领导，既是党的事业不断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从党的现状和党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出发而得出的科学论断

回顾党的建设历史，凡是我们党能够根据革命和建设形势、任务的变化，自觉而及时地调整组织机构、改革领导体制、改进工作作风和活动方式，党的事业就前进，力量就壮大。反之，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力量就会受到削弱。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早在1956年，邓小平在党的八大所做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就指出：“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①为此，“必须有系统地改善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方法”。^②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始终强调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并在实践中大力推进党的领导体制的改革和领导方式的转变。这既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原理的正确理解和运用，基于对党的建设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对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同时也是针对党的现实状况存在的问题和弊端，立足于党所面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的迫切要求而提出的科学论断。

首先，努力改善党的领导，是拨乱反正，重树党的领导权威，恢复党的凝聚力与战斗力的迫切需要。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极左思想和政治路线遗毒的影响，特别是“文化大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14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23页。

革命”十年的破坏，“我们党在人民当中的威信不如过去了”。^①党的队伍中存在着严重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

在思想上，许多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思想不解放，头脑僵化，用“左”的眼光看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对改革开放心存疑虑，甚至抱有抵触情绪，极少数人甚至公开抗拒和攻击党的基本路线。也有一些党员干部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失去信心，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采取同情、纵容态度，以至于附和这类言论，散布怀疑、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观点，把自己放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上去。

在组织上，正如邓小平所指出：“三千八百万党员，相当一部分不合格。”^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入党的新党员中，有一些因为一直没有受到党的教育，不能成为群众的模范，不合格。我们有些老党员长时期很合格，现在也不能成为群众的模范，不那么合格了。我们提倡党性，反对派性。有些人就是死抱着那个派。派性高于党性的大有人在，包括我们某些老党员在内。”^③更为严重的是，尽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进行了揭、批、查，坚决清除党内打、砸、抢分子和帮派体系头头，但仍有一些危险分子没有改变立场，在党内隐藏下来，伺机反扑。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6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81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68页。

在作风上，有些党员干部经不起资本主义、封建主义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蚀影响，道德败坏、作风堕落，革命意志衰退，官僚习气严重，生活特殊化，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为政不廉，小病大养，办事拖沓。还有些党员纪律涣散，完全按个人的意愿发表言论，自由散漫。

所有这些，都损害了党的威信，影响了党的凝聚力与战斗力。要改变这种状况，重树党的领导权威，恢复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本来性质和面貌，就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

其次，只有努力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领导水平，我们党才能担负起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重任。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努力改善党的领导，不仅仅是要拨乱反正，把党的自身建设和领导工作状况恢复到历史上的最好时期，而且要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把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因为，在新时期，党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使通过拨乱反正，使党的建设和领导工作简单地恢复到历史上最好时期的水平，如延安时代、建国初期等，由于形势和任务的不同，党的领导也仍然面临着进一步改善的问题。所以，努力改善党的领导，更重要的是，要使党的领导方式、领导作风和领导体制摆脱过去适应于革命战争年代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的框框套套，把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要立足于如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有所发展，有所创新，从而在党的领导和自身建设方面，建立一套新机制，闯出一条新路子。

如前所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围绕着如何

领导武装斗争和夺取政权，逐步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领导方式、领导作风和领导体制。新中国成立后，这套领导方式、领导作风和领导体制并没有因党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的转变而发生根本的变革，而是伴随着“左”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形成、发展而不断得到强化，并在十年“文革”中被推向了极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逐步形成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治路线，在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面前，原有的那套旧的领导方式、领导作风和领导体制以及党员干部队伍的素质与能力，都呈现出种种不相适应的状态。

第一，在革命战争年代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我们党主要依靠急风暴雨式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加强自身建设，实现对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需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健康稳定的社会环境，需要依靠经常性的工作和制度建设，采取循序渐进、积极稳妥的领导方式方法和和风细雨、细致入微的思想工作作风，来逐步推进改革开放事业，保持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持续稳定、健康迅速地发展。

第二，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政权尚未建立，或者在高度集权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下，我们党习惯于直接地管理、包办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具体事务，直接向人民群众发号施令。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却要求正确划分党政职能，理顺党政关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体系直接管理国家和社会具体事务的作用；要求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一

样，都必须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第三，在革命战争年代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形成、发展起来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干部制度，在新的形势和任务下，产生了严重的弊端，主要表现为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等。这些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①“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②

第四，现代化建设需要一大批年富力强而又懂得先进技术和现代化管理的党员干部。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十年“文革”的耽误，在改革开放初期，党的干部队伍出现了严重的“断层”现象，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年龄结构、文化结构、知识结构等远远适应不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正如邓小平所讲：“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不是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对不对，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路线、方针的人才。”^③

党的领导方式、领导作风、领导体制和党员干部队伍的素质能力存在的这些问题和弊端，都严重地妨碍着改革开放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7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20—221页。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妨碍着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努力改善，党就很难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迫切需要，很难担负起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重任。

再次，努力改善党的领导，也是整个改革大局的必然要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经济决定政治，而政治对经济又具有重要的反作用。众所周知，我国的改革事业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但是，理论和实践的结果都清楚地告诉我们，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仅有经济体制的改革是远远不够的。作为当代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始终把我国的改革视为一场全面深刻的改革，认为改革不仅涉及到经济领域，也涉及到思想、文化、科技、教育领域，特别是政治体制领域的改革。他指出：“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① 又讲：“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② 而由于我们党是执政党，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坚持党的领导是我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4页。

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核心内容和根本特征之一，因此，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对政治体制改革所提出的要求，首先就体现为对改善党的领导的要求。改革政治体制，首先就是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就是要理顺执政党和国家政权的关系，就是要理顺执政党和参政党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只有努力改善党的领导，使党的领导方式、领导作风、领导制度不断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要求，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固有的弊端才能从根本上革除，我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大业才能顺利进行，并且最终取得成功。

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把握正确的方针、原则

邓小平不但论证了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而且提出了改善党的领导必须把握的总的方针、原则。

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的有机统一

党的领导的主要内容和根本特征是什么？列宁曾经提出过“总的领导”原则，认为党要从政治上领导无产阶级，并进一步指出：“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

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①可惜列宁过早逝世，这一思想原则来不及进一步展开和付诸实践。在我国，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也曾经指出，无产阶级要通过它的政党实现对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即要“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没有这种具体目标，是无所谓政治领导的”。^②然而，毛泽东的党建理论，在这一问题上强调得较多的还是党的“一元化”领导，他认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③特别是在其晚年的理论与实践，党的领导职能更被无限制地扩大，党的领导被行政化、权力化，党成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万能的管理者。

总结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邓小平继承并发展了列宁、毛泽东的正确观点，提出了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的思想主张。他在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党委的领导，主要是政治上的领导，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④1980年2月，邓小平在谈到如何改进党的工作方法时又指出：“比如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党委只管大的政治问题、原则问题，厂里的生产、行政方面的管理工

① 《列宁文稿》第2卷，第40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262—263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第832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98页。

作，就应该由厂长负责统一指挥，不能事无大小都由党委包起来。”^①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他又指出：“政府工作当然是在党的政治领导下进行的。”^②在这里，邓小平所提出的党委的领导是政治领导的思想主张，既是直接针对科研机构，针对企业和政府而言，同样也应该适用于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应该成为改善党的领导必须坚持的一般性方针、原则。此后，邓小平又在一些讲话中多次表述这一思想主张。其主要内容包括：

1. 党的领导应该是一种带有方向性、全局性和根本性的高层次的领导，是一种宏观的决策，而不是具体的管理。“党委如何领导？应该只管大事，不能管小事。”^③

2. 党的领导主要不是依靠权力和强制，而是靠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靠细致入微的思想政治工作，去号召、吸引、影响人民群众朝着党所确定的正确的方向前进。

3. 党的领导职能不能混同于国家政权机关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的职能，要认真研究如何理顺党政关系、实行党政分开。“各级党组织应该把大量日常行政工作、业务工作，尽可能交给政府、业务部门承担。”^④要通过充分发挥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的作用，来实现党的政治领导。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8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9—340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7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5页。

4. 要通过制定正确的干部方针和政策，培养、选拔大批德才兼备、符合“四化”标准的合格人才，通过努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来实现党的政治领导。

根据邓小平的思想观点，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

邓小平在强调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的同时，并没有忽视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领导作用。

——关于党的思想领导，邓小平始终强调，要在抓好党自身的思想理论建设的基础上，切实加强和改进党对思想文化战线的领导，通过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文化水平。他认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改善党的领导的最主要方面。要花大力气克服党对思想战线和文艺战线的领导工作中存在的软弱涣散状态，积极主动、理直气壮而又有说服力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辩证关系的高度，充分认识和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保证推动作用。总之，“必须有效地加强和改善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①既要继承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又要开拓创新，不断总结经验，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造新办法，这样，才能扎实有效地加强党的思想领导。

——关于党的组织领导，邓小平认为：“组织路线是保证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4页。

政治路线贯彻落实的。”^①“不进一步解决党的组织路线问题，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就得不到可靠的保证。”^②党的组织路线的核心，是党的干部问题，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问题。邓小平一贯坚持认为“党管干部”是实现党的政治领导的重要保证，提出要按照“四化”方针建设一支能胜任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党的干部队伍。站在无产阶级战略家的高度，邓小平特别强调要培养和选拔好接班人。强调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国家要长治久安，关键在人。“中国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有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强的人来接班才能保证。”^③要把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选进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构里。

综上所述，邓小平既提出了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的思想观点，又认为政治领导、思想领导与组织领导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决不能将三者割裂开来或者对立起来。党的政治领导是党的领导的首要问题，它着重解决的是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问题，是执政党职能与权力的核心。离开了党的政治领导，或者党的政治领导出现失误，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就会迷失目标和方向。而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离不开以正确的思想理论为指导，其贯彻执行也必须由掌握了正确的思想武器的人去承担，必须通过党的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5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3页。

各级组织和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去组织、带领。因此，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是政治领导的前提基础和物质保证。否定或削弱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是对党的领导的削弱和否定，只有在实践中将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党的领导才有可能得到不断的加强。

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各级党委要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

纵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全面地揭示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指出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又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从而为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奠定了理论基础。列宁在《共产主义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科学地论述了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相互关系，指明了领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集团，从而确立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并以其坚决地遵循这项原则、始终维护领导集体权威的出色行为，为无产阶级政党树立了光辉典范。斯大林在领导苏联共产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也曾就为何要坚持集体领导原则提出过一些非常正确的思想观点。然而，斯大林在长时期的实践中，恰恰正是犯了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错误，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挫折，带来了灾难，留下了深深的隐患。在我们

党的历史上，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都是搞家长制的。”他们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可惜，这些好的传统没有坚持下来，也没有形成严格的完善的制度。”“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这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①毛泽东在晚年违背了自己一度倡导和坚持的集体领导原则，最终免不了重蹈斯大林的覆辙，导致“文化大革命”这场历史悲剧的发生。

历史经验表明，任何个人的经验和智慧总是有限的。正确的领导决策和思想主张只能来自广大群众的实践，来自集体的经验和智慧，即使是经验很丰富、才能很高的伟大人物，如斯大林、毛泽东等，也不可能熟悉一切领域的问题，也只有依靠集体的智慧和经验，去联系广大党员并通过广大党员联系人民群众，依靠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才能作出正确的决定，保持正确的领导；而当他们一旦脱离集体，脱离广大党员和工农群众，自我封闭，就不可避免地会逐渐使自己的头脑僵化起来，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偏差失误，甚至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灾难性后果。

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邓小平在论述改善党的领导的问题时，反复强调要反对“家长制”、“一言堂”，强调必须坚持集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0页

体领导原则。根据他的思想主张，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鲜明地提出：“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之一。”十二大党章明确规定：“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

吸取斯大林、毛泽东晚年违背自己倡导的集体领导原则的沉痛教训，一方面，邓小平并不一般地、笼统地谈论集体领导问题。他认为，集体领导原则的贯彻执行，不能仅仅依靠个人的思想品格和工作作风，更应该注重将集体领导这一抽象的原则进一步具体化、规范化，制定为周密的、切实可行的、能够在较长时期发挥作用的制度和条例，通过建立健全能够充分体现集体领导原则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使各级党的领导干部都能够受到严格的约束。另一方面，邓小平又十分重视发挥个人的才能，重视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对于集体事业的重要作用，重视个人智慧与集体智慧相结合。他指出：“我们主张巩固集体领导，这并不是为了降低个人的作用，相反，个人的作用，只有通过集体，才能得到正确的发挥，而集体领导，也必须同个人负责相结合。没有个人分工负责，我们就不可能进行任何复杂的工作，就将陷入无人负责的灾难中。”^①为了实行这一制度，邓小平主张，党委的工作必须划分为两种，“一种叫日常性质的问题；一种叫重大的问题，或者是政策性质的、重大性质的问题”。^②重大问题一定要集体讨论和决定。决定时要严格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不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34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11页。

能书记个人说了算。而日常性质的问题，则应建立严格的个人负责制，做到责任到人，权力到人，严格考核，赏罚分明。另外，邓小平还认为，在党的各级领导班子中，一定要树立核心，注意维护第一把手的权威。他讲：“在任何一个组织中，不仅需要分工负责，而且需要有人负总责。没有小组长，一个小组也不能行动，这难道不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吗？”^①“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②在邓小平的倡导推动下，1980年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恢复党的八大所制定的集体领导制度，即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并且设立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进一步决定党中央不再设立党的主席、副主席，只设总书记。总书记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成员之一，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会议，由集体讨论作出重大决策。这样就初步形成了中央领导层的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对于健全党内民主，实行集体领导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在此同时，我们党成功地解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长期没有解决好的接班人问题，建立了集体交接班制度，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权顺利地实现了由第二代领导集体向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转移，逐步确立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邓小平殷切地期望全党要坚决维护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权威，殷切地期望这一代领导集体要坚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34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0页。

持集体领导，团结一致，努力工作，做出实绩。他强调：“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①

遵循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原则，走依法治国的路子

一个政党在取得政权成为执政党以后，究竟如何治理国家，在历史和现实社会中，存在着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以党治国，一种是以法治国。以党治国实际上是封建社会“人治”的延续和变种。在“人治”的情况下，不是没有法律，而是个人的意志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一言可以立法，一言可以废法，人在政存，人亡政息，社会政治往往随着人事更替和领导人的好恶而变动。在旧中国，国民党是以党治国的典型。当时虽然也有宪法和法律，但蒋家王朝却实际主宰着党政军大权，大搞个人独裁、一党专政，任意迫害、杀戮革命者和民主人士，用残酷手段排斥异己力量，法律和司法机关成了他们实行一党专政的工具。

无产阶级政党从成立开始，就把自己当做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谋求解放的工具。正如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所指出：“同资产阶级的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0页。

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①在取得政权之前，无产阶级政党蔑视作为剥削阶级意志集中体现的一切国家法律，而且在革命胜利后，坚决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废除一切旧法律。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政权建立后，就应当自觉地运用法制来治理国家，应该带头遵守作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意志和利益根本体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与法律。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列宁就要求各级党员干部要根据法律管理国家，认为党应当通过苏维埃机关在苏维埃宪法的范围内来贯彻自己的决定。但是，此后斯大林在领导苏共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并没有很好地贯彻列宁的这一思想主张，以言代法，破坏、践踏社会主义法制的现象愈演愈烈，给社会主义运动造成严重损害和恶劣影响。邓小平历来反对以党治国，主张依法治国。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深刻地指出：“‘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②因此，他要求共产党员要带头遵守抗日民主政权的法令，严格依法办事。我们党在成为执政党之后，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国家政权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卓越成就，在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从5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封建专制社会“人治”思想遗毒的侵蚀影响，在我们党内轻视法制、有法不依的现象日趋严重，特别是十年内乱期间，在毛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17—21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2页。

泽东同志的重用下，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肆意践踏宪法和法律，以言代法，以权凌法，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使社会陷入混乱，国家陷于瘫痪，使党无法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反复强调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性，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强调要改变过去以党治国，以党代政的领导方式，走依法治国的路子。根据邓小平的有关论述，我们党必须做到如下几点。

首先，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我国的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条文化、定型化、法律化。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是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但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不能等同于国家宪法和法律。党的政策可以而且应该影响人民，但并不直接具有法律效力。只有经过实践证明比较成熟的、需要整个社会严格遵守的党的政策，并且经过一定程序，得到国家权力机关的确认，才能转化为国家法律。因此，决不能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国家宪法与法律存在着一致性为由，而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代替国家宪法与法律。所以，邓小平认为党的政策与国家法律要协调一致地发展。党不但要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而且要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和带动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自觉遵守和严格执行国家宪法和法律。

其次，党要管党内纪律的问题，法律范围的问题应该由国家管。坚持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走依法治国

的路子，一个基本内容，就是要科学地划分党政职能，明确各自的性质、地位和权限，充分发挥国家机关、群众团体、经济文化组织的作用，该管的管，不该管的就不乱加干预。为此，邓小平指出，要坚决革除我国政治体制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弊端，实行党政分开。他强调：“属于法律范围的问题，要用法制来解决，由党直接管不合适。党要管党内纪律的问题，法律范围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党干预太多，不利于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①

再次，党要学会掌握运用法律武器来治理国家。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国家和社会事务必将越来越多地纳入法制轨道，通过法律手段来处理、解决。如何适应这一转变，学会依法办事，这对于长期以来习惯于领导和从事武装斗争，发动和开展群众运动的广大党员干部来讲，无疑是一个新考验、新课题。为此，改革开放一开始，邓小平就号召全党要加强学习，不仅要学习政治理论，学习专业知识和管理知识，还要学会掌握、运用法律武器来治理国家。他指出：历史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② 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能“采取过去搞政治运动的办法，而要遵循社会主义法制的原则”。他要求：“全党同志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宪法、法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6页。

律、法令办事，学会使用法律武器（包括罚款、重税一类经济武器）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进行斗争。这是现在和今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过程中要求我们必须尽快学会处理的新课题。”^①

最后，任何组织和个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宪法和法律是普遍适用的社会行为准则，对一切个人和社会组织都具有同等的约束力。执政党的党员和各级组织当然也不例外。为此，邓小平特别强调，包括每一个党员在内的所有公民，无论职位高低，功劳大小，“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义务，谁也不能占便宜，谁也不能犯法”。^②对于违法乱纪案件，“不管牵涉到谁，都要按照党纪、国法查处。要真正抓紧实干，不能手软”。^③

在邓小平的倡导下，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首次明确提出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原则。1982年，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中正式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并要求：“从中央到基层，一切党组织和党员的活动，都不能同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党的十三大、十四大都重申了这一原则。与此同时，在我国现行宪法中也载入了这样的内容：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政党，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这样，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71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2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2页。

动的原则，就成了党在组织、领导国家和社会活动中必须严格遵守的法律规定，成为新时期改善党的领导必须遵循的一项重要原则。

改善党的领导，还必须掌握运用“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方针，保证两个文明建设和各项工作的协调发展

邓小平说：“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如像经济与教育、科学，经济与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①为此，他做了一个生动形象的比喻：人有两只手，各自都要发挥作用，如果失去一只手，或只懂得使用一只手，整个身体就会失去平衡，因此，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是唯物辩证法“两点论”在思想认识和领导工作方法中的具体体现和灵活运用。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充分运用“两手抓”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针，去认识并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赋予了“两手抓”以丰富的内涵，使“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成为新时期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所必须坚持的又一重要方针、原则。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9—250页。

首先，邓小平把人类社会的文明科学地划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大基本领域，深刻地分析了两个文明建设的关系，在强调新时期党的各项工作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明确指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内容之一，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和优越性之所在，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而且也是物质文明建设的基本保障。他说：“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① 他还曾讲过：“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② 1986年，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又再讲到：“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③ 因此，要“两手抓”，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

其次，邓小平在强调两个文明要一起抓、为我们党确立了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方针的基础上，还针对改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0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8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4页。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各个领域和各项工作出现的问题和倾向，进一步提出了许多有关“两手抓”的具体方针、方法，主要有：

1. 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既要防止“左”，又要警惕右。邓小平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因此，要坚持一手抓改革开放，做到有“左”反“左”；一手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做到有右反右。鉴于历史教训和现实的危险，邓小平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①

2. 为了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必须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明确提出：“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②后来在总结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的教训时又指出：“要两手抓，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两点论。”^③1992年视察南方时，他再次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④

3. 搞四个现代化要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改革开放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04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6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8页。

和现代化建设需要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良好的法制环境作保障。如果法制不健全，以权代法，以言代法，社会环境、经济秩序就难以搞好，广大人民及外商对我们党的领导就会失去信心，现代化建设就无法搞上去。因此，“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①

此外，在如何正确处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消极腐败现象的问题上，邓小平提出要一手抓教育，一手抓法制；在体制改革方面，邓小平提出既要大力开展经济体制改革，又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既要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又要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等等。

总之，“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是邓小平娴熟灵活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到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从而得出的重要思想方针和领导工作方法，是新时期改善党的领导必须遵循的重要方针和原则。掌握运用这一方针、原则，就能使党的领导更加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要求，就能避免出现重大失误，促进两个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协调地发展。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4页。

第三章 逐步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实行党政分开

在执政的条件下，党的领导首先体现为执掌国家政权，体现为对国家政权系统的领导。因此，如何建立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执政党与国家政权机关的关系，使党既能切实有效地掌握国家政权，督促协调各个国家政权机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又能充分调动发挥国家政权机关的积极性、创造性，维护国家政权应有的权威，保证各个国家机关独立自主地行使职权，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就成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首先解答的重要课题。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高度重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在1980年8月1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专门就此发表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

讲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党和国家现行领导制度中存在的权力过分集中和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严重弊端，提出了克服这些弊端的具体措施、步骤和方法。

1986年9月，在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谈话中，邓小平又进一步强调，要把逐步改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实行党政分开，摆到新时期改革党的领导、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位置。并围绕着这一关键问题，进行了许多创造性的探索和实践，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思想主张。

一、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实行 党政分开，既是历史经验的总 结，又是现实形势的要求

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后，如何建立起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同国家政权的关系，这是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长期未能解决好的重要问题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因为没有领导执政党的经验，对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党政关系和领导制度问题未作具体阐述。列宁在领导布尔什维克党执政的短暂历程中，一开始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特别是苏维埃政权

刚刚诞生，还不能全面地、独立地担负起管理国家各方面事务的重任，因而产生过由党“直接执政”的思想，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高度集权领导体制也初步建立。在后期，列宁逐渐认识到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与弊端，开始关注如何改善党政关系、正确划分党政职能的问题，并提出了“党政分工”和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应是一种“总的领导”，而不是对“细节的干涉”的思想主张。但是，由于逝世过早，列宁的这一思想主张没有来得及深入展开和着手实践，更未能从体制的高度和深度去分析产生这些问题与弊端的根本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在此后斯大林领导执政的近30年期间，苏联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高度集权领导体制不断强化，并被当作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固有特征，广泛推广套用到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当中。

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因为处于战争环境，全国性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政权尚未建立，我们党参照苏联党政关系的模式，在根据地和解放区逐步形成推行了以党的统一的一元化领导为基本特征的政治领导体制。1942年9月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的关系的决定》指出：党“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地委），因此，确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区党委、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但是，即使在当时那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仍然比较注意正确处理

党政关系，比较注意克服领导体制中以党代政、过分集权的现象。上述《决定》就同时规定：“政权系统（参议会及政府）是权力机关，他们的法令带有强制的性质。党委与政权系统的关系，必须明确规定。党委包办政权系统工作，党政不分的现象与政权系统中党员干部不遵守党委决定、违反党纪的行为，都必须纠正。为了实行三三制，党对政权系统的领导，应该是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领导，而不是事事干涉，代替包办。”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迅速领导建立了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并且有步骤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随着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体系的逐步建立，战争年代形成的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领导方式和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所产生的问题也逐步凸现出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正确处理党政关系、理顺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呢？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此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提出了一些改进的办法和正确的思想主张。如，1951年11月，党中央在《关于在人民政府内建立党组和组织常委会的决定》中指出：“党政之间不是隶属关系，党的领导是通过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在政权机关任公职的党员发挥作用来实现的；如果把党对国家的领导作用看作是党直接执掌政权，管理国家，实际上就否定了国家政权机关的职权，这是对执政党地位的错误理解。”1956年，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就党与国家机关的关系，也作了专门的论述，指出：党对国家工作的领导，并不是说党可以直接去指挥国家机关的工作，或者把各种纯粹行政性的问题拿到党内进行讨论，混淆党的工作

和国家机关工作所应有的界限。然而，我国曾经是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的国家，封建主义残余尚未肃清。而且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领导方式和高度集权的领导制度搞久了，习惯了，总是认为在战争年代凭借着这种领导方式和领导制度夺得了政权，在和平建设时期也同样能够依靠这种方式巩固政权，建设社会主义。再加上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模式的制约影响，错误地把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领导方式和高度集权的领导制度当成社会主义的特征和优越性之所在。这些主客观因素交错纠缠在一起，严重地压制着科学和理智，使上述那些正确的规定和思想主张未能付诸实践，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高度集权的现象并未真正得到扭转。1957年反右斗争中，“党不能直接发号施令”这个本来是正确的口号却被当作右倾反党言论而遭到批判。“大跃进”后期，在反对分散主义的旗号下，国家政权机关的许多权力被进一步收归党委，为了体现“书记挂帅”的原则，各级党委的领导人按照工、农、财、文等战线分工把口，并对口设立了与政府机构职能重叠的党委部门，具体地领导、管理各行各业的业务工作。此后，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高度集权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不断得到强化，党委直接包办代替国家政权机关的现象愈来愈普遍。随着党内正常民主生活被破坏，“一言堂”、“家长制”、个人崇拜作风的滋长，党的一元化领导进一步演变成了个人崇拜、个人专断。“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不能正常发挥作用，中央文革小组和各级革命委员会集党、政、军、民领导权于一体，取代了国家政权系统的职权，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受到

了严重的践踏、破坏，党政关系进一步脱离了正常轨道，陷于扭曲变形的状态。

逐步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实行党政分开，是新时期改善党的领导，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全面系统的拨乱反正工作的进展，各级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系统的地位、职能和作用不断得到恢复和健全。但是，在“文革”爆发前业已形成的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高度集权领导体制并没有因为“文革”的结束而改变，尤其是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这种体制的缺陷与弊端日益明显地凸现出来。一方面，它妨碍了国家政权系统应有的职能作用的发挥，不利于调动广大群众和各方面力量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另一方面，也使执政党无法集中精力搞好自身建设，抓好大政方针政策的领导，使各级党委陷于日常的行政事务和具体的管理工作中，无法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进行正确的宏观决策，无法驾驭矛盾、总揽全局、做好协调和督促工作，并且易于产生官僚主义和个人专断。其结果，不仅没有加强党的领导，反而降低了党的领导地位，削弱了党的领导作用，影响了党的领导水平的提高。为此，改革开放一开始，邓小平就明确地提出了要解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权力过分集中和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问题。1980年8月18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专门就这一问题发表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在这篇讲话中，邓小平提出了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著名论断。他认为，要防止和避免“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那种情况的重新发生，要“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①他指出，党和国家现行领导制度中存在着不少弊端，而权力过分集中和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就是产生这些弊端的主要原因。他讲：“权力不宜过分集中。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③所以，要着手改革过分集中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④党和政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6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1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8—329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1页。

府、经济组织、群众团体之间要明确、合理地划分职权，使党“可以集中精力管党，管路线、方针、政策”。要“建立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使其能够“管好政府职权范围的工作”。^①1986年9月至11月，他在谈及有关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时，又多次强调，高度集权、党政不分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和今后形势与任务的要求，是滋长官僚主义、导致工作效率低下的主要根源。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②为什么要把这一问题摆到如此重要的位置上呢？邓小平认为：首先，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而“效率不高同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作风拖拉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涉及党政不分，在很多事情上党代替了政府工作，党和政府很多机构重复”。^③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实行党政分开，就能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

其次，长期以来，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难以根除，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生活难以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难以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屡遭破坏，都与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高度集权领导制度有着直接的联系。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实行党政分开，就可以为解决上述问题创造良好的前提条件。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1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7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9页。

再次，改善党的领导，改革我国政治体制，不但包括理顺党政关系，改善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而且也包括要理顺执政党与参政党，执政党与其他各种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的关系，以及国家政权机关之间及其与各种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要改善党对其他各种组织的领导。但是，在众多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中，党和国家政权机关的关系始终是首要的和带有决定性的。党政关系不顺理，也就谈不上理顺其他关系。因此，改革高度集权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理顺党政关系，实行党政分开，也就抓住了我国现行政治体制的主要矛盾，抓住了新时期改善党的领导的要害。

最后，高度集权、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领导体制由来已久，积习很深，从观念到组织、制度、方法都是配套的。在现实中，“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①总是把这种体制当作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本质特征，把加强党的领导等同于以党代政，等同于党组织直接包办干预。不突破这种观念，改革这一领导体制，其他方面的改革，如权力下放、机构精简、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以及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等，就无法顺利进行，党的领导就无法真正得到加强和改善。

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和党政关系的问题上，从党的一元化领导到理顺党政关系，实行党政分开，这是我们党在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上的一个重大突破，是新时期加强和改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8页。

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重大举措。对此，邓小平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做出了最为突出的贡献。

二、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实行党政分开，必须把握正确的方向和步骤

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实行党政分开，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而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

邓小平指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①如前所述，坚持党的领导和改善党的领导，这是党的领导问题的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作为新时期改善党的领导的一项重大举措，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实行党政分开，不是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承认不承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的问题，不是党政分裂或分家，这是首先必须明确的。同时，党政分开也不同于党政分工，“分工”一般是指根本性质和基本职能相类同的社会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1页。

组织内部各个机构之间的职权划分、任务分配，如国家政权系统中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职权划分，党委系统中组织、宣传、统战等部门的职权划分等；“分开”则是为了解决根本性质与基本职能不同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问题。

根据马克思主义建党原理，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先进分子的集合体，党的根本职能和宗旨是，推翻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做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谋求解放的工具，而不是人民的主宰，不是向群众发号施令的权力组织，也不是行政组织和生产组织。正如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所指出：“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确认这个关于党的观念，就是确认党没有超乎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向人民群众实行恩赐、包办、强迫命令的权力。”^① 与党的性质和职能不同，社会主义国家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行使当家做主、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权利的组织形式。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法定程序，选举任命国家和地方的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检察、审判机关，授权国家政权机关代表自己，直接管理国家事务，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党政关系的实质，是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党的阶级性与先进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18页。

性，决定了党要执掌国家政权，领导国家事务。国家各政权机关只有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才能明确社会主义的性质与方向，才能协调一致、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这样，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才能得到充分实现。但是，党毕竟只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党只能包含在人民群众的整体之中，而不能超越这个整体之上。从组织产生的意义讲，党的领导机关不同于国家政权机关，前者是由其党员选举产生的，与此相应，党的组织纪律只能对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有约束力；而后者是由全体人民经过法定程序直接选举产生，或者由人民代表机关任命组成，因此，国家机关制定的宪法和法律及做出的决定，可以也必须普遍适用于各类社会组织和全体人民，包括执政党的组织和党员。对于违背国家宪法和法律，拒不服从有关决定的任何个人或社会组织，国家机关可以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予以处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思想主张和意见建议可以而且应该影响人民，引导国家和社会生活，必要时还可以通过法定程序，取得国家权力机关的确认，上升为国家意志，成为全社会必须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但党不能直接制定宪法和法律，党的各级组织不能越过政权机关，直接向人民群众发号施令。总之，党领导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就必须充分尊重人民的意愿，努力维护国家政权机关的权威，协调处理好各个国家政权机关的相互关系，充分发挥国家政权机关直接管理国家事务、处理社会矛盾的职能作用。这样做，必将有利于调动国家政权机关和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加强党的领导。如果过去那种高度集权、以

党代政、党政不分的领导制度不改革，党组织事事包办代替，干预太多，不但违背了党的性质、职能和宗旨，而且还会妨碍党的作用的正常发挥，削弱党的领导，危及党的执政地位。

因此，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实行党政分开，就是在确立党的执政地位，明确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作用的前提下，科学、合理地划分执政党与国家政权的职能和任务，划分党的组织工作机构同国家政权机关的职责权限，建立健全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增强党和国家机关活力，克服官僚主义，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从而保证党和国家机关各司其职，积极主动，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更加切实有效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实现党的领导。

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实行党政分开，不是对党的传统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的全盘否定，不能照搬西方国家那一套，而必须立足于本国国情，有所继承，有所借鉴，有所创新

善于用辩证的、历史的眼光分析问题，对待传统，这是邓小平思想方式和工作方法的鲜明特色。在如何评价和对待战争年代形成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的问题上，一方面，邓小平明确指出，这种领导体制已经无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已经到了非改不可、刻不容缓的程度；另一方面，邓小平又强调，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实行党政分开，不是对党的传统领导制度的全盘否定。在革命

战争年代，由于全国性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尚未建立，就是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已经建立起来的人民民主政权，也还很不完善。而且，那时候党所面临的任务较为单一，形势十分严酷，客观上要求实行高度集中的统一领导。因此，从总体上讲，在当时，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是必要的、合理的。事实上，这种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对于我们党夺取革命胜利也发挥了有力的保证作用。即使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也“不是说不要强调党的集中统一，不是说任何情况下强调集中统一都不对，也不是说不要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问题都在于‘过分’”，^① 在于没有把握好集中统一的“度”。因此，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实行党政分开，还必须坚持有所继承，有所扬弃，还应该看到，“过去我们那种领导体制也有一些好处，决定问题快”。^②

坚持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在立足于党情国情的基础上，敢于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吸纳众家之长，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这是邓小平整个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基本特色。这一特色在邓小平认识和处理党政关系，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有关论述中，同样有着充分的体现。1986年，他在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谈话中讲到：政治体制改革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9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8页。

化”。^①“如果过分强调搞互相制约的体制，可能也有问题。”^②过去我们照搬苏联模式，实践证明不成功。那种高度集权，党政不分政治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即使在苏联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但是它能够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吗？”^③而在另外一些文章、讲话中，邓小平又提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正确处理党政关系，可以而且应该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某些成功经验和合理有效的做法。他曾多次强调，要坚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应该“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④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理顺党政关系，保证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管理和社会主义民主化，“这需要认真调查研究，比较各国的经验，集思广益，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和措施”。^⑤在总结斯大林所犯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错误的教训时，邓小平还提起：“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⑥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的法制较为健全，党政关系已经纳入法制化、正常化轨道，对执政党及其领导人能够实施有效的监督制约。类似于这些合乎一般的民主法制和科学高效原则的政党执政方式和国家权力运作规则，就应该大胆借鉴，批判吸收，并且有所发展，有所创新。

①②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8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7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6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

否则，就有可能重犯过去所犯的错误，“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①

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实行党政分开，既要积极、大胆、坚决，又要循序渐进，不能操之过急

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实行党政分开，要积极、大胆、坚决，这是邓小平一以贯之的思想主张。与此同时，邓小平又反复强调，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实行党政分开，是一项极其艰巨复杂的长期性任务，必须深入广泛地开展调查研究，比较各国经验，逐步理清头绪，循序渐进，配套进行，切不可指望毕其功于一役，不能操之过急。他讲：“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方针必须坚持，但是，方法要细密，步骤要稳妥。”“要先在少数单位进行试点。”^②之所以反复强调这一观点，主要是基于两方面考虑：

一方面，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实行党政分开，这是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而政治体制改革很复杂，每一项措施都涉及到千千万万人的利益，都触及到人们思想观念的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9页。

转变和一些深层次的社会矛盾，都必然会遇到许许多多不曾遇到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以及出现各种各样的障碍和阻力。从这些年的实践情况看，障碍和阻力主要表现为几方面：一是在思想观念上，既有“左”的思维的阻挠，即认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实行党政分开会削弱党的领导，危及党的执政地位；又有来自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的干扰，比如，在机构改革的过程中，就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贬低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把党务机构和政工人员当作“精简”对象的情况，甚至还有人主张，党政要分开，就必须实行多党轮流执政，必须搞政治多元化。二是在对待权力和利益的分配问题上，由于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实行党政分开会打破旧的权力和利益格局，会触及到一些权力和利益关系的调整与再分配。尽管大多数的党员干部都能牢记党的宗旨，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自觉地服从改革大局，服从组织安排，但也确有极少数权力的拥有者不愿意放弃其既得利益，在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实行党政分开的问题上消极观望，甚至反对、抵触。三是在人的素质和能力方面，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实行党政分开，还有赖于党政机关的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素质和能力的提高，需要进一步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法意识，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进程。而这些条件的实现，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仍然比较落后的大国来讲，都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另一方面，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看，如何正确处理党政关系，实行党政分开，迄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如前所述，马克思、恩格斯由于实践的局限，未能对

这一问题作出论述；列宁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短暂历程中，虽曾提出了一些正确的思想主张，但来不及深入展开和付诸实践；在斯大林、毛泽东领导时期形成发展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已被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证明不成功。再从“二战”后相继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看，在建国初期，这些国家普遍仿效苏联，建立起高度集权、党政一体的领导体制，随着社会主义政权的巩固与发展，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弊端日渐凸现，大多数国家也都先后走上了改革的道路，把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理顺党政关系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提出了许多理论观点，采取了各种改革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例如，在东欧，从50年代开始，南斯拉夫就率先摆脱“斯大林模式”的框框，走上了“自治社会主义”的道路，对原来高度集权、党政一体的领导体制进行了调整、改革，明确地提出了“要改变党在国家机关、企业中的地位，实行党政、党企领导分开”的方针原则；匈牙利在50年代后期逐步改革旧的政治体制，建立起新的党政分权的领导体制，明确规定，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要加强国家机关的作用，划分党政机关不同的职权范围；保加利亚在70年代后，也提出了要实行党政职能分开；反对党委和党的工作者包揽政府和社会机构的职能。其他东欧国家除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一直坚持党政合一的体制外，也都不同程度地对高度集权、党政一体的领导体制进行改革。这些改革从本意来说，还是为了改善而不是取消党的领导，其总体方向应该说是正确的。然而，1988年之后，由于内、外压力和主观上的失误，这些国家却提出了更为激进的主张，有意识地

削弱和放弃党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领导，把改革引上了错误的方向。随着苏、东发生了剧变，执政的共产党纷纷丧失了国家政权，这一探索进程也戛然而止。尽管我们不能因为苏、东剧变这一结果的发生，而全盘否认这些国家在探索正确处理党政关系、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应该看到，苏、东国家在这方面所进行的改革探索，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将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借鉴和启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直至剧变发生之前，这些国家仍然没有找到一条改革高度集权、党政合一的领导制度，正确处理党政关系的成功路子，仍然没有建立起既能够适度集权，提高工作效率，又可以调动积极性、增强活力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

总之，在共产党一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如何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实行党政分开，这既没有一套现成的理论可作指导，又缺乏成功的经验、模式可资借鉴，只能逐步探索，循序渐进，配套进行。

第四章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内容

邓小平一贯重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长期从事党和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对毛泽东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关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原理同党所面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相结合，继承和发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观点和思想主张，使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得到了全面的丰富和发展。

一、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 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丢掉思
想政治工作就会使我们党丧失政治优势**

我们党是靠思想政治工作起家的。党本身就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而思想政治工作则是促成二者结合的中间环节。党的发展壮大自始至终也都离不开思想政治工作。还在党诞生以前，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党的创始人就大张旗鼓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十月革命，为党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基础。党创建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入工农群众当中，传播革命思想，依靠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广大党员和群众提高思想觉悟，增强革命斗志，树立共产主义信念，使我们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终于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此期间，我们党深入全面地总结了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使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日臻完善，一系列有关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日渐定型。它主要包括：思想政治工作要紧紧围绕和服务于党的政治任务；坚持实事

求是，实行群众路线；坚持革命精神与物质利益相结合，灌输与疏导相结合，身教与言教相结合；全党都要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等等。建国初期，我们党继承和发扬了战争年代形成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在全国范围内有系统地建立起对人民群众的经常性的宣传网络，建立起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一定制度。这一时期，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形成了生动活泼的良好政治局面，党风和社会风气至今还为人们所称道，国民经济以及社会各项事业迅速得到恢复与发展，这些都同我们党积极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分不开。在此后一段“左”的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的岁月里，思想政治工作偏离了正确的轨道。首先，由于指导思想的偏误导致了思想政治工作根本方向的迷误。同时，思想政治工作本身也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一伙歪曲、践踏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正确理论和优良传统，极大地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败坏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声誉。

历史经验充分证明：在党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的情况下，什么时候重视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继承和发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党和人民的事业就胜利发展；什么时候忽视和放松了思想政治工作，偏离和抛弃了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党和人民的事业就遭受损失。正是在深刻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精辟地指出：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

念”。^①就因为“我们在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导下，从分析实际情况出发，发扬革命和拚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②邓小平认为：“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③没有革命精神，“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④总之，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丢掉了这一传家宝，我们党就会丧失其固有的政治优势。

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是新时期改善党的领导的一个最主要方面

在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后，针对思想政治工作还重要不重要，怎样正确认识思想政治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地位与作用的问题，邓小平明确提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是新时期改善党的领导的一个最主要方面。他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极其艰巨复杂的任务摆在我们的面前，很多旧问题需要继续解决，新问题层出不穷，“群众中需要解决的思想问题很多，党内需要解决的思想问题也很多。我们一定要把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4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8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6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4页。

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切实认真做好，不能放松”。^①他讲：“我们说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中央认为，从原则上说，各级党组织应该把大量日常行政工作、业务工作，尽可能交给政府、业务部门承担，党的领导机关除了掌握方针政策和决定重要干部的使用以外，要腾出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来做思想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做群众工作。如果一时还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至少也必须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重要地位上，否则党的领导既不可能改善，也不可能加强。”^②为什么？

首先，只有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团结和动员亿万人民投身改革开放，为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提供切实保证。邓小平认为，党的事业就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的事业。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离不开广大人民的积极参与和支持。在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艰巨性、复杂性，尤其需要团结和动员亿万人民共同参加。一方面，只有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才能把广大群众的思想、情绪、愿望、要求及时准确地反映上来，为党的正确决策提供依据，为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党的领导不能依靠强制，尤其是实行党政分开后，党所制定的大政方针，党的思想主张要为广大群众所理解、所接受，要化为亿万人民的自觉行动，主要必须依靠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5页。

在广大群众的思想认识领域中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新情况、新问题，只有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及时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坚定人们对改革开放事业的信心，维护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安定团结政治局面，从而为实现党在新时期的宏伟目标提供重要保证。

其次，只有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启发人们自觉抵制各种陈腐观念和错误思潮的影响侵蚀，为改革开放扫除思想障碍。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敏锐地觉察到，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国际交往的增多，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和腐朽的生活方式将会不断地渗透侵入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社会生活当中。同时，几千年的封建历史所残留的落后意识和陈腐观念仍将严重地影响我们。而且，对社会主义的“左”的错误理解也可能会继续束缚广大党员干部的头脑。各种落后的、错误的思想认识互相渗透结合在一起，将会严重地阻碍现代化建设的进展，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极大的危害。因此，邓小平指出，克服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影响，“这是必须认真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①搞现代化建设，既要警惕右，也要防止“左”。要排除各种错误倾向的干扰，纠正各种错误思想，为改革开放扫除思想障碍。而解决思想问题、清除思想障碍的基本途径，就在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

再次，只有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引导群众不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7页。

断提高思想觉悟,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精神支柱。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邓小平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立的根本目标。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这不仅是一种体制的转变,而且也是思想观念上深层次的转变。任何一种健全规范的经济形态,都需要有某种与其相适应的政治和精神体系作为支撑。15世纪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近代欧美各国所建立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靠的是以新教伦理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精神”,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科学文化”三位一体的一种完整的社会形态;20世纪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的起飞,靠的是“儒家集体资本主义精神”和“新权威政治”。我们今天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样需要一种能够维系人心、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思想意识和精神支柱。只有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对广大党员和群众进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大力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引导人民群众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增强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才能克服和消除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腐朽生活方式的冲击影响,才能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最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也是邓小平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所得出的结论。改革开放以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认真贯彻落实邓小平提出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方针,在重视抓好经济工作和业务工作的同时,卓有成效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在实践中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新方法,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较好地发

挥了思想政治工作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然而，随着党的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一些地区和部门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一手硬，一手软”的不良倾向，现实生活中轻视和削弱思想政治工作的情况普遍存在。对此，邓小平早已有所觉察，他曾经多次地指出问题，提醒全党加以注意。如1980年3月，他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就讲到：“军队里的政治思想工作需要加强。现在这方面的工作有相当的削弱，政治工作人员不懂得做政治思想工作。”^①1983年10月，他又强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十二大，对于思想战线的指导方针是正确的、鲜明的，问题在于贯彻执行不力。”^②他认为不能低估思想战线混乱造成的影响，指出，思想战线上精神污染的问题，“再也不能容忍了”。^③1985年9月，他又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很早就提出了。……不过就全国来看，至今效果还不够理想。主要是全党没有认真重视。”^④1987年1月，他进一步指出：“最近，我们有些学生闹事。……问题在于我们思想战线上出现了一些混乱，对青年学生引导不力。这是一个重大失误。”^⑤“这几年来，一直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但反对不力。尽管我多次强调要注意这个问题，可是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党的领导不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0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5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4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3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8页。

力。”^①正是由于这些问题未能引起全党的充分重视，未能采取得力措施，及时解决思想战线中存在的问题，扭转思想政治工作遭受忽视、削弱的倾向，致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不断蔓延，以至出现了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造成严重损失。风波过后，邓小平深刻全面地回顾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②

造成思想政治工作薄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党委放松对这项工作的领导则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为此，邓小平重申，要始终不渝地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要求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首先是党委负责同志，要把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真正提上议事日程，要密切注视和深入研究思想战线的形势和问题，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长期不懈地抓下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认真扎实地贯彻邓小平的这一思想，采取一系列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有力措施，使思想政治工作出现了新的转机，取得了新的进展。实践证明，只要“我们党真正加强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坚决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和自由主义态度，认真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思想战线的上述种种问题都可以解决，也不难解决”。^③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1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6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6页。

二、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 根本任务和总体目标

教育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做“四有”新人，是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和总体目标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必然地对人的各方面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要求人们不但要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还要有较高的思想道德素质。邓小平十分清楚地认识到这一要求，明确地提出了培养“四有”新人这一长期的战略任务。1980年，邓小平就提出：“要努力使我们的青少年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人，使他们立志为人民作贡献，为祖国作贡献，为人类作贡献，从小养成守纪律、讲礼貌、维护公共利益的良好习惯。”^①1985年春，邓小平再次郑重地告诫全党：“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②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思想，1986年9月召开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96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0页。

的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制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明确规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离不开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和关键。所以，培育“四有”新人，既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也是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和总体目标。

在培育“四有”新人的任务中，要特别强调理想和纪律，重点抓好对青少年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纪律的教育

邓小平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①他认为，伟大的理想可以产生强大的精神力量，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战胜千难万险，不断发展壮大，成为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不可替代的政治力量，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1页。

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①“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②因此，不但共产党员自身要坚定共产主义信念，还要教育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一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因为青少年是我们事业的希望，而且阅历浅、历史知识少，不善于辨别真伪，比较容易受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的影响。我们“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③

共产主义理想不是脱离实际的空想，而是紧密地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与现实的实践和奋斗目标联系在一起的。共产主义理想不是一下子就能实现，而是要经过若干发展阶段，划分为若干层次的发展目标的。目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奋斗目标和共同理想，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行理想教育，在现阶段就是要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就是要教育广大群众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勇于创造，积极进取、开拓，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的个人抱负和理想。对于共产党员来讲，在实现每一阶段的任务，做好本职工作的时候，还不能忘记共

①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第2版，第103页。

②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24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2页。

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要牢记“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①“我们采取的各方面的政策，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为了将来实现共产主义。”^②

“有了理想，还要有纪律才能实现。”^③纪律是维系党和人民的团结，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共产主义理想的重要保证。邓小平所强调的纪律，既包括党内的组织纪律，也包括国家的法律法规。进行纪律教育，首先，要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全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同时，要全国人民中进行法制和纪律教育。如果每个人、各行各业，都能遵守各自必须遵守的纪律，整个社会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生活秩序就可以得到保障。而“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在安定团结的条件下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我们特别强调有理想、有纪律，就是这个道理”。^④

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努力学习掌握科学文化知识，也是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

理想是人们的主要精神支柱，决定着人们奋斗的根本方向；而道德则是在共同理想支配下调节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0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2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1页。

④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52页。

如果说，纪律是一种规范人们行为的外部约束机制的话，那么，道德则是一种规范人们行为、调整各种社会关系的内在约束机制；纪律是一种硬约束，道德则是一种软约束。离开了道德这种内在的软约束，纪律就难以得到自觉遵守，理想也同样会成为一句空话。由于十年内乱的影响和破坏，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受到了严重损害。在对外开放条件下，各种外来的道德观念也会随之涌入，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而商品经济注重效益、追求个体利益的价值取向，在激励人们求实进取的同时，也容易诱发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对腐朽糜烂生活方式的追求。对此如果缺乏思想准备，不注重加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大力提倡、培养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这些不健康的东西就会渗透到党内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来，导致道德沦丧、消极腐败现象日益增多。特别是在目前这种新旧体制转换时期，党内制度建设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尚未健全，客观上存在不少漏洞和弊端，如果离开道德这一内在的软约束机制，将会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严重的后果。因此，邓小平指出，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也是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的重要内容之一。他要求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不仅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而且要教育人民特别是青少年树立良好的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要大力提倡艰苦创业精神。要通过搞好党风带动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的形成。

另外，科学文化既是掌握现代化建设的知识和本领的基础，又是学习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良好的道德风尚和纪律观念的不可缺少

的前提条件。邓小平指出：“我们要掌握和发展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各行各业的新技术新工艺，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并且在上层建筑领域最终战胜资产阶级的影响，就必须培养具有高度科学文化水平的劳动者，必须造就宏大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①因此，邓小平强调：要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克服人们在发展教育和科学文化事业方面的错误观念，大力提高人们对科学文化作用的认识，在全党全社会努力营造一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

总之，“四有”目标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进行“四有”教育，培养一代共产主义新人，是邓小平为我们党确立的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和总体目标。

三、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正确的方针、原则

在阐述新时期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义、为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确立了根本任务和总体目标的同时，邓小平还立足于新时期的特点和要求，总结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一系列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方针、原则。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04页。

党的建设必须围绕党的基本路线进行，这是党的建设基本规律，也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总方针

现阶段党的基本路线，就是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条基本路线，是我们党在总结建设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产物，是全党全国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一条长期管用、动摇不得的正确路线。因此，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总方针，就是要保证这条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要通过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大张旗鼓地开展“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的宣传教育，使这条基本路线深入人心，使全党和全国人民自觉地用这条基本路线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克服贯彻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左”、右摇摆倾向，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顺利实现。

思想政治工作要切实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最重要的是必须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一中心。邓小平指出：“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①为此，必须克服思想政治工作脱离经济建设，形成各吹各的号、搞“两张皮”的现象；要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经济工作和各项具体业务工作中去，使其真正起到推动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0页。

经济发展、促进社会生产力和各项事业的提高的积极作用；并把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和各项业务工作的顺利开展作为衡量思想政治工作成效的一项根本标准。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一个互相联系，缺一不可的有机整体。要使思想政治工作能够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还必须做好“两个基本点”的教育。一方面，要加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教育。要立足于时代的特点，对四项基本原则作出新的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要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长期抓下去，使四项基本原则这一立国之本真正能够深入人心。另一方面，要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解放思想，勇于创新，破除僵化落后的思想观念，清除各种思想障碍，树立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新思想、新观念，敢于和善于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为了创造出一种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氛围和社会环境，邓小平提出：“希望各级党委和每个党支部，都来鼓励、支持党员和群众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都来做促进群众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工作。”^①

搞好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革命精神与物质利益相结合

革命精神与物质利益相结合，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在思想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144页。

政治工作领域的具体运用，也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之一。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偏离了这一正确原则，特别是十年动乱期间，这个原则遭到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歪曲和践踏，在“突出政治”、“精神万能”的错误口号下，物质利益与革命精神被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追求个人正当的物质利益被当作利己主义、资本主义加以批判。结果不仅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而且也败坏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声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拨乱反正，重申了革命精神与物质利益相结合的原则，并根据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对如何理解和贯彻这一原则进行了精辟的论述，赋予了这一原则以新的丰富的内涵。他指出：“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①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革命精神与物质利益是相辅相成的，只有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强大威力。在实践中如何贯彻这一原则，实现革命精神与物质利益的结合，邓小平认为，首先，必须教育干部和群众正确处理个人、集体、国家三者利益的关系，使他们充分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归根结底，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统一的，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是统一的。”^②而当这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6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5页。

几种利益之间发生矛盾时，“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同时，要承认“每个人都应该有他一定的物质利益”。要把关心群众的物质利益，多为群众办实事，解决实际困难当作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要把讲道理与办实事结合起来，把义和利结合起来，把精神鼓励与物质鼓励结合起来。早在1978年3月，邓小平就指出：“我们实行精神鼓励为主、物质鼓励为辅的方针。颁发奖牌、奖状是精神鼓励，是一种政治上的荣誉。这是必要的。但物质鼓励也不能缺少。……对发明创造者要给奖金，对有特殊贡献的也要给奖金。搞科学研究出了重大成果的人，除了对他的发明创造给予奖励外，还可以提高他的工资级别。”^①这些年来，邓小平的这些重要思想不断得到了贯彻落实，对调动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投身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了重大作用。

搞好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思想教育与健全制度、严肃法纪相结合

思想教育是提高人们思想觉悟和认识能力的基本手段，制度与法纪则是规范和约束人们行为、调节各种社会关系的规则体系，两者同样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只有依靠切实有效的思想教育，制度和法纪才能正确体现社会规律和大多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02页。

数人的利益和意志，才能为中国人民所理解、所接受，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威力。另一方面，思想教育是一种软约束，它只能靠人们自愿地接受，只能以理服人。而思想教育能否“服人”，不仅取决于其“理由”充分不充分，还取决于受教育者的个人素质和觉悟程度如何。因此，思想教育要达到较好效果，要规范人们的行动，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还必须要有制度和法纪作补充，以制度和法纪为后盾，必须依靠制度和法纪来巩固其成果。同时，思想教育自身也有一个如何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的问题。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邓小平特别强调制度和法纪建设的重要性，强调要把思想教育同健全制度、严肃法纪结合起来。

坚持思想教育同健全制度、严肃法纪相结合的原则，首先，必须把制度和法纪教育作为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把思想教育作为加强制度和法纪建设的基本手段。“在党政机关、军队、企业、学校和全体人民中，都必须加强纪律教育和法制教育。”^①通过思想教育，增强人们的制度和法纪观念，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同时，对于破坏制度、违法违纪的人，要严格按照有关法律和纪律进行处理。邓小平指出：“对于绝大多数破坏社会秩序的人应该采取教育的办法，凡能教育的都要教育，但是不能教育或教育无效的时候，就应该对各种罪犯坚决采取法律措施，不能手软。”^②而且，对于违纪违法分子的严肃处理，这本身也是一种教育，不但是对其本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0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3页。

人的惩罚与教育，也可以杀一儆百，教育大家。

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发扬民主，以理服人，不能搞政治运动，以势压人

发扬民主，以理服人，这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性质、宗旨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毛泽东曾经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以解决人们的思想认识问题为目的的，因而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办法去解决。用强制的压服的办法去处理思想认识问题，使受教育者口服心不服，结果只能适得其反。在新时期，邓小平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这一思想，他指出：“对于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压服的办法，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①他多次强调，对于思想领域范围内的问题，应该采取说服教育为主的方针方法，不能依靠搞政治运动。他讲：“纠正‘左’的倾向和右的倾向，都不要随意上‘纲’，不要人人过关，不要搞运动。”^②因为，历史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的思想认识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要发扬民主，以理服人，首先必须广开言路，平等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5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81页。

待人，双向交流。“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①作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者，一定要树立群众观点，摆正自己的位置，要和受教育者建立起相互信任、相互了解的同志式关系，以平等的态度交流思想，交换意见，摸清对方思想脉搏，对症下药。而决不能认为自己高明，凌驾于群众之上，板起面孔训人，以势压人。其次，要善于正确分析对待不同意见，坚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彻底否定“大批判”式、急风骤雨式，以及各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邓小平指出：“人民群众提出的意见，当然有对的，也有不对的，要进行分析。”^②“要对讨论和批评的问题研究清楚，绝不能以偏概全，草木皆兵，不能以势压人，强词夺理。”^③他强调：纠正“左”的倾向和右的倾向，都不要随意上“纲”，不要人人过关，不要搞运动。“过去那种简单片面、粗暴过火的所谓批判，以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处理办法，决不能重复。”^④第三，要继续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一再指出，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武器不能丢，“决不能把批评看成打棍子”。^⑤他要求，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都要带头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要在领导班子内部形成一种风气，党内不论什么人，不论职务高低，都要接受批评与自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4—145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5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7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92页。

我批评。对群众中的不良倾向和错误思潮，要敢于理直气壮地批评，不能放任迁就，软弱涣散。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和种种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反对改革开放的错误观点和反动言论，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进行批判和斗争。

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密切联系实际，敢于正视现实，增强针对性

思想政治工作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人们的思想实际。过去，由于受“左”的思想路线影响，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一度脱离现实，搞假大空，因而引起了群众的极大反感。鉴于此，邓小平强调：“教育一定要联系实际。”^①不能搞“空头政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工作是不能离开现实政治的。”^②“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③联系实际，从大的方面看，就是要联系党和国家面临的形势和任务，联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新时期，就是要联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不抓住四个现代化，不从这个实际出发，就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就是空谈马克思主义。”^④联系实际，必须敢于正视现实，既要把成绩讲够，又要把问题讲透。“要把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4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9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4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3页。

国家的形势和困难、党的工作和政策经常真实地告诉群众。”^① 如果不实事求是地肯定成绩，认清主流，过分地渲染阴暗面，散布灰色情绪，人民群众就会失去信心，涣散斗志。相反，如果只讲成绩不讲问题，甚至弄虚作假，夸大成绩，人们就会盲目乐观，或者根本就不信你那一套。这方面，“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曾经给我们留下极其沉痛的教训。联系实际，还必须联系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必须联系受教育者个人的实际。由于不同的地区、单位的具体情况有所区别，人们的社会经历、思想觉悟、文化程度、思维方式、工作能力、兴趣爱好等个性特征呈现出层次性、多样性，其需要解决的思想认识问题也必然千差万别。譬如说：“是封建主义残余比较严重，还是资产阶级影响比较严重，在不同的地区和部门，在不同问题上，在不同年龄、经历和教养的人身上，情况可以很不同，千万不可一概而论。”^② 因此，一定“要针对每个单位、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去做思想工作”。^③ 只有深入群众，摸清脉搏，区分层次，因人施教，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做得有针对性、细致深入和为群众所乐于接受”，^④ 才能取得实实在在的好效果。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6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80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2页。

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解放思想，创新方法，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解放思想，敢于创新，这是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主要任务。而要实现这项任务，就必须首先解决思想政治工作本身的思想工作方法问题。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我们党形成了一整套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其中包含着许多具有普遍意义的方针原则和至今仍然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邓小平一再强调，搞好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继承和发扬这些优良传统，不能以虚无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历史，不能以任何借口来否定和抛弃这些优良传统。与此同时，邓小平又认为，思想政治工作要随着党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的转变而有所创新和提高，他明确指出：“时间不同了，条件不同了，对象不同了，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同。”^①“我们应该也只能采取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总结过去的经验，分析新的历史条件，提出新的问题、新的任务、新的方针。”^②不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和提高，不赋予思想政治工作的新的时代内容，就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就不能在新形势下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在邓小平的亲自倡导和推动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开创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局面方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9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8页。

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各级党的宣传思想工作部门和广大思想政治工作者解放思想，针对现代化建设中思想政治工作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大胆探索，逐步形成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原则，创造了很多新方法，积累了许多好经验，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例如，关于宣传思想工作要坚持团结、稳定、鼓励，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关于精神文明建设要以立为本，重在建设的方针；关于文化文艺工作要坚持一手抓繁荣，一手抓“扫黄”的方针；关于宣传思想工作要虚功实做，务求实效，力戒空谈，力戒形式主义；要充分运用现代传媒工具，寻找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载体；要使思想政治工作寓教于乐，形象生动，为群众所喜闻乐见；要创造健康向上的社会舆论环境，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大合唱”，等等。加强和改进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继续认真扎实地贯彻落实这些方针原则，充分运用这些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同时，还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继续不断探索新方法，总结新经验，把思想政治工作继续推向前进。

恢复和健全思想政治工作机构，建设一支忠诚于党的事业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才能为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提供切实有力的保证

任何一项工作的开展都离不开一定的机构和人员。思想政治工作机构和队伍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领导者和实

施者。只有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机构和队伍的建设,才能为新时期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提供切实有力的组织保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在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是各级党组织的主要工作,强调全党都要重视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前提基础上,还进一步指出,必须恢复和健全思想政治工作机构,建设一支思想过硬、业务熟练的专门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早在1975年7月,他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就针对“文化大革命”对军队政治机关所造成的严重冲击与破坏的状况,提出“要加强政治机关,提高政治机关的威信。在配备政治干部时要注意质量”。^①粉碎“四人帮”后不久,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出这一任务,他讲:“要把政治机关的职能、作用、威信恢复起来”,^②“并在新的条件下发展提高”。^③1985年9月,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明确指出:“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队伍都必须大大加强,决不能削弱。”^④邓小平还认为:“思想战线上的战士,都应当是人类灵魂工程师。”^⑤作为一名合格的思想政治工作者,不但要有较高的政治觉悟、优良的道德品质和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还要有较好的文化素养、丰富广博的知识面和较强的业务能力。特别要能够以身作则,言行一致,“政治干部要能起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3—124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3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5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0页。

模范作用”，^①凡是需要动员群众做的，必须首先从自己做起。目前，我国各条战线上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专门队伍大约有300多万人。从总体上看，这是一支可以信赖的合格队伍。但是，也必须清醒认识到，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的影响，思想政治工作队伍仍然存在着数量不足、质量不高、人心不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必然会影响、妨碍思想政治工作水平的提高和作用的发挥。因此，如何按照邓小平指明的方向和提出的要求，从思想上、组织上、业务上、作风上全面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从政治、生活待遇以及体制上等方面为思想政治工作创造良好环境条件和社会氛围，仍然是当前必须大力加强的一项重要工作。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页。

第五章 按照“四化”方针 建设干部队伍，培 养选拔接班人

干部问题历来是党的领导与建设中的关键问题。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政治路线以后，邓小平就一直把干部队伍建设问题、特别是领导班子建设和培养选拔接班人问题，摆在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保证党的基本路线长期不动摇和国家长治久安的突出位置。早在1979年7月，他就提出：“解决组织路线问题已经提到我们议事日程上来了。……中国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有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强的

人来接班才能保证。”^①1980年2月，他又讲：“不进一步解决党的组织路线问题，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就得不到可靠的保证。”^②1992年春，他在视察南方发表的重要谈话中再一次强调：“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③在于把党建设好。就如何建设一支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胜任领导现代化建设工作的党的干部队伍的问题，邓小平提出了干部队伍建设的“四化”方针。他还积极倡导并带头推进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为培养选拔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顺利完成党的第二、三代领导集体的交接班而殚精竭虑，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做出了永不磨灭的重大贡献。

一、“四化”方针的确定，为新时期 干部队伍建设指明了方向

按照什么样的标准建设干部队伍？这始终是党的干部工作的核心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立足于党的干部队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5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0页。

伍的实际状况和党所面临的形势、任务的客观要求，提出了要实现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为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确定了目标，明确了方向。

**按照“四化”标准，建设一支能够胜任领导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党的干部队伍，是
新时期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迫切需要解决的关
键问题**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们党的工作重点开始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移，我们的国家开始由僵化封闭走向改革开放。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肩负着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重任。进行这样一项前所未有的伟大实践，其艰巨性复杂性是不言而喻的。新的形势和任务对执政党、首先是对党的干部队伍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要成为新时期合格的干部，没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思想作风是不行的，“没有专业知识是不行的，没有干劲是不行的，没有精力是不行的”。^①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耽搁和破坏，改革开放之初，党的干部队伍的状况，同党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的要求极不相称。主要表现为：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22页。

一是党员干部队伍中仍然存在较为严重的思想、作风和组织不纯的问题，为数不少的“三种人”，即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还混迹于党员干部队伍中。1979年7月，邓小平就指出：“现在反对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还大有人在。”“他们一遇机会就会出来翻腾的。”^①1980年1月，他又讲：“我们提倡党性，反对派性。有些人就是死抱着那个派。派性高于党性的大有人在，包括我们某些老党员在内。这还怎么合格？”^②还有一些干部官僚主义严重。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邓小平列举了官僚主义在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种种表现，语气沉重地指出：“这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③“也还有一些干部，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权、特殊化，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损害党的威信。”^④这些问题不尽快解决，党就没有凝聚力、战斗力，就无法带领人民搞现代化。

二是干部队伍特别是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年龄偏大，精力不足，体力不继。“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我们党培养选拔干部的正常进程被打断。“文革”后，随着大批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和干部政策的落实，大批老干部纷纷恢复职务，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在拨乱反正、制定和贯彻执行党的新时期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68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7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2页。

路线方针政策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但是，经过十年的耽搁和折腾，这批干部年龄普遍老化，身体素质较差。据统计，1982年机构改革前，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平均年龄约65岁，国务院各部委领导班子平均年龄超过63岁，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政领导班子平均年龄超过62岁，省部级领导干部中50岁以下者仅占总数的15%。这些干部身负重任，都在党政军第一线工作，日夜操劳，不堪重负。因此，“现在摆在老同志面前的任务，就是要有意识地选拔年轻人，选一些年轻的身体好的同志来接班”。^①

三是干部队伍的文化程度偏低，专业知识结构很不合理。据统计，1979年，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文化程度的仅占9%，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高达70%以上。经过调整和努力，80年代初，干部队伍的文化结构有所改善，但全国2000多万干部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仍然只占20%，相当多的干部缺乏文化科学知识，没有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懂得先进科技和现代管理的人更少。鉴于这种状况，邓小平深感忧虑地指出：现在我们国家面临一个严重问题，不是四个现代化路线、方针对不对，而是缺乏一大批实现这个路线、方针的人才。1980年1月，他又讲：从领导武装斗争到领导和平建设，意味着我们党过去熟悉的东西用不着了，“现在面临的是我们不熟悉的东西。由于很长时间没有认真解决，现在这个问题更迫切更严重了”。^②比如经济工作，进城后我们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69页。

就没有真正学好，“现在的经济工作，问题比五十年代又复杂得多。……但是共产党员中具有专业知识的人究竟有多少？特别是我们的领导干部中具有专业知识的有多少？目前的状况不改变行吗？”^①“我们的专业人才太缺乏了。所以，我们需要建立一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而且是一支宏大的队伍。”^②

上述种种问题的存在，严重地影响制约着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提高，妨碍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开展，因而引起了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极大焦虑和不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反复地提醒全党注意，必须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的要求，制定更高更严的标准，并且按照这一标准开展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培养选拔接班人，尽快改变干部队伍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不相适应的状况，这样，我们党才能担负起时代重任，才能经受起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

“四化”方针的逐步形成和完善发展，为新时期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确立了目标，明确了方向

早在执政初期，我们党就根据形势和任务的转变，适时地提出了全党都要加强学习，特别是要加强干部的理论教育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69—270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64页。

和文化教育，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理论素质、文化水平，以及领导、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能力。1954年7月，邓小平在政务会议上的发言中就提出要把“办好学校，培养干部”的工作当作一项“最基本的建设”^①的思想。在此期间，邓小平关于实现干部队伍“四化”的思想也已开始萌发。在1956年党的八大《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他专门谈到干部的培养问题，指出：党的干部工作的主要缺点是，至今仍然有相当多的同志用“资格”作为选拔干部的标准。“为了适应党和人民的事业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党必须特别注意培养精通生产技术和各种专门业务知识的干部，因为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力量。”^②1961年11月，他又提出：要“大批提拔年轻的技术干部”。^③要“把年轻人提起来，放到重要岗位，管的业务宽了，见识就广了，就能更好地发挥作用。……现在再不重视培养提拔年轻人就晚了，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就不行了”。^④1964年，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再一次提出干部年轻化的任务，指出要给干部队伍注入新鲜血液，让年轻一点的政治思想好的共产主义者来接班，并强调干部年轻化是党的建设中带有方针性质的根本性问题。但是，由于“左”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干扰，这些正确的思想主张没有能够进一步系统化和切实贯彻执行。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09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51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91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91页。

改革开放以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面对干部队伍的状况同党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所产生的尖锐矛盾，邓小平关于干部队伍“四化”方针的思想才得到了充分发展和运用。这些年来，他不但指出干部队伍“四化”方针是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揭示了“四化”方针的内容和辩证关系，而且还指明了实现干部队伍“四化”的基本方式和途径。

1977年5月，邓小平尚未完全恢复工作，在同中央有关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就明确指出：“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①“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在多次讲话中强调，思想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就必须解决组织路线问题，主要是选拔培养懂行和比较年轻的接班人。选拔干部一定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和讲党性不搞派性的标准。1980年1月，他在题为《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提出要建立一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宏大的干部队伍。同年8月，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肯定了陈云关于选拔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的意见，指出：“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把对于这种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③在同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对干部“四化”方针的内容和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0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6页。

实现途径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和概括，他讲：“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逐步制定完善的干部制度来加以保证。”^①他认为，提出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三个条件，当然首先是革命化，要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前提。根据邓小平的这些思想主张，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要“在坚持革命化的前提下逐步实现各级领导人员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把努力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写入了报告和党章之中，使这一方针从此正式成为指导新时期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根本方针。正是按照邓小平倡导的干部“四化”方针，这些年来，我们党培养选拔了千百万能够适应现代化建设事业需要的年轻优秀人才，大大地改善了党的干部队伍的结构和面貌，使党的干部队伍重新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从而有力地保证了党的新时期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

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一个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是党的任人唯贤、德才兼备干部路线在新时期的具体运用和发展

坚持任人唯贤，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选拔干部，这是我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1页。

们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正确干部路线。干部的德与才，即政治标准与业务标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具体含义。邓小平为我们党确立干部“四化”方针，正是我们党的任人唯贤、德才兼备干部路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运用和发展，它赋予了党的干部路线以丰富的时代内容和鲜明的时代特点。按照邓小平的论述：

——革命化，是对干部的政治立场、思想作风方面的要求。主要指：党的干部要具有履行职责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要具备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解决现代化建设实际问题的能力；要坚决拥护和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政治路线，立志献身现代化事业，并能在改革开放中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做出实绩；要坚持党性、反对派性，自觉遵守民主集中制原则，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要树立群众观念，坚持群众路线，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廉洁奉公，不谋私利等。革命化的实质，在于从根本上保证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真正掌握在政治上可靠的干部手里，保证党的基本路线永不动摇，保证社会主义永不变色。

——年轻化，是对干部队伍的年龄结构和身体素质的要求。主要指：干部应当年富力强，精力充沛，能够胜任繁重的工作；干部队伍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的年龄应该形成一个梯形的科学合理的年龄结构，即老、中、青各占一定的比例，以保持正常的新老合作和权力交替；要打破论资排辈，大力培养选拔大批优秀的年轻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邓小平指

出，只有保持干部年轻化，才能使党和国家充满生机与活力，才能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他希望中国出现一批三四十岁的优秀政治家、经济管理家、科学家、文学家和其他各种专家，并认为“那是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的希望”。^①他还强调，年轻化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个长期的、全局性的战略问题，要求全党必须高度重视，常抓不懈。

——知识化，是对干部队伍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程度的一般性要求。主要指：党的干部必须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掌握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文化科学知识；要克服鄙视知识、歧视知识分子的思想，在党内创造一种尊重知识、人才的良好氛围，充分信任和依靠知识分子；要采取各种有力措施，运用多种方式提高干部的文化水平，改善干部队伍的知识结构，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有知识、懂科学、会管理的干部，并及时把其中德才兼备者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考察干部的知识水平，既要重视学历，但不能唯学历，更要重视真才实学。

——专业化，是对干部的专业水平和业务能力的具体要求，是知识化的进一步深化。主要指：“无论什么岗位上，都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没有的要学，有的要继续学，实在不能学，不愿学的要调整。”要让明白人当家，逐步做到每一个行业都由精通业务的干部从事领导；要根据专业化的要求，调整配备干部，做到学以致用，用其所长，人尽其才。面对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和基于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深刻认识，邓小平特别重视发挥科技干部的作用。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62页。

用，他带头提出并要求各级党委的主要负责人，要做广大科技干部的“后勤部长”，把落实科技干部政策和充分发挥科技干部的作用，作为现代化建设生死攸关的问题来抓。

邓小平提出的干部“四化”方针，是一个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这一方针，不但要全面认识了解“四化”各自所包涵的丰富思想内容，还必须进一步把握准“四化”之间辩证统一的内在联系。一方面，邓小平强调，德才兼备，必须以德为主。革命化，就是党的德才兼备干部标准中的“德”在新时期的具体表现。因此，要始终把革命化置于干部“四化”方针的首位。他讲：“提出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三个条件，当然首先是要革命化。”^①只有坚持以革命化为选人用的前提，干部队伍建设才会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党的各级领导权才能牢牢地掌握在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离开了革命化，干部“四化”就失去了方向和灵魂，干部队伍和领导班子建设就会偏离正确的轨道。另一方面，真正的革命化总是建立在一定的才智和能力的基础上的，离开了“知识化”与“专业化”，革命化就会变成“空头政治”。“只靠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没有真才实学，还是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②而“年轻化”又是干部的“德”与“才”赖以依存和充分发挥的物质条件。纵使你德才兼备，满腔热情，但却年老体衰，力不从心，也难以担负起组织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繁重工作。因此，邓小平总是把革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1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62页。

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当成一个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强调要正确理解“四化”方针的内容，把握好“四化”之间相互的关系，决不能各执一端，互相否定，或畸轻畸重，随意取舍。

二、突出抓好领导班子建设，顺利实现第二、三代领导集体的交接班

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领导班子则是党的干部队伍中担负着一定党政领导职务的人组成的集体，是干部中的精英，骨干中的骨干。各级领导班子处于决策和组织者的地位，他们的一切活动都会对国家、社会的政治生活和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局面产生决定性的影响。领导班子的面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执政党的面貌，“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① 人民群众往往就是根据各级领导干部的形象来认识我们党的形象，对党的性质和信赖程度作出分析判断的。领导班子建设的实质是领导权问题，这一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关系到党能否维护和巩固其执政地位，更好地引导和带领广大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关系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能否万古长青。因此，领导班子建设问题，是党的干部队伍建设乃至整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7页。

个党的建设最为核心的问题。

邓小平长期担任党的高级领导职务，或独当一面，或身处最高领导层，以至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因此，他深知领导班子建设在党的事业中的重要性。改革开放以来，他在全面、系统地论述并抓好党的领导和建设问题时，始终把领导班子建设摆在最为突出的位置上。他认为：领导班子问题，是关系到党的路线能不能贯彻执行的问题。“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①总结我们党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加强和改进领导班子建设、培养选拔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正确思想主张，并在实践中带头实行和贯彻这些思想主张。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我们党成功培养出千百万符合“四化”要求的各级领导干部，顺利地实现了党和国家各级领导权的集体交接班，从而使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万古长青有了切实的组织保证。

立足于新的形势、任务和领导干部所处的特殊位置，对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思想工作作风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

在新时期，选什么样的人进入领导班子？接班人应当具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2页。

备哪些条件？领导干部应当坚持和发扬哪些优良作风？邓小平认为，领导干部所处的重要位置和所起的重要作用，决定了他们不仅要具备一般的党员干部所必须具备的各方面条件，还必须有更高更严的要求。他讲：“我们今后配备领导班子的时候，要选用什么人呢？要选那些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斗争中经得起考验的人；要选那些党性强，能团结人，不信邪的人；要选那些艰苦朴素，实事求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作风正派的人；要选那些努力工作，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有魄力，有实际经验，能够办事的人。”^①

根据邓小平的有关论述，新时期合格的领导干部，必须具备几方面基本条件：

首先，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懂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作为党的领导干部，没有一定的理论素养，是难以胜任自己的工作、提高领导工作水平的。邓小平一再强调，搞现代化建设，搞改革开放，要排除各种“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倾向的干扰，就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习，提高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他要求，党的各级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在繁忙的工作中，要有一定的时间学习，以“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75页。

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①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不断发展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更要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精髓，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根据切身的体会和实践，邓小平指出：“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创造性地运用并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初步成功地回答了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尽快实现现代化的重大历史课题，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一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贯彻“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这一原则，就是要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作为理论学习的中心内容，要掌握运用这一思想武器，去正确分析和解决本地区、本部门改革开放中不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提高领导现代化建设的素质和能力。

其次，要坚定不移地拥护和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立志改革开放，献身现代化事业，并在实践中锐意进取，做出实绩。邓小平指出：“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是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是由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7页。

一样。”^①各级领导班子担负着组织领导本地区、本单位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任，领导干部对党的政治路线的态度如何，不仅仅是关系到一个人，而且会影响到一大片。因此，邓小平特别强调，选拔领导干部，最主要的标准有两条，其中一条就是要“拥护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②这条路线的重要标志和基本特色，就是改革开放。要保证这条路线的贯彻执行，关键在于要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③还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期间，邓小平在谈到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组成问题时，就强调：“有一个新的改革的面貌，是确定新班子成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④对于“进入新的政治局、书记处特别是常委会的人，要从改革开放这个角度来选”。^⑤他特别提醒全党，“如果我们摆一个阵容，使人民感到是一个僵化的班子，保守的班子，或者人民认为是个平平庸庸体现不出中国前途的班子，将来闹事的情形就还会很多很多，那就真正要永无宁日”。^⑥风波过后，他又及时地指出，判断、衡量一个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是否拥护党的改革开放政治路线，不能只看口头上、文章中，而必须注重实绩。做一个新时期合格的领导干部，不能只务虚，不务实，搞形式主义，花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1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2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6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7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9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6页。

架子，而必须勇于开拓，锐意进取，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做出实绩，因为，“人民是看实际的”。^①“我们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将他们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要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要搞改革开放。”^②而新的领导班子要取信于民，要让人民群众看到希望，就必须讲实际、办实事、求实效。要扎扎实实地做几件体现改革开放的事，“要拿事实给人民看”。^③“这样人民就可以放心了。”^④

邓小平的这些语重心长的话，既是对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殷切期望，也是对各级领导班子和广大领导干部的要求；既是针对当时那种特殊的社会环境而言，也应该成为我们党培养选拔领导干部和考察配备领导班子所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原则。

再次，要模范地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胸襟开阔，知人善任，团结协调。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也是最合理、最便利的制度。一方面，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这是维护各级领导班子团结统一、协调配合的根本组织保证，是实现党的领导决策科学化的基本前提；另一方面，历史和现实经验都表明，民主集中制执行得好不好，领导班子是关键。因此，邓小平在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有关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6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0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8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9页。

论述和实践中，始终抓住领导班子这一重点。他强调，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要做“服从党的组织、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①为此，邓小平要求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一要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只有联系群众的集体领导，才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才便于尽量减少犯错误的机会。”^②二要自觉接受组织监督和群众监督。领导干部双重组织生活制度，是民主集中制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增强党员领导干部公仆意识、民主意识，把自己置于党组织监督之下的有效途径。邓小平认为：“我们高级干部应该参加党的小组生活。”“党委要很好注意高级干部参加党小组生活的问题。”^③同时，他又强调：领导内部也要有组织生活制度，对“领导人最重要的监督是来自党委会本身，或者书记处本身，或者常委会本身”。^④通过党委内部的组织生活，“可以起到互相监督、互相勉励的作用”，有助于形成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良好风气。另外，还“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⑤三要胸襟开阔，讲团结，顾大局。党的性质、宗旨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做到胸襟开阔，胸怀大局。要正确处理班子内部关系，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35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29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3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09—310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2页。

领导班子成员都要做到互相信任、互相尊重、互相配合、互相补充。要推心置腹、坦诚相待，不搞“窝里斗”，“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呐！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错误从这里犯起”。^①要自觉维护领导集体的核心。各级党委的第一书记，对日常工作要负起第一位责任。要当好“班长”，善于协调，勇于负责。只要树立和维护了领导集体和集体中的核心，团结协作，齐心协力，就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什么乱子出来都能挡得住”。另外，作为一个成熟的领导者，还必须“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②做到知人善任，任人唯贤。

最后，要密切联系群众，作风朴实，清正廉洁，艰苦创业。执政党的地位使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容易产生脱离群众、骄傲自满的情绪和倾向，容易沾染上官僚主义、以权谋私的习气。因此，邓小平特别强调：每个党的领导同志都必须密切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同群众同甘共苦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他指出：密切联系群众，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党的性质、宗旨的基本要求。“全党同志，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经常记住这一点，经常用这个标准检查自己的一切言行。”^③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密切联系群众，要求领导干部必须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0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9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8页。

做到：1. 要实事求是，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克服官僚主义，反对形式主义。邓小平认为，官僚主义是危害党的事业的一大祸害，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当前要特别注意克服官僚主义”。“要搞四个现代化，把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地转到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来，非克服官僚主义这个祸害不可。”^①而“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②他要求领导干部一定要腾出时间多办实事，多做少说。2. 要清正廉洁，以身作则，带头纠正不正之风和克服特殊化。针对改革开放以来一些领导干部把自己当作人民的主人，搞特权，特殊化，以及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等不廉洁现象，邓小平提出纠正不正之风，“要先从领导干部纠正起”。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惩办和纪律处分。3. 要继承和发扬艰苦创业的思想作风。邓小平认为，中国是个穷国、大国，要搞现代化，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一定要艰苦创业。“艰苦创业，首先要我们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带头。”“一定要努力恢复延安的光荣传统，努力学习周恩来等同志的榜样，在艰苦创业方面起模范作用。”^③

此外，邓小平还从其他不同角度对党的领导干部提出了许多具体要求，如，要政治坚强、头脑清醒，要有实践经验，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9—150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1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60页。

懂经济工作等。

把培养选拔接班人当作老同志的首要责任， 顺利地推进并实现新老交替，完成党和国家领导 权的集体交接班

由于长时期未能建立起正常的领导干部新老更替、权力交接的运作机制，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实行了终身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和耽搁，造成了改革开放初期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层领导干部青黄不接，出现了严重的“断层”现象。因此，如何选好接班人，让年轻一代的领导干部尽快地成长、成熟起来，实现新老交替，完成党和国家各级领导权的平稳交接，就成为新时期执政党建设的头等大事，成为“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兴旺发达、朝气蓬勃的一个大问题”。^①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为此而殚精竭虑，废寝忘餐。

首先，邓小平反复强调，选好接班人，实行新老交替，这是老同志的首要责任，是领导班子建设的一项长期的、经常性的战略任务。

1979年11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的报告指出：“粉碎‘四人帮’以来，我们把老同志都陆续请回来了”，这“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正确的。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26页。

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缺少一批年富力强的、有专业知识的干部。而没有这样一批干部，四个现代化就搞不起来”。因此，“我们老干部的责任就是要认真选好接班人”。^①“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认真选好接班人，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问题。”^②这个问题不解决好，“我们向党和人民就交不了帐”。^③他认为，老同志的责任很多，但是，认真选好接班人是第一位的责任。要把能不能选好接班人，当作衡量老同志合不合乎党员标准和干部标准的一项重要内容。1981年7月，邓小平又指出：“全国范围的干部接替问题，如果再过三五年还不解决，那就可能造成一种混乱。”^④1982年1月，邓小平在《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一文中，再一次强调：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实现干部“四化”，这“是革命和建设的战略需要，也是我们老干部的最光荣最神圣的职责；是我们对党的最后一次历史性贡献，也是对我们每个人党性的一次严重考验”。^⑤

如何充分发挥老同志培养选拔接班人的重要作用，邓小平认为，第一，要克服旧的台阶观念和论资排辈、求全责备思想。针对一些老同志受论资排辈思想观念束缚，错误地理解“台阶论”，机械地认为干部提拔一定要按部就班，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因而妨碍了选拔接班人的加快进展的问题，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21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22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22—223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84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96页。

邓小平指出：“台阶论”主要是针对“文革”期间用“坐火箭”、“坐直升飞机”的办法提拔干部而言的。“干部要顺着台阶上，一般意义是说，干部要有深入群众、熟悉专业、积累经验和经受考验锻炼的过程。但是我们不能老守着关于台阶的旧观念。干部的提升，不能只限于现行党政干部中区、县、地、省一类台阶，各行各业应当有不同的台阶。”^①要“打破那些关于台阶的过时的观念，创造一些适合新形势新任务的台阶，这才能大胆破格提拔”。^②对特别优秀、政绩突出的年轻干部，要搭个轻便梯子，使其尽快上。

第二，要消除对年轻人担任领导职务不放心的顾虑，放手让年轻干部干。针对一些老同志存在着年轻人经验不够、不能胜任的担心，邓小平指出：“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③他认为，一般来说，年轻人经验少些，这是事实。但是，年轻的同志知识面广、接受新事物快，只要创造条件，放手让其在实践中锻炼，“放在那个位置上，他们就会逐步得到提高。”^④他还援引了自身以及其他老同志的经历，论证了年轻干部只要委以重任，假以时日，就一定能干好的道理。在1992年视察南方重要谈话中，他讲：“现在还要继续选人，选更年轻的同志，帮助培养。不要迷信。我二十几岁就做大官了，不比你们现在懂得多，不是也照样干？要选人，人选好了，帮助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4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4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4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5页。

培养，让更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①

第三，老同志还要有甘当“人梯”精神，自觉让位，并且搞好传帮带。邓小平指出，选好接班人，要着重解决好如何“进”的问题。与此同时，“出”也要妥善解决好。因为，“庙只有那么大，菩萨只能要那么多，老的不退出来，新的进不去，这是很简单的道理”。^②这就要求老同志要从党和人民的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出发，要发扬甘当人梯的革命精神，自动自觉地给中青年同志腾出更多的“位置”，提供更多的锻炼机会。这样做了，才能给我们起用比较年轻的干部创造一个条件。但是，“老的一下丢手不行。老的要结合中、青”。^③要搞好传帮带。

在强调老同志在培养选拔接班人问题上的重要作用、对老同志提出一系列期望与要求的同时，邓小平又语重心长地告诫广大中青年干部，一定要虚心诚恳地向老同志请教，要学习老同志的革命精神和丰富经验，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要不辜负老同志的期望，勇挑重担，积极进取。

其次，邓小平以身作则，大力倡导推行干部离、退休制度，并且为新老更替、权力交接找到了一条切合实际的成功路子，顺利地完成了党的第二、三代领导集体的交接班。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党长期未能建立起干部的离、退休制度，造成机构臃肿，人浮于事，领导干部的年龄严重老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1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3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11页。

化，极大地压抑了党和国家的生机与活力。为此，改革开放一开始，邓小平就把废止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干部离、退休制度，当作一项刻不容缓的重要改革任务。但是，鉴于“文革”十年的破坏耽搁造成了党和国家高层领导干部青黄不接的严重情况，邓小平又指出，实行领导干部离、退休制度，处理不能太急，太急了也行不通。因为老同志要退下来，需要有一个转变观念、逐渐适应的过程；而年轻领导干部要接上班，也必须有一个熟悉情况、增长才干、积累经验的过程。因此，邓小平创议，在中央和省的党委设置辅佐、参谋性质的顾问委员会，作为“干部领导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种过渡”。^①根据邓小平这一创议，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正式建立了顾问委员会制度。这一制度的实行，既使老同志充分发挥宝贵的经验和才智，有利于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又能使新同志耳濡目染，学到本领，受到教益。实践证明，邓小平首创的这种国际共运史无前例的过渡形式，切合我们党的实际，是十分正确的。

选拔接班人，实现新老更替，权力交接，必须坚持集体交接班原则。这也是邓小平的一个重要思想。他认为，集体交接班是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在这一问题上的重要体现。1980年2月，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邓小平指出：“我们强调集体领导，这次讲接班也是集体接班，这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14页。

很好，很重要。”^① 针对党的历史上一度存在的由领袖个人指定接班人的错误做法，邓小平指出：“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② 必须坚决地克服封建主义，纠正这种做法。一方面，要依靠党的领导集体，按照一定的民主程序，包括组织考察，广泛听取广大干部群众的意见，再经过党委集体讨论，才能对选拔任用领导干部的问题作出决定。另一方面，接班人本身也是一个集体。邓小平十分赞同陈云关于解决接班人问题必须选拔成千上万中青年干部的意见。他还重申列宁关于领袖是一个集团的思想。他认为，只有坚持集体交接班，才能选拔出大批忠于马克思主义，忠诚党的事业，在群众中享有较高威信的优秀接班人，才能保证新老顺利更替，保证党和国家领导权平稳、健康、有序地交接，保证社会主义事业万古长青。

在培养选拔接班人，推进干部退休制度这一问题上，邓小平不仅大声疾呼，大力倡导，而且身体力行，以身作则。为了树立和培养新一代中央领导班子的威信，邓小平在身体依然很健康、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享有无与伦比的崇高威望的情况下，就多次表达了希望早日退休的愿望。早在1979年11月，他就说：“如果党允许我今天退休，我马上就退休。这是真话，不是假话。”^③ 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上，他坚持不担任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职务，而出任第一届中央顾问委员会主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8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7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27页。

任。1987年在党的十三大上，他又辞去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和中顾委主任职务。1989年5月31日，新的中央领导班子的组成方案刚刚确定，他就讲：“新的领导班子一经建立了威信，我坚决退出，不干扰你们的事。”^①同年9月4日，邓小平亲自给中央政治局写信，请求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经过认真讨论，尊重他的意愿，批准了他的请求。这些都充分地体现了邓小平作为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坦荡胸怀、高尚品格和远见卓识。

经过10年的艰苦努力，经历几次政治波折，以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为标志，我们党终于确立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地完成了党中央第二、三代领导集体的交接班，各级领导班子的培养选拔也正在继续朝着正常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对此，邓小平不但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都为我们党以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了永不磨灭的重大贡献。

三、改革不合理的干部制度，建立起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有效机制

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培养选拔千百万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固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1页。

然需要发挥老同志的积极作用，靠“伯乐”的发现和推荐，但从根本上说，更要靠改革和完善干部制度，建立起能够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有利于各种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有效机制。着眼于长远和全局，邓小平十分重视干部制度的改革问题，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等一系列文章、讲话中，他把干部制度当作党和国家现行制度中必须大力加以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摆到突出的位置。不但指出了现行干部制度中存在的种种弊端，阐明了改革和完善干部制度的重要性、迫切性，而且提出了改革和完善干部制度的基本目标，指出了改革和完善干部制度的根本方向。

现行干部制度的弊端，主要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我国现行干部人事制度，是仿效苏联以及沿袭战争年代的基本做法逐步建立起来的。这套制度，在历史上特别是革命战争时期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随着党的执政地位的稳固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其固有的缺陷与弊端日渐明显地暴露出来。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长期未能充分地认识到这些弊端的危害性，未能根据形势与任务的发展变化，及时地改革这套制度，有效地克服这些弊端，导致了一系列错误的发生，并且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回顾历史，总结经验，邓小平深刻地指出，我

们党已经发生的各种错误，尤其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重大失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领导制度、干部制度等方面存在的缺陷与弊端更重要，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些缺陷与弊端的表现，主要“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①具体地讲有如下几方面：

一是在干部管理上权力过于集中，包揽过多。“党管干部”原则是实现党的领导的一项重要原则，是党的政治领导的重要内容之一。按照这项原则，党组织无疑应在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的干部人事工作中发挥领导作用。但是，这种领导作用主要应该体现在干部路线和大政方针政策上，体现在对重要干部的培养、考察和选拔、推荐上，而不应事无巨细，过多包揽。在干部制度改革之前，党、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的干部人事权统统集中在党委手里，无论是党和国家机关的干部，还是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以及各种专业技术人员，一概是由党委组织部门统一管理调配的“国家干部”。

二是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表现为家长制、任人唯贤、人身依附、论资排辈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邓小平指出：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造成“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把上下级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7页。

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①搞特权，特殊化，“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尚未肃清的表现”。^②另外，宗法观念、等级观念、论资排辈等现象，也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甚至现在，任人唯亲、任人唯派的恶劣作风，在有些地区、有些部门、有些单位，还没有得到纠正。一些干部利用职权，非法安排家属亲友进城、就业、提干等现象还很不少。可见宗法观念的余毒决不能轻视”。^③

三是管理制度不健全，法制不完备。邓小平认为，干部人事制度的弊端，既有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也同我们党长期未能形成一套完整的干部制度有着直接的关系。他指出：“我们的党政机构以及各种企业、事业领导机构中，长期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缺少对于每个机关乃至每个人的职责权限的严格明确的规定”，“干部缺少正常的录用、奖惩、退休、退职、淘汰办法”。^④由于制度不健全、法制不完备，使干部管理主观随意性大，造成干部队伍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现象，导致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机构臃肿、层次多、闲职多、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官僚主义严重。

总之，干部制度中各种缺陷弊端造成了管人与管事相脱节，妨碍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履行职责、发挥作用、增强责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1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2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5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8页。

任感；造成了“大锅饭”、“铁饭碗”，压抑了广大干部的进取心和创造精神；堵塞了选人用人渠道，阻碍着各种人才的健康成长，造成人才特别是年轻优秀人才的大量浪费和埋没；而且，陈旧、落后、单一的干部管理方式，也越来越跟不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日新月异的发展步伐。因此，邓小平反复强调，必须认真改革和完善干部制度，否则，“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①

改革和完善干部人事制度，使党的干部工作 逐步走上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为优 秀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

在深刻地分析揭示现行干部制度中存在的缺陷与弊端的基础上，邓小平立足于我国干部队伍的现状和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进一步提出了改革和完善我国干部人事制度的根本目标，这就是，要形成一种有利于各种优秀拔尖人才脱颖而出的有效机制，建立起一套能够有效地保证选贤任能、广开进贤之路的干部制度。

人才问题，一直是邓小平最为关心的一个至关重要问题。他认为，改革开放能否顺利进行，现代化建设能否搞成功，关键是要有一大批又红又专的优秀人才。因此，“要创造一种环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7页。

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改革就是要创造这种环境”。^①他要求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努力创造“唯才是举”、“任人唯贤”、“平等竞争”、“择优使用”的条件，破除不求上进、不务实绩、论资排辈等各种陈规陋习。实现这一改革目标，“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包括选举产生、委任和聘用的）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②也就是说，要使党的干部工作逐步走上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发展轨道。

围绕着如何形成这样一种机制，建立这样一套制度，邓小平提出了许多精辟的思想见解。他认为，要学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在选人用人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先进管理方法，解放思想，打破框框，不拘一格。他说：“我们说资本主义社会不好，但它在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方面是非常大胆的。它有个特点，不论资排辈，凡是合格的人就使用，并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从这方面来看，我们选拔干部的制度是落后的。”^③他提出，要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以单一委任制为主要形式的干部任用制度，实行以能够充分地反映民意和体现群众监督为内容的聘任制、选任制、考任制等各种形式相结合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要把竞争激励机制引入干部人事管理工作当中，“通过加强责任制，通过赏罚严明，在各条战线形成你追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9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1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25页。

我赶、争当先进、奋发向上的风气”。^①要“制定各个行业提升干部和使用人才的新要求、新方法”。^②要根据不同性质、类型人员的特点，对“国家干部”进行合理分解，建立科学的分类管理制度。要建立干部离退休制度，“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③只有建立退休制度，才能从根本上真正改变干部队伍年龄老化状态。在谈到新老交替问题时，他讲：“要真正解决问题不能只靠顾问制度，重要的是要建立退休制度。”^④“有了退休制度，人人都知道自己到哪年该怎么样，这就比较好办。”^⑤他还主张，要建立干部交流制度、监督制度、培训制度，等等。

此外，邓小平还认为，改革和完善干部制度，不仅涉及到党内制度建设，而且也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他讲：“我们国家缺少执法和守法的传统，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开始抓法制，没有法制不行，”“从全局来说，是加强法制。”^⑥他认为，比较而言，“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⑦改进党的干部工作，特别是对于国家机关的干部人事工作，必须通过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例如《选举法》、《国家公务员条例》等，对于干部的录用、考核、升降、任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1—15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4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1—332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26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88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3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页。

免、培训、调动、奖惩、待遇、监督、退休等各个方面，都能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形成配套完整的法律制度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避免过去出现过的错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成果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

第六章 发展统一战线理论， 完善多党合作制度

任何社会革命和建设运动，都需要依靠一定的社会力量的联合。以解放全人类为目标的共产主义运动，必须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领导，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只靠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孤军奋战，共产主义运动要取得胜利也是不可能的。统一战线，就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为着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领导和团结其他阶级、阶层、政党及社会组织，在一定的共同目标下结成的政治联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为统一战线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策略原则。我们党从民主革命时期开始，就逐步形成了同各民主党派合作共事的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后，又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我们国家进入了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心任务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革命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原则与新时期的形势与任务紧密结合，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统一战线理论，恢复并进一步完善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一、新时期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

历史经验教训表明，统一战线的兴衰与党的事业成败息息相关，什么时候用好了这个法宝，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什么时候忽视或丢弃这个法宝，党的事业就遭受挫折和失败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正确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性质、特点，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建立起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向前发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5页。

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政治基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我们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了同盟关系，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组织起有各革命阶级参加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高潮。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由于“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的影响，排斥了广大的同盟军，使我们党在孤立作战的境地中遭受了严重损失。抗日战争时期，在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指导下，我们党实现了与国民党的第二次合作，形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党的发展壮大。了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加巩固和发展，从而加速了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崩溃和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的胜利。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毛泽东把统一战线同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并列为我们党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①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继续依靠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采取和平赎买、平稳过渡的政策，逐步消灭了剥削阶级，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辉煌成就，并且调动起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热忱，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此后，由于“左”的错误的干扰，社会主义的统一战线不断受到冲击破坏。“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歪曲篡改党的统战理论，肆意践踏统战政策，疯狂迫害统战对象和统战干部，社会主义的统一战线遭到灾难性的破坏，因而也给社会主义事业造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257页。

成无可挽回的重大损失。

历史经验教训表明，统一战线的兴衰与我们革命和建设的成败密切相关，什么时候我们党能够正确运用统一战线这个法宝，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兴旺发达；反之，什么时候忽视或丢弃这个法宝，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和失败。

新时期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不是可以缩小，而是应该扩大

统一战线是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当历史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以后，在国内外形势和党的中心任务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还要不要坚持和运用这一法宝？总结历史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根据党在新时期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邓小平明确指出：新时期“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不是可以缩小，而是应该扩大”。^①

首先，现代化建设需要广泛的统一战线。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最重要的是科学文化知识，最需要的是各类优秀技术人才。统一战线就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不可多得的智力库、人才库。作为统一战线基本对象的各民主党派中，聚集着大量知识分子，不少人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较丰富的管理经验，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3页。

较广泛的社会联系，是现代化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一支重要力量。同时，现代化建设还需要引进境外资金、先进技术和设备，作为统一战线重要对象的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及其眷属，就拥有这方面的明显优势。做好党的统战工作，就可以充分开发利用人力、财力和物力以及信息资源，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创造性，就可以把各种力量引导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为完成党在新时期的战略任务，实现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服务。

其次，实现“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需要广泛的统一战线。“一国两制”，是邓小平为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实现和平统一祖国的宏图大业而提出的伟大构想。随着香港、澳门的回归日近，这一构想正逐步变成现实。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原因，在实现和平统一祖国、特别是如何解决台湾的问题上，目前还存在许多障碍。克服这些障碍，就非常需要发展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因为，统一战线中各界爱国人士、各民主党派成员、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广大台胞、台属等，同台湾各界及海外各方有着广泛的联系。做好党的统战工作，充分调动这些积极因素，使其在促进台湾回归祖国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就能在实现“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过程中增加助力，减少阻力。

其三，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既是我国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现代化建设必须具备的外部环境和条件。而争取、创造这样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也与统一战线密切相关。一方面，它需要充分发挥国内统一战线的作用，

要积极开展人民外交活动，加强同世界各国的民间友好往来，扩大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树立我国在国际社会上的良好形象。另一方面，要团结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共同促进和发展国际反侵略扩张的统一战线，增强反对霸权主义、制止战争的和平力量。国内、国际两个统一战线的互相支持，互相促进，才能够维护世界持久和平，保证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二、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性质、范围 and 任务

新时期统一战线，已经发展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

1979年6月，邓小平在第五届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的开幕词中，对现阶段我国社会各阶级、阶层、党派以及民族等状况作出了全面、正确的分析。他认为，经过30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我国的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具体表现为：1. “我国工人阶级的地位已经大大加强”。^①“我国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5页。

广大的知识分子，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在努力自觉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① 2. “我国农民已经有二十多年历史的集体农民。”这就是说，新时期的农民阶级已经不是尚在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上徘徊观望犹豫不决的小生产者，而是已经坚决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型劳动者。因此，在新时期，“工农联盟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基础上更加巩固和发展”。3. 我国各民族已经“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4. 我国原来的民族资本家“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正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贡献力量”。5. 各民主党派“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6. “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心向祖国，爱国主义觉悟不断提高，他们在实现统一祖国大业、支援祖国现代化建设和加强国际反霸斗争方面，日益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②

鉴于上述各方面的变化，邓小平指出：新时期“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③ 1980年8月，在第五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邓小平又对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5—186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6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7页。

我国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性质和范围作了进一步说明。他说：“我国革命的爱国统一战线具有空前的广泛性，它在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基础上更加巩固和发展了。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团结，使我国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在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实践中，做出积极的贡献。”^①

根据邓小平对我国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性质、范围的正确分析和界定，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高举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两面伟大旗帜，逐步建立形成了两个基本的统一战线联盟：一个是以祖国大陆范围内全体劳动者和爱国者组成的、以社会主义为政治基础的联盟；一个是以广泛团结台、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以拥护祖国统一为政治基础的联盟。两个范围联盟的形成和发展，使新时期统一战线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有了新的发展和扩大，形成了立足大陆，面向台、港、澳和海外的新形势、新格局。

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完成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宏图大业服务

统一战线历来都是为党在各个时期的政治任务服务的。

^① 《邓小平论统一战线》第239页。

在新时期，我们党面临着改革开放的新形势，肩负着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历史重任。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任务，是与党所面临的这一形势与任务相一致、并为其服务的。正如1979年10月，邓小平在接见出席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的代表时所讲：“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共同奋斗，还要为促进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共同努力。”^①

按照邓小平有关讲话的精神，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任务主要包括几方面：

1.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出谋献策，贡献力量。经济建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问题，也是新时期统一战线的工作重点。通过做好统战工作，将统战工作与经济工作结合起来，把统一战线各方面成员的积极性、创造性调动起来，投入到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上来，就能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为此，一方面，要发挥统一战线本身所具有的人才智力优势，直接为发展生产力服务。另一方面，要发挥统一战线所具有的团结统一的作用，通过搞好统战工作，把四面八方的各路人马都集中起来，组织起浩浩荡荡的建设大军，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注入强大的社会力量。

2. 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3页。

商制度，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服务。随着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社会的各阶层、政党、社团和各方面社会成员的民主意识和参政议政的要求，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和统一战线内部充分地表现出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项重要制度和重要形式，也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继续需要政协就有关国家大政方针、政治生活和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各项社会经济问题，进行协商、讨论，实行互相监督，发挥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作用。”^①可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必将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完善和发展。

3. 发扬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传统，发挥统一战线在人民群众中广泛的思想教育作用，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增强团结、维护安定团结政治局面服务。建设物质文明固然离不开统一战线，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同样离不开统一战线。统一战线的各界人士中相当一部分承担着教育和培养人才、创造和传播精神产品的光荣任务，发挥这批党外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对于培养“四有”新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水准和科学文化素质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另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同的阶级、阶层、党派、社会团体等，既有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又有具体利益上的差别和矛盾。这些差别和矛盾必然反映到统一战线中来。因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7页。

此，要做好统战工作，采取协商讨论、沟通思想、交流感情等途径和方式，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排除阻力，化解矛盾，克服困难。正如邓小平所说：“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要发扬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传统，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继续进行思想改造的工作，帮助各方面的人士和群众在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共同基础上不断增强团结，取得新的进步。”^①

4. 促进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统一大业，是新时期统一战线又一重大历史任务。邓小平指出：“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是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广大骨肉同胞在内的共同愿望，也是我们革命的祖国的统一战线所面临的一项光荣的神圣的任务。”^② 他认为：在促进祖国统一大业中，爱国统一战线具有其他组织形式无法代替的重要作用。他主张，要充分发挥这一作用，利用各种有利条件，通过多渠道、多领域、多层次、多形式扩大与台湾各界的接触，增进民族感情，发展海峡两岸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逐步推动这种友好交往由民间到官方，由一点到全面，由商界、学界到政界，最后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同时，爱国统一战线还要发动各方人士积极宣传“一国两制”的和平统一方针，争取台湾各界的理解和支持，孤立台独势力，促进和谈，使“一国两制”的伟大设想早日实现。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7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5页。

总之，新时期统一战线有着广阔的活动舞台和发展前景，在振兴中华、统一祖国的宏图大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大有可为。

三、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合作，是我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是社会经济和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一般地说，政党是代表某一特定阶级，并为这一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政党也可能是几个阶级或阶层的联盟。我国现有的八个民主党派，就是带有阶级联盟和统一战线性质的政党。在历史上，我国各个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则已发展成为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共同组成的政治联盟。

中国各民主党派大都是在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时期，或者是在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决战的解放战争时期，在

中国共产党统战政策的影响感召下，为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而成立的，是爱国民主运动的产物。这些民主党派从成立开始，就积极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统一战线，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并肩战斗。民主革命时期，他们纷纷加入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推动全国抗日救亡和反投降、反内战的民族解放运动；抗战胜利后，各民主党派又同中国共产党一道，积极参加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与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独裁统治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前夕，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发布的关于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号召，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制定了具有国家根本大法性质的《共同纲领》，选举产生中央人民政府，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共事关系有了新的发展。在我们党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在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56年后，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确立，为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共事关系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政治舞台和发展前景。但是，由于“左”的错误干扰，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我国各民主党派遭到了灾难性的打击，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合作共事关系也名存实亡。经过十年浩劫的磨难，各民主党派并没有动摇同我们党合作共事的基本立场。相反，坚定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完成了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制

定出一系列正确对待民主党派的方针政策，建立健全了一系列有关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规章制度，各民主党派的活动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和发展。现在，各民主党派根据自己的特点和优势，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积极参加国家大政方针的协商和讨论，鼓励和推动所联系的成员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积极开展包括经济、文化、科技等在内的各种咨询服务，利用多种形式为现代化建设培养人才，同时还利用自己在台、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中的广泛联系，积极推介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在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大业中发挥积极作用。

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合作共事的历史经验和教训，1979年10月，邓小平在题为《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的讲话中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①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又强调：“我国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我们党共同奋斗，在社会主义时期同我们党一道前进，一道经受考验。在今后的建设中，我们党还要同所有的爱国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长期合作。”^②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5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页。

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根本方针，同各民主党派建立起赤诚相见的诤友关系

早在1956年，毛泽东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后，就提出我们党与民主党派要坚持“长期合作，互相监督”的方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不久，邓小平在论述人民政协这个统一战线基本组织形式的工作时讲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继续需要政协就有关国家大政方针、政治生活和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各项重大问题，进行协商、讨论，实行相互监督。他还针对过去那套“左”的错误做法，强调：“我们要广开言路，广开才路，坚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让各方面的意见、要求、批评和建议充分反映出来，以利于政府集中正确的意见，及时发现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①1979年10月，邓小平又明确指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是一项长期不变的方针”。^②他热诚希望，“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都以主人翁的态度，关心国家大事，热心社会主义事业，就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各方面的工作，勇敢地、负责地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和批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7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5页。

评，做我们党的诤友，共同把国家的事情办好”。^① 在邓小平的倡导和推动下，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合作共事关系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和发展，呈现出一派积极向上的新气象。在这样的形势下，1982年1月，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胡耀邦提出：“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我们一定要同党外朋友真正建立起‘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② 同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正式地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完整地表达出来，将其确立为新时期处理统一战线内部党与非党关系的基本方针。并进一步指出，坚持这十六字方针，对于巩固和发展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统一战线内部各种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完成振兴中华、统一祖国的伟大历史任务，具有重要的作用。“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继承与发展。它意味着，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有着共同的任务，共同的奋斗目标，成则共荣，败则共辱。既然荣辱与共，为了达到共荣，自然要肝胆相照，赤诚相见，互相监督，长期共存。

十六字方针的提出，标志着新时期统一战线的发展和壮大，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标志着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统战工作在新形势下的进一步成熟、稳固和发展。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5页。

② 转引自1982年10月4日《人民日报》第1版。

人民政协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实现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的重要组织，也是我们政治体制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实行互相监督的重要形式

人民政协，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我国统一战线最完备的组织形式。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有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人民团体、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和各界爱国人士以及归国侨胞、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等代表共同参加的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人民政协在我国政治生活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居于十分重要的位置。1948年4月30日，在全国处于革命与反革命决战的前夜，我们党适时地发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号召，得到了全国各个革命阶级和阶层、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爱国华侨的拥护。经过充分的筹备，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顺利召开，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从1949年9月到1954年9月，人民政协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是当时我国最高的国家权力机关。1954年9月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人民政协虽不再具有国家权力机关的性质，但依然作为我国统一战线的“中心”和“总部”而存在。此后，人民政协的活动随着我国政治民主生活的起伏而起伏，和我们党与国家

的命运一样，经历了长期的磨难和曲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邓小平高度重视人民政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在1978年2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上，邓小平被推选为全国政协主席。1979年6月15日，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的开幕词中，邓小平全面而深刻地回答了新时期人民政协的性质、地位、作用和任务等方面重大问题，为人民政协提出了一个新的正确的行动纲领。他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任务是十分光荣的，工作是大有可为的。”^①1980年8月，邓小平又指出：“人民政协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实现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的重要组织，也是我们政治体制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实行互相监督的重要形式。”^②他认为，新时期的人民政协，应当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在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充分发挥它的重要作用”。^③在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作出自己的努力。在邓小平的大力推动下，这些年来，人民政协的活动空前活跃，其地位和作用不断得到加强，其组织体系和工作方式不断得到完善，并正在继续朝着经常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成为新时期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一个卓有成效的重要方面。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8页。

② 《邓小平论统一战线》第239页。

③ 《邓小平论统一战线》第241页。



建 设 篇

第七章 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关键是把党的自身建设好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最基本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使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法定的领导地位和和在社会主义各项事业中具有核心领导地位。由于党的这种特殊的地位，在变化万端的复杂的国际形势下，面对着历史沉淀下来异常沉重的包袱，以及如此艰巨的中国社会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党是否具备足够的执政能力，其内部结构是否足以抵御各种内外压力，党是否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不仅对于党本身执政地位的巩固，而且对于中国的命运与前途，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因此，邓小平一再强调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指出中国问题的关键是把共产党自身的建设搞好，使党真正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坚强核心。

一、中国的事情要办好，关键 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

中国的事情要办好，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这个论断，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

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了重要谈话。这个谈话，是全面改革进程中思想解放的科学总结，是开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宣言书。在这个谈话中，他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因此，“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①

这个论断，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的伟大作用已经被历史证实。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力量。是不是执了政，有了权，就能把建设搞好呢？问题远没有这样简单。党执政以后，地位变了，手中的权力可以为人民谋利益，也会用来为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0、381页。

少数人谋利益，甚至为个人谋私利。可以说，执政是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共产党包括路线、组织、思想、作风等的自身状况如何，已经维系着国家的兴衰、民族的振兴了。回顾建国40多年来，我们中国的事情有办好了的，也有没有办好的，都同我们党有直接关系。比如说，由于我们党内部存在“左”的思想，受其影响，相当一个时期内政治路线就发生偏差，一不抓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而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没完没了地搞政治运动，进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二是脱离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实际的基本国情，说什么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最终，就导致产生“文化大革命”这个长达10年的全局性浩劫！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审视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发展道路和发展阶段，终于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找到了正确的方向，蒸蒸日上，举世瞩目。当然，影响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还有其他许多客观的、主观的原因。但这里，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却能高瞻远瞩地运用辩证法，抓住执政党的自身建设，这就不仅抓住了主要矛盾，而且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

这个论断，也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针对社会主义阵营，西方敌对势力竭力搞和平演变，宣称要“打一场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尽管他们使尽浑身解数，却长时间没有得手，只是到了80年代末，才突然国际风云变幻，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顷刻陷入低潮。这是什么原因呢？对此，邓

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东欧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①这里，无论西方敌对势力如何搞和平演变，但这毕竟是外因。外因只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事物变化的依据。无论东欧剧变，还是苏联解体，其根本原因，都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内部出了问题。比如，在政治上把马列主义教条化，始终未能制定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严重削弱自身作为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在经济上没有抓好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经济发展缓慢，与西方和周边国家的经济差距拉大；在组织上没有建立起坚强的领导核心，一遇动乱，领导层即发生分裂，基层组织不起作用；在作风上严重脱离人民群众，干部搞特殊化，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相当严重，等等。从这个角度看，“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的论断是多么发人深省！进而可见新时期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是何等之重要！

只有把党的自身建设好，我国现代化建设才会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才能动员和组织亿万人民艰苦创业，团结奋斗

中国是个有 12 亿人口的大国，事情方方面面，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要办好什么呢？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抓住了这个问题，就抓住了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44 页。

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就能够纲举目张，带动办好中国其他方方面面的事情。那么，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党的自身建设是什么关系呢？

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我们党制定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中国是一个长期贫困，经济、教育、科学、文化都相当落后的大国。要在这样的国度高速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在较短的时间内急起直追，赶上经过几百年资本主义发展的西方发达国家，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可以说，在中国，除了共产党，没有任何一个党派能够担当这样的历史使命。而我们党，第一，有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政治优势；第二，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密切联系群众的路线；第三，有在社会主义建设40多年来，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所以，这就能够制定出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引导广大人民群众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这条政治路线，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它的理论指导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立论基础是一切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这条政治路线是我们党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发展道路、根本任务、发展动力、政治保证、外在条件等等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的制定，就为我们党如何领导全国人民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明确了指导思想、奋斗目标、战略步骤，以及相应的方针、政策。这些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这条政治路线的正确性，同时也充分证明，如果没有邓小平作为改革开

放总设计师的指导，没有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总书记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强领导，这条基本路线是制定不出来的，即使制定了也难以贯彻执行。

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我们党保持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社会环境。近代中国，帝国主义侵略，军阀混战，吃够了“乱”的苦头。“文化大革命”也是大乱，无休无止地打派仗。这些“乱”，产生了许多严重恶果，其中之一，是失去了发展的机遇，极大地拉开了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所以，邓小平非常强调安定团结，强调社会稳定，说中国不能乱哄哄的，只有在安定团结的局面下搞建设才有出路。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那末谁来维护安定团结？在中国，只有共产党能够。因为我们党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有5400多万党员在人民群众中起表率作用、先锋模范作用。要安定团结，要稳定，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就要加强党的领导。共产党的领导，这个丢不得，一丢就是动乱局面，或者是不稳定状态。一旦不稳定，甚至动乱，什么建设也搞不成。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不懈地进行反“左”和反右的斗争，包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平息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等，始终保持政治的稳定。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党中央坚持两手抓，两手都硬，抓出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在广东，这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时对广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

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①广东省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落实邓小平的要求，采取许多有力的措施，比如，自上而下地落实社会治安一票否决的制度，就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我们党动员和组织亿万人民艰苦创业，团结奋斗。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要把共同愿望变成共同行动，让各族人民为自己的根本利益而奋斗，就要靠我们党去正确引导。我们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因而党能够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引导群众正确处理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矛盾，处理不同局部利益之间的矛盾，特别是能要求广大党员不谋私利，发扬奉献精神，在现代化建设中，起先锋模范作用。所以邓小平说：“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②现在，我们党正是这样，制定了能有效地集中和贯彻全国人民统一意志的政治路线，有了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共同理想和共同目标，有各个时期党的具体的方针、政策的引导，还有坚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可以说，在党的领导下，广大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1页。

人民正在万众一心奔四化，昂首阔步迈出跨世纪的新步伐。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以邓小平执政党的建设理论为指导，制定了一系列大力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文件。在思想建设上，强调要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在组织建设上，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抓好基层组织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等；在作风建设上，强调密切联系群众，加强廉政建设等。在制度建设上，强调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和党的代表大会制等。这样，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就形成了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相辅相成的整体部署。我们相信，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努力，这项“新的伟大工程”一定能够扎实开展，真正把我们党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二、密切联系党的基本路线，把党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

坚持党要管党和从严治党，把党建设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站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党要管党，是邓小平对党的自身建设总结出来的基本经

验，是新时期必须坚持的一条重要原则。

作为执政党，要严格做到党要管党。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邓小平就指出，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很容易使我们的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还很容易在共产党员身上滋长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1962年2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又说，应该指出，最近几年，我们党的领导，党的工作，是有严重缺点的。特别重要的是党的优良传统受到削弱……，我们宁肯把这个问题估计得重一点，使全党有所警惕。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邓小平更加重视党要管党的问题。他在充分肯定我们党的本质和主流是好的，在领导全国人民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方面作出了巨大成绩的基础上，严肃地指出了党的自身建设存在许多不适应新形势的问题。特别是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之后，他语重心长地指出，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又警醒地说，我们最近10年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确实，在我们党内，思想上“左”的和右的东西都在影响着，根深蒂固的是“左”的东西；组织上贯彻民主集中制不力，一部分基层组织软弱涣散，相当部分党员干部的素质不高；在作风上，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很多，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严重，等等。尤其是有不少党组织的负责同志抓经济建设这手硬，抓党的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手软，党不管党的情况很普遍，这样，就不仅削弱党在新时期的战斗力、凝聚力和

吸引力，影响了现代化建设事业这个大局，让其发展下去，还有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

党要管党，抓好自身的建设，最重要的是密切围绕党的基本路线进行。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邓小平高度评价了党的基本路线，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所以，在党的十四大上，江泽民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对党的建设提出了纲领性的要求：“在新的历史时期，党所处的环境和肩负的任务有了很大变化，党的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建设都面临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我们一定要结合新的实际，遵循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党要管党和从严治党，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努力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使我们这个久经考验的马克思主义的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更好地发挥领导核心作用。”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含着内容丰富的党的建设理论。密切联系基本路线建设党，就是要在邓小平执政党建设思想的指导下，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变革中，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站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恢复并发展党的 正确思想路线

关于思想路线的重要性，邓小平认为，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正确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执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确实，政治路线是党为了实现一定历史阶段的奋斗目标而规定的总路线和总任务；而思想路线则是制定政治路线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文化大革命”思想路线错了，造成空前浩劫，这个教训是相当深刻的。因此，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为我们党重新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这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我们党依据这条思想路线，重新认识中国的国情，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不懈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使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在党的思想建设中，如何用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武装党员干部是一个重大课题。实事求是好说，但真正做起来却相当不容易，因为这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无限发展过程，是世界观、方法论的问题。现在，影响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实事求是的，一是主观意志，主要是受旧的思想观念所束缚；二是形式主义，工作是为应付而不是为了解决问题；三是官僚主义，不同程度地脱离了群众这个实践主体；四是私心杂念，不是立党为公而是立党为私，等

等。所以，正确的思想路线的确立，应当说是一个提高思想政治素质的过程。当前，我们必须加大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的力度，用以指导改革开放这个无限生动活泼的群众实践和社会实践，通过实践总结提高，从而牢固树立“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坚持正确开展反倾向斗争，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坚定不移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

反对错误倾向，是党能否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一个重大问题。错误倾向是客观存在的，问题是对每一个历史时期、每一个历史阶段，是作出正确的合乎实际的估量，还是作出错误的脱离实际的估量，这就关系到党的成败兴衰。回顾 60 年代，不断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因而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就导致了发生“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错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正确地进行反对“左”和右这两种错误倾向的斗争，针对“左”，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针对右，坚决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1992 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提出了“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①的论断，这是对新时期反对错误倾向作出的理论概括，对指导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顺利进行具有重大的意义。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75 页。

中国历史上曾是小生产的汪洋大海，可以说“左”的思想有其深厚的社会根源。反思我们党的历史，则还有一个极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就是认为“左”比右好，前者是革命的、是方法问题，即使错了也是好心办错事，是可以谅解的，犯了错误也处理从轻；而后者就不一样了，本质是反动的，是立场问题，是存心办坏事，决不可饶恕，一经发现，就从重查处。有如此深层次的思想状态，就必然认为“左”比右好，宁“左”勿右。事实正是这样，几十年的“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一种习惯势力。现在中国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在制定和实行具体政策的时候，总容易出现一点留恋过去的情况，习惯的东西就起作用，就冒出来了。同时也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到搞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这些年来，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取得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可以说正是遵循邓小平这一论断，正确开展反倾向斗争的硕果。

不断完善党规党法，实现党内生活民主化制 度化，大力加强党的制度建设

在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中，一个重要特色是强调制度建设，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大贡献。在著名的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他指出，制度问题更带

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邓小平不仅具体地分析了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存在的弊端，而且系统地论述了制度建设的内容，包括领导制度、工作制度、生活制度、作风制度，等等。在此基础上，还提出了制度建设必须遵循的原则，主要有：制度建设要有利于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要立足于改革；要与思想教育密切配合；要与国家法制建设协调一致等。根据邓小平制度建设的思想，党的十三大提出了“在党的建设上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的党建新思路。

这些年来，我们党在制度建设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制定出一大批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完善了党规党法。可以说，“无法可依”的现象基本克服了。但与党内生活民主化法制化，实现从人治到法治的飞跃还有相当大的距离。现在各级党组织无论是领导制度、组织制度、监督制度、生活制度都制订了不少，确实有些是“写在纸上，贴在墙上，讲在嘴上，就是落实不到行动上”的。究其原因，一是搞形式主义，建立制度搞“人有我有”，是为了应付上面检查；二是认识片面，不适当地夸大了制度的作用，以为有了制度就什么问题也能解决；三是不够科学和规范，如实体性制度多，程序性制度少，两者不配套，难于具体操作；四是抓制度时忽视思想教育，缺乏高的思想素质作基础，制度就很容易成为一纸空文，等等。这些，正如有的党员同志指出的：“有法不依比无法可依的危害性更大！”由此而论，我们在制度建设方面还要狠下功夫，才能克服党的建设中的无序、反序状态，以保证党的

肌体的健康和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

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强党的团结统

一、努力搞好党的组织建设

1979年3月，邓小平对民主集中制的含义作了科学的阐述：“我们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① 党的十四大在修改党章时，改变了“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高度的集中”的表述，而采用了上述邓小平关于民主集中制本质特征的表述。确实，作为我们党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和组织建设中的运用。民主与集中既是互相联系，又是互相制约的。邓小平在分析我们党内生活和政治生活时，指出两者矛盾的一面，认为，一方面，党内要有充分的民主，但实际上，命令主义、少数人或个人独断专横的现象确是十分严重的。因此，一言堂、个人说了算，集体做了决定少数人不执行等等毛病，都要坚决纠正。另一方面，党内要坚决维护集中，因为分散主义的现象确是很严重的。所以，在目前情况下，尤其需要着重强调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这几条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全党服从中央。但邓小平更重视这两者辩证统一的一面，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统一；没有集中统一，党就没有战斗力。我们需要集中统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5页。

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而这个集中，总是要在民主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地正确地实现。

邓小平用辩证思维对民主集中制这些分析，是解决当前我们党内生活中民主不够，集中也不够这两种倾向的思想武器。说民主不够，确实无论在机关还是企业，都有某些主要领导人个人说了算，独断专行，拍脑袋作决策，甚至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等等。说集中不够，确实有些班子不团结，不协调，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内耗严重，甚至对中央的政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针对这些情况，党的自身建设一个重要课题必须是健全民主集中制：一是要重点抓好党委的领导制度和工作制度，强调要用纪律来保障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二是要突出抓好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才能落到实处；三是要维护中央的权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树立全局观念，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坚持干部队伍“四化”方针，造就一支朝气蓬勃的领导干部队伍

“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① 这是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0页。

邓小平的一句名言。培养和造就一支宏大的党的干部队伍，是关系全局的极端重要的任务。1980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首次完整准确地提出了干部队伍要“四化”的方针，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四化”方针，是干部德才兼备原则在新时期的具体运用和发展。他把“德”表述为“革命化”，把“才”表述为“知识化、专业化”，把“年轻化”作为干部“德”、“才”赖以依存的具体条件。在“四化”中，“德”是处于首位，他说，提出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三个条件，当然首先是要革命化。我们选拔干部，必须要注意了解他是不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符合这个条件的干部，要加强教育，必要时调动。邓小平既重视矛盾的主要方面，也不忽视矛盾的次要方面。关于“才”，他指出，为了适应党和人民事业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党必须特别注意培养精通生产技术和各种专门业务知识的干部，因为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力量。关于“年轻化”，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更寄以期望：“让新上来的人放手干”，“让更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①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和“四化”的方针，不断深化组织人事制度的改革，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中涌现了大批优秀人才。但从需要建立一支宏大的适应现代化建设的干部队伍的要求看，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而当今世界的经济竞争和社会竞争，说到底还是人才的竞争。面对挑战与机遇，建设一支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1页。

高素质的宏大的党的干部队伍，我们任重道远，一定要有紧迫感，加大力度，培养和选拔一大批跨世纪的优秀的年轻的领导干部。

毫不留情地反对腐败，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和作风建设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问题。从这一论断出发，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以反对腐败，从严治党。他分析了党的现状，指出我们党现在的状况还远不是都令人满意。党内还存在着不少没有来得及清理和解决的严重问题。腐败因素，是党内思想不纯、组织不纯的严重表现。他进而以警钟要用重锤敲的态度强调：“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他又从群众路线的角度看反腐败，强调一定要取信于民。要求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他高瞻远瞩地论述反腐败的长期性，认为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端正党风的工作就得干多久，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就得干多久，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贯穿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之中。此外，邓小平还谈到党风廉政建设必须从领导干部做起，要抓好制度建设等问题。这些，就构成了我们党新时期反腐倡廉完整的思路和鲜明的指导方针。

邓小平在视察南方讲到两手抓时特别指出：“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

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① 这几年来，广东的各级党组织遵照邓小平的要求，在党风廉政建设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两个文明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尤其是在反腐败方面不断加大力度，坚持不懈地同贪污、贿赂、走私等现象作斗争，查处了一批大案要案；严肃清理机关不正之风和行业不正之风；加强廉政教育和制度建设，使广大党员干部真正树立“不想贪，不敢贪，不能贪”的思想素质和约束机制。但是，反腐败毕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两种体制转换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空档和漏洞，因此反腐保廉还有许多难点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遵照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去探索研究，以卓有成效地长抓不懈。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8页。

第八章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贯重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列宁曾经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毛泽东更强调必须把思想建设摆在党的建设的首位。然而，在党执政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却受到“左”倾思想的严重干扰，加上个人崇拜的严重危害，导致背离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许多理论是非也被完全颠倒了。这种状况，使党的事业屡遭挫折。

临危受命的邓小平，以其非凡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首先提出要冲破已经成为精神枷锁的“两个凡是”的桎梏，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亲自发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倡导了我国的思想解放运

动，恢复、发展和丰富了党的思想路线；并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根据党面临的新的形势和任务，在总结党和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推动了全党思想大解放

坚持党的正确思想路线，是党的事业发展的前提

在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理论上的大飞跃。第一次是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首创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在总结党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实现了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并把我国革命迅速引向了胜利的道路。第二次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邓小平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几十年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根据执政党和人民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转危为安，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这两次理论上的大飞跃，虽然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但

都成为了党的历史的转折点，也都是运用和发展党的思想路线的结果。

众所周知，由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由于“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在思想理论方面，形而上学猖獗，教条主义横行。因而，要清除这些错误的影响，使党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首要的任务是恢复党的正确思想路线。面对积习难改、积重难返的现实，邓小平果敢地担负起这个重任，举起了反对“两个凡是”的旗帜，提出了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命题。他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也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978年他支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恢复了党的正确思想路线，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

坚持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的辩证统一，是邓小平执政党建设理论的精髓

为了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提出了解放思想的口号。他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与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目的和归宿。如果思想上因循守旧，观念上凝固僵化，就根本不可能正确研究和把握事物的客观规律，就不可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而且就纠正历史上

的错误而言，更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冲破错误的藩篱，重新走上正确的道路。因此，他反复号召全党思想还要更加解放一点，步子还要再大一点，要敢“闯”敢“冒”，并且指出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精神，就不可能走出一条新路、一条好路来。然而，解放思想绝非从主观愿望出发，不顾客观规律，蛮干瞎干，搞不切实际的空想。

邓小平倡导的全党的思想解放运动，恢复和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一方面为全党克服长期以来“左”的僵化的思想影响提供了思想武器；另一方面为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努力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是时代赋予我们党的历史任务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非常重视党的理论建设，提出全党必须重新进行一次学习，努力提高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他认为，我们现在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代特征和党的任务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要学习的新知识确实很多，这就更要求我们努力针对新的实

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运用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来积极探索解决新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基本问题的本领，把我们的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推向前进。对于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邓小平特别要求要更加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加强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直达到我们的最后目的，实现共产主义。

第一，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中国进入世界上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伟大事业。要实现这个宏伟目标，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理论指导，如果在理论上没有重大的突破，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邓小平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出发，在大力倡导思想解放运动的同时，及时地提出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他说：“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①一方面十分清楚地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不可动摇性；另一方面又着重强调了由于在改革开放当中，必然会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新经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我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

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第二，必须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任何政党都是在一定的思想理论指导下进行活动的。不可否认，我们党在执政以后，由于“左”倾思想的严重干扰，我们在理论上有过许多失误。在总结国际共运特别是党执政以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在和平与发展业已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党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和确立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这方面，邓小平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由于这一理论体系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如何实现党的基本路线；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如何把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搞得更好；如何使国家长治久安和繁荣富强，一句话对于党如何按照中国的具体国情，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因此，正如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的那样，必须坚持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

努力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必须贯彻“精学管用”原则

要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就必须有实事求是的良好学风和正确的原则方法。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邓小平明确提出：“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①这一原则，对全党的理论学习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

首先,“精学管用”是要求我们全党的学习不搞本本主义,不搞形式主义。过去,由于受“左”的影响,许多党员干部的理论学习一唯书,二唯上,只知背诵马列主义词句,生搬硬套某些教条,从概念到概念兜圈子。在学习中,往往也只讲形式,比如,开了多少会,多少人参加了学习,写了多少篇学习笔记,以统计数量作为评选先进的指标。特别是不切合实际地要求普通党员要读长篇大论的本本。这样,就把理论学习搞得越来越玄,离现实越来越远,党员干部越来越反感。对此,邓小平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这里,邓小平用最明白的语言说明,“精学管用”是要求学马列要有层次性、要对不同层次的人有不同的要求,要适合群众的特点。这些年来,广东在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党员教育上,正是遵循邓小平倡导的这一原则,把学马列搞得生动活泼,像党员们说的“有味道”,“对胃口”。比如,根据不同的学习内容,不同的学习层次而采用不同的学习形式,包括提高党校学习的计划性和效果性,强化党内法规教育和反腐败教育,积极开展内容丰富的党日活动等。像党校学习就按照领导干部、中青年干部、后备干部、基层干部和普通党员等不同的层次对象,举办培训班、轮训班、试验班、研讨班和境外考察培训班等等。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注意吸取新鲜经验,采用多种新的载体,如企业文化、提合理化建议、知识竞赛等,引导党员干部用马列主义作思想指导,确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各种现代意识和现代观念,为广东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搞活经济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其次，“精学管用”的重点是要求我们学习马列主义要掌握精神实质。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强调“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所谓“学马列要精”，就是在内容上要精，掌握其精华；在思想上要精，掌握其精髓。内容上的精，就是反对不着边际的泛泛而读，反对没有重点的胡子眉毛一把抓。这就要求各级党组织把提高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在思想上要高度重视，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在工作部署上要做到长计划，短安排，有的放矢。思想上的精，就是把握住马列主义的精神实质，说到底，是要掌握实事求是这个精髓。回顾广东10多年来党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虽然是经历了许许多多的风风雨雨，但是基本的有两条是肯定的：一是不搞形式主义，不搞“扯不断，理还乱”的无谓争论。尽管在姓“社”姓“资”问题上众说纷纭，压力颇大，有“香香臭臭又十年”之说，却始终坚持邓小平所说的，就是不去搞争辩，只重实干，多干少说，干了再总结，用社会实践来检验。二是坚持实事求是。不论是经济建设还是党的建设，都从改革开放的实际出发，都从广东的实际情况出发，解放思想，扎扎实实拿出可行的措施，把政策用足用活，最后以“三个是否有利于”来衡量，对的就总结经验，肯定提高；不对的就吸取教训，加以改正。广东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这10多年来各级党组织对“精学管用”原则的贯彻过程，就是广东党员干部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大提高的过程。

再次，“精学管用”重在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马列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性。我们学习它的目的，就是要用其立

场、观点、方法，去研究、分析、解决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问题。所以，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学以致用是我们党的学风的重要特色。一当正确理论被群众所掌握，就成为改造物质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这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本身。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的各级党员干部学习马列主义，中心内容是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努力在学以致用上下功夫。比如，在发展道路问题上，不是照搬某种模式，而是从实际出发，如落实“扶贫”措施，坚持走自己的路，像被称为广东“四小虎”的顺德、南海、中山、东莞，他们各自高速发展经济的路子都各有特色；在发展方向问题上，正确处理先富后富的关系，积极采取措施，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在推动社会进步问题上，坚持两手抓，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而且两手都要硬；在处理经济建设与党的建设问题上，强调越是改革开放越要加强党的建设，等等。回顾广东改革开放的实践，各级领导干部正是遵循邓小平的教导，在繁忙的工作中仍然有一定的时间学习，熟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从而提高了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在各项工作中不断开拓创新的。

三、确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方针，坚持不懈地反对僵化和资产阶级自由化

我们党的历史，就是在不断反对“左”和右的错误倾向中发展和壮大起来的历史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左”和右的错误都曾给革命和建设带来了极大的危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惨遭失败，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国民党反动派大屠杀的血泊之中。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使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革命力量都受到极大损失。社会主义时期，三年“大跃进”和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受到了严重挫折。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率先垂范，高屋建瓴地指导了多次反错误倾向的斗争。

反对“左”的错误倾向，最主要的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

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正式开展了全国范围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精神和洞察一切的犀利眼光，指导了这场大讨论。一方面，他高瞻远瞩地指出了这场讨论的重大意义。是继续搞“两个凡是”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还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这大是大非面前，邓小平多次鲜明地指出，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实际上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是个政治问题，思想路线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正是全党全国人民充分认识了这次讨论的意义，才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和舆论准备。另一方面，他通过指导这场讨论来达到重新确立党的正确思想路线的目的。在反复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础上，邓小平准确地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根据邓小平的一贯思想和有关论述，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对党的思想路线作了完整的表述，并进而指出：“全党必须根据这条思想路线，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调查研究现实情况，解决国内和国际事务中提出的新问题，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作为总设计师，10多年来，邓小平始终把纠正和克服“左”的倾向，作为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重要一环来抓好。他先后提出了“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敢闯”、“换脑筋”等形象生动的说法，激励人们自觉消除“左”的陈旧的僵化的观念，不断

地解放思想，推进经济发展上新的台阶。

反对右的错误倾向，最主要的有两次：一次是1986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另一次则是平息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当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为一种思潮出现时，邓小平就敏锐地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反复告诫我们，如果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再来一次折腾；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科学地界定资产阶级自由化概念的内涵，提出反对右的倾向的许多政策原则，如就资产阶级自由化产生的原因而言，主要是由于党对思想战线领导的软弱涣散；就范围而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主要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就时间而言，是长期的斗争，不断反映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就方法而言，不搞运动，主要是以教育、引导为主，必要时才采取一些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针对极少数人煽动下发生的政治动乱以至暴乱，邓小平态度坚决、立场坚定地指出：“中国不允许乱”，“不能允许随便的示威游行”。^①要坚决取缔非法组织，彻底平息暴乱，“对于罪大恶极的不能手软”。^②总之，通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平息政治风波，邓小平为全党全国人民提供了反对右的错误倾向的强大思想武器。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6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4页。

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以史为鉴提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

邓小平关于“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论断，是从切身斗争体会中总结出来的，是在总结历史经验、以史为鉴过程中提出来的。我们要站在唯物辩证法的高度，深刻理解这个方针。

第一，要坚持两点论。

从实际出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这是邓小平一贯的实事求是的反错误倾向的指导思想。他多次指出，搞现代化建设，搞改革开放，存在着“左”的和右的干扰问题；“左”的干扰更多的来自习惯势力和教条主义，右的干扰也帮了习惯势力的忙；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他深刻地指出，现在中国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在制定和实行具体政策的时候，总容易出现一点留恋过去的情况，习惯的东西就起作用，就冒出来了。同时也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改革、开放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到搞资本主义。可以说，“左”和右的错误倾向都有深厚的历史根源、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作为一种习惯势力要加以克服和纠正，就决不能搞权宜之计，而必须有长期的战略方针。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两点论，在未来至少上百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要实事求是地开展反对“左”的和右

的错误倾向的斗争。

第二，要坚持重点论。

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重点是反对“左”，这是必须明确的。首先，从我们党的历史看，右的错误主要有大革命后期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投降主义，但存在的时间都比较短，并带有局部性。相对来说，“左”的错误就时间长、影响大，造成的损失严重。比如，遵义会议前的八年，就连续三次发生“左”的错误，特别是第三次王明的“左”倾错误，损失了中央苏区，红军被迫长征，几乎葬送了中国的革命。全国解放后，从1957年开始，“反右派”、“反右倾”、“大跃进”，阶级斗争这根“弦”越绷越紧，“左”的浪潮越推越高，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个全局性灾难的产生。其次，从认识根源往往认为“左”是革命的，只是急了点；而右则是反动的。第三，从实际对待看，“左”的价值导向起着主导作用。如认为，即使是犯错误，“左”不过是方法问题，而右是立场问题；“左”是好心办错事，可以处理轻些，倒认为此人有魄力，今后有机会还可以提拔；但作为立场问题的右，轻则不革命，重则是反革命，这样处理起来，就像“文革”中一句语言：“把他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永远不得翻身！”正是由于上述的种种原因，就对“左”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感情色彩，即“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现在，虽然清除“左”的错误倾向已进行了多年，但作为一种传统的习惯势力，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一当社会生活遇到什么问题时，这种“左”的观念就习惯成自然地表现出来。回顾这1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历程，我们每前进一步，不是几乎

都同“左”的影响作过思想斗争吗？总结历史经验，邓小平反反复复、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左”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势力，人们的思想不容易改变。他在视察南方的重要讲话中，说得更加尖锐形象：“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①

学习“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个论述，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把握唯物辩证法是何等之准确！这个反错误倾向的指导方针，在理论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发展，在实践上对我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则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

第九章 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 增进全党的集中统一

民主集中制既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党和国家的根本的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自党成立开始，我们就一直坚持这个原则和制度。历史经验证明，民主集中制贯彻执行得好，我们的事业就能比较顺利地发展，我们党也就能得以巩固和发展；反之，我们的事业就会遭到挫折和失败，我们党必然会涣散，甚至会丧失战斗力。新中国成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个人崇拜的影响，民主集中制遭到严重的破坏，最后导致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灾难，把党和国家推到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吸取了这个历史教训，提出了必须进一步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同时，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对作为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的民主集中制的健全和完善也势必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可以这样说，如果民主集中制不健全，政治体制不改革，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不可能确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也是不可能实现的。邓小平根据世界民主潮流和中国国情，对如何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原则，为健全党内的政治生活，以及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民主集中制实行得好坏，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我们党选择了民主集中制作为根本的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这既是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也具有坚实的哲学基础和群众基础

1962年，邓小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民主集中制问题作了重要的阐述：“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也是我们传统的制度。坚持这个传统的制度，并且使它更加完善起来，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

命运的事情。”^①

民主集中制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列宁首先提出来的。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丰富和发展了列宁的论述，使之成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特别是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就进而把民主集中制写进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样，民主集中制就成为党和国家的一项根本制度。

我们党选择了民主集中制作为根本的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是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就决定了：第一，只有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才能健全党内生活。党内首先要求有民主，党员敢说话，说真话，说实话，能够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党组织才有活力。党内还必须有集中，就是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统一认识，统一行动。这样，在我们党内，才能形成一种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第二，只有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才能实施正确的领导。正确的领导来源于正确的决策，就是说，要实现决策民主化、科学化。这就要求集中党员群众的智慧，集中班子的集体智慧，从而纠正少数领导人个人说了算、独断专行等问题，选择最佳的方案，力求取得最好的效果。第三，只有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才能密切联系群众。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路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12页。

线，民主集中制是我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必由之路。没有民主，就必然脱离群众；没有集中，就不能带领群众前进。这是执政党之大忌。第四，只有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才能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民主集中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绝不是搞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制。所以说，没有民主和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上面说的是民主集中制的政治基础。除此之外，民主集中制还有哲学基础和群众基础。说哲学基础，是指民主集中制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民主集中制作为一个有机体，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没有广泛的民主，就没有正确的集中；同样，没有正确的集中，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所以，这两者是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不能用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片面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但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去看，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对民主集中制的贯彻可以而且应当有所侧重。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的：现在，执行民主集中制还有不少问题，“民主不够和集中不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就要求我们从各个单位的实际出发，哪方面不够就实事求是地解决哪方面的问题。说群众基础，是指民主集中制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运用。我们党是忠实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宗旨反映在群众路线上，是

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组织人民群众为自己谋利益。在这个过程中，还要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这正如邓小平指出的，不实行民主集中制，不但脱离人民群众，脱离党员群众，而且上级脱离下级，甚至在同级里也势必造成少数人或个人脱离多数、少数人或个人专断的局面。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什么时候民主集中制坚持得好，党就能够团结统一，党的事业就兴旺；反之，党的力量就遭到削弱，党的事业就遭受挫折

从我们党的历史看，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我们有成功的经验，但也有极其深刻的教训。党创立初期，由于对民主集中制这一原则的理解肤浅，也由于受家长制作风的影响，个别领导人说了算，就使党的建设走了不少弯路。直到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我们党才在实践中坚持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经过延安整风、党的七大召开，进一步从理论上加深对这个原则的理解，这就为夺取全国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全国解放以后，在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上，把民主集中制写进党章时，强调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从执政党建设的高度对民主集中制作了系统的科学的论述。他把坚持民主集中制作为执政党建设的一个重大课题。

但是，与此同时，一种与民主集中制背道而驰的现象，即

个人崇拜却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滋长和发展起来。正如邓小平指出的，1959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这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所谓“反右倾”，是指对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的一场争论，毛泽东同志认为农村工作部思想右了，批评他们是“从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出发”，把工作中的不同意见和正常的争论夸大为路线分歧和斗争，党内民主生活开始出现不正常的现象。以后，从1959年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彭德怀起，到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践踏，个人迷信、个人崇拜愈演愈烈，政治生活和党内生活出现数不清的甚至是荒唐的现象，如反对某个领导人的意见就是反党；党的书记俨然是家长，他的一票就可以否决整个班子的意见；党的主席成了政治局的上级，政治局讨论通过的问题，由主席圈阅方能生效；没有任何理由就剥夺了中央委员参加中央会议的权利；直至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可以不通过任何法定程序而被拘留、逮捕、迫害至死……。

经历了严重的历史曲折和巨大的挫折之后，我们党对于在执政条件下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了深刻的认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制定和完善有关制度和程序，特别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不断加强民主集中制的建设，不仅仅是把它作为一般任务和工作方法提出来，更重要的是把它作为党的建设的根本任务和重要目标来抓。这些年来，我国经济、政治、社会领域的全面进步，就充分说

明一个道理：民主集中制坚持得好，党的思想就统一，党的团结就牢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能够得到正确的贯彻执行，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国家就欣欣向荣。

二、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发挥 和调动全党的积极性

民主是集中的基础和前提，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党今后长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

坚持民主集中制，首先是要发扬民主。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就整个国家而言，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党内生活而言，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

邓小平为什么强调发扬民主是坚定不移的目标呢？这是总结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沉痛教训后提出来的。他说，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可以想象，在那种家长制盛行、对某个领导人提意见就是反党这种“万马齐喑”的党内生活中，能有生动活泼、心情舒畅的局面吗？能充分调动每个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吗？当然不可能。邓小平正是高瞻远瞩，看

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抓住特点，突出重点，从几个方面深刻地论述了实现这个“目标”对发挥和调动全党积极性的重大意义和作用。

首先，没有民主就没有解放思想。从我们党的历史看，一方面由于“左”的路线长期存在，发生了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十年全局性的错误，迫切需要进行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以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党处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面临着许多新矛盾、新问题，也迫切要去换脑筋。这样，解放思想就成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思想建设的一个重大课题。对此，邓小平提出，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政治生活上有了一条，我们的党员干部就不会思想僵化，从本本出发，当“收发站”、“传达室”，照抄照搬；就不会缩手缩脚，前怕狼后怕虎，不敢闯、不敢冒，而是敢于冲破“左”的思想桎梏，冲破落后的传统观念，冲破狭隘的主观偏见，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改革开放中迈出更大的开拓步伐。

其次，没有民主就没有正确的决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搞改革开放，必然会遇到许多新的矛盾、新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经济建设和处理政治社会领域的各种问题时，必须有科学的决策。决策，也可以说是一个集中的过程。这是一个决不可忽视的必要程序。如果我们离开了民主，不走群众路线，不尊重党员的民主权利，不把他们的意见和建

议集中起来，不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只靠个别领导人想当然、拍脑袋，就对重大问题轻率作出决定，能有好的效果吗？所以，我们应当把决策民主化作为发展党内民主的重要内容，建立健全领导、专家、群众相结合的决策机制，逐步完善民主决策制度。再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决策的正确与否，正是党的战斗力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拥有最广大的群众，而党内民主则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的集中而生动的体现。党的正确决策就是建立在这种深厚的群众基础上，体现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够调动千百万群众。这就是我们党战斗力之所在。

三是没有民主就不能适应执政的要求。我们党是执政党，改革开放，对执政党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要求虽然相当广泛，但集中到一点，就是能不能经受住权力的考验。对执政党的每一个干部来说，掌握了权力，可以为人民服务，也会用来谋私利。这里，同他的主观意识有很大的关系，但同客观条件也有很大关系。民主如果作为一种制度建设，加以建立和完善，就能把掌握各种权力的领导干部置于广大党员和群众的视野下，有效地制约权力，防止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邓小平曾经尖锐地指出过，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这就是说，执政党的最大危险是权力腐败，脱离群众。而我们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优良作风就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广大党员对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进行批评、监督，就能有效制约权力的腐败，保障他们掌好权，用好权，避免从“人民的公仆”到“人民的主人”的演变。

发扬党内民主，实现党内生活民主化，必须 尊重党员权利，使党员参与党内各项事务的权利 得到切实行使

发扬民主作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要实现党内生活民主化。那么，党内生活民主化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怎么样去实现呢？

党内生活民主化的核心，是尊重党员权利，使党员参与党内各项事务的权利得到切实的行使。其主要要求是：

一、凡有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包括涉及全局性重大问题的决策和决议，都必须在一定的组织中集体讨论通过。决议在提交讨论之前，要根据必要和可能，把方案拿到下级党组织和党员中广泛听取意见，然后通过正确的集中程序，形成统一的意见。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还要把方案拿到非党组织和群众中广泛征求意见，博采众议。同样，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时，各级党组织也必须广泛发动党内外群众积极提出意见和建议，出谋献策，在集中大家的经验和智慧的基础上，作出贯彻执行的具体措施。

二、党的领导机关要经常听取下级组织和党员群众的意见。凡应属由下级组织处理的问题，如无特殊情况，上级领导机关不要强行干预，要保证下级组织能够正常行使自己的职权，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从实际出发，因地因时制宜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的决议。当上级党组织

处理与下级党组织有关的重大问题时，在必要与可能的情况下，要征求下级组织的意见，同他们商量。上下级组织之间要互通情报，互相支持和互相监督。

三、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除它们派出的代表机关和在非党组织中的党组外，都由选举产生。选举要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人有了解候选人情况、要求改变候选人、不选任何一个候选人和另选他人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强迫选举人选举或不选举某个人。选举要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

四、尊重和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现在，中央已制定《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试行）》，要认真贯彻执行，切实保证党章规定的党员的各项权利，不受任何组织和个人所侵犯。要疏通党内民主渠道，拓宽党内民主渠道，使党员对党内事务有更多的了解，提高他们的参与意识。要贯彻“先党内，后党外”的原则，把党的方针、政策、指示、决议及时传达给下级党组织和党员，重要事情应该在党内先讨论，让党员早知道。任何侵犯党员权利的行为，都应当受到追究；情节严重的，必须受到党纪处分，等等。

发展党内民主以实现党的纲领为目的，要以引导、保护、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积极性为出发点

发展党内民主，是多层次、多方面、多途径的。因此，要

明确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发展党内民主以实现党的纲领为目的。它绝不是一种单纯的手段，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一种装饰品，而是我们党和国家根本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要提高到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高度来认识。二是要以引导、保护、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积极性为出发点。就是说要鼓励党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讲真话，能够在党的会议和党的报刊上参加政策问题的讨论，敢于对领导干部进行评议、监督。为此，就要消除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摆正领导个人同党组织、同党员、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就要消除不让人家讲话，听不得不同意见的“一言堂”，坚持重大问题要经过讨论，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就要消除把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遇到大事一个人说了算的个人专断，实行集体领导，保证领导人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民主监督之下；就要消除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的“家长制”作风，摆正上下级之间的关系，虚心听取和善于集中党员和群众的意见。这样经过不懈的努力，我们就可以达到邓小平提出的要求：“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①

发展党内民主必然推进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是最广泛的人民民主，其实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长远目标，就是建立高度的民主政治，特别是要努力实现基层民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6页。

主生活的制度化，以保障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我们党是执政党，党内生活是否民主化影响重大。因此，只要我们努力，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就必定能够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有一个大的发展。

三、加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 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

民主集中制的集中，是全党意志、智慧的凝聚和行动的一致

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民主集中制的民主，就是党员和党组织的意愿、主张的充分表达和积极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集中，则是全党意志、智慧的凝聚和行动的一致。

那末，怎样理解集中呢？

集中，不是一言堂的集中，不是家长制的集中，更不是个人专断的集中，而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民主和集中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民主就没有正确的集中。没有集中，就不能形成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形成全党的统一意志。民

主集中制的集中，就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使之成为多数人的共识，形成正确的决策，并付诸实施。

邓小平在这方面的论述是非常深刻的。他指出，我们强调加强集中统一和反对分散主义，更应该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不应该误解，以为强调集中统一，就可以抛弃民主集中制的那个民主。为了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就更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民主这一方面。有了这一方面，集中就有了基础，就可以真正集中统一起来。他又认为，一个党不集中不行，如果没有中央的和各级党委的集中领导，这个党就没有战斗力。这种集中，如果没有高度的民主作基础，集中也是假的。全党提倡民主，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就能真正把全党的意志集中起来，真正做到万众一心。

确实，一个党不集中不行。如果只要民主，不要集中，党就会成为一盘散沙，不可能有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行动上的高度一致。在当前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从计划经济体制往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中，强调集中就显得特别重要。首先，没有集中，就不能正确处理各种利益的关系。我们知道，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单一的经济模式，出现了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分配方式，这样，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地区利益和国家利益就必然发生矛盾和冲突。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对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地区利益都是看得较清楚的，因而都在努力维护这些利益；相对来说，如果不加强教育，对国家利益就会看不大清楚，甚至还会用各种手段去损害国家利益以利集体利益，损害全局利益以利局部利益，损害长远利益以利眼前利益，损害集体利益以利个人利益。在这种情

况下，只有强调集中，强调国家和人民根本的长远的利益为最高利益，才能正确处理上述各种利益关系，使经济建设顺利进行。其次，没有集中，就不能顺利地推进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特别是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党和政府对经济的管理要向间接的宏观调控过渡，在这一过程中，如何用好经济手段、行政手段，使经济管理有序地进行，逐步把原来不完善、不配套的制度建设好，把原来不健全、不适应的法律建设好，这就一定要强调按改革的目标集中，反对分散主义，消除各种阻力，团结一致，一心一意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第三，没有集中，就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统一全党思想。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封建残余思想尚未肃清；而对外开放，腐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又不可避免地渗透进来。如果不讲集中，不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放任社会上某些人去搞什么“大民主”、“公开化”之类的东西，让各种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自由泛滥，那就不仅会瓦解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还会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前苏联这方面的教训还不够深刻么？

铁的纪律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优势，强调集中，首先要强调党的纪律

党必须有严格的纪律。邓小平对党的纪律的重要性有许多精辟论述的。比如他说，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共产党要有纪律；我们过去革命，就是靠纪律，而且是铁的

纪律。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最好的风气就是这个。他特别强调，铁的纪律是我们党的真正优势。确实，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是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党的真正优势。从邓小平的论述和党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共同遵守的政治生活准则和言论行动的规范。我们党之所以坚强有力，能够战胜强大的敌人和各种艰难险阻，并不断取得胜利，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保证党的路线得以贯彻的铁的纪律。相反，如果像“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样，党的纪律废弛，不仅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而且对严肃的纪律随意践踏，我们党还有什么优势可言？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如果我们党的纪律涣散，党员可以自行其是，对党的方针政策合口味的就执行，不合口味的就放到一边去，党规定的任务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那我们党还有什么统一的意志可言？还有什么战斗力？四个现代化岂不成为泡影。所以，我们党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有了理想，还要有纪律才能实现。

党有了严格的纪律，党员就必须自觉接受党的纪律的约束。现在一些党组织纪律松弛，组织涣散，战斗力不强，是党员缺乏遵守和维护纪律的自觉性。要强化他们的党纪观念，就要帮助他们提高认识，正确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的关系。这个关系如果孤立来看，好像是矛盾的，彼消此长的。但如果从贯彻民主集

中制的要求去看，这不仅不矛盾，而是一致的。因为发扬党内民主，就是要把党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把那些分散的经验、智慧集中起来，形成共识；而一旦作出决策后，纪律就成为执行决策的根本保证。对于一个党员来说，遵守纪律的自觉性越高，他就越能够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当前，只有那些曲解主动性、创造性的人（如把损害国家和人民长远利益以谋取小团体利益或个人私利看成是主动性、创造性），才会害怕纪律的约束。二是纪律和自由的关系。搞分散主义、自由主义的人所理解的自由，同我们所说的党内自由，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前者说的自由，就是所谓绝对的自由，即毫无限制，毫无约束，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尤其是在目前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他们利用法规制度不健全，以自由为名，钻政策的空子，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而一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则以自由为幌子，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特别是否定党的领导。这些，都是错误的。纪律和自由的关系，实质就是集中和民主的关系，我们不能片面地强调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而是要辩证地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明确任何自由都是相对的，绝没有超阶级的、不受任何约束的所谓“自由”。

关于加强党的纪律问题，邓小平特别强调要实行“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针对那些凌驾于组织之上和超越党纪国法之上的特权，他尖锐地指出，每个党员都要严格地遵守党章和国家的法律，遵守共产主义道德，一切党员，不管他们的功劳和职位如何，都没有例外；谁也不能违

反党章党纪，不管谁违反，都要受到纪律处分，也不许任何人干扰党纪的执行，不许任何违反党纪的人逍遥于纪律制裁之外。从这里，我们可以充分看到邓小平对维护党的纪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的高度重视，说明党的纪律绝不可因人而异，否则就会破坏党的团结统一，就会削弱党的战斗力。要这样做，关键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遵守党的纪律。常言道：“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如果我们党的领导干部都能够事事、处处以身作则，自觉接受监督，模范地执行党的纪律，那就能够起到表率 and 榜样的作用，“其身正，不令而行”，那种纪律松弛、组织涣散的现象就能够得到及时纠正。

“四个服从”原则最重要的是全党服从中央， 强调集中，最重要的是维护中央的权威

党章规定，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这“四个服从”，最重要的是全党服从中央。我们说维护中央的权威，就是要保证中央的政令畅通，决定了的事情各方面都要认真去办，在党的基本路线和总方针、总政策、总目标以及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上，全党必须与中央保持一致。

维护中央的权威，是我们党成为一个统一的战斗整体的首要条件。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根据

这个原则，全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都要坚决服从和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对于有关全国性的政策问题，任何一个地方组织、任何一个部门组织、任何一个党员都无权公开发表与中央不同的主张，更不能作出决定。这样，才能保证全党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高度一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也是一项无比艰巨的事业，如果离开党中央的权威领导，任何组织、任何个人都根本没有办法进行。其次，维护中央的权威，是改革开放的客观要求。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搞活经济。但这离不开国家的有效的宏观调控。搞市场经济绝不是想搞什么就搞什么，不受政策和法规的约束。市场经济也是法制经济，既不能在经济上钻体制的空子，钻政策的空子，以损害国家利益来谋取个人私利；也不能搞分散主义，各自为政，以牺牲国家利益来谋取地方利益。对这两种情况，邓小平都曾尖锐批评过，指出，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的，各行其是，这怎么行呢？不能搞“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不能搞违背中央政策的“对策”。因而他特别强调中央要有权威；不能否定这个权威，该集中的要集中；有了这个权威，困难时也能做大事。

维护中央的权威，就要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里，必须摆正两方面的关系：一方面，地方要牢固树立全局观念，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重大问题要请示报告，保证全国政令统一。另一方面，中央只是在大的方面、在方

向问题上制定路线政策，如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 and 战略布局上、在改革开放的部署上、在关系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大政方针上作出决策，而不是具体干预地方的事情，相反，却是下放权力，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换句话说，强调维护中央的权威，决不是把应该赋予地方的权力收上来，而是要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职责和权限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邓小平在这方面总结的历史经验值得我们很好地深思：“我们历史上多次过分强调党的集中统一，过分强调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很少强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很少反对个人过分集权。过去中央和地方之间，分过几次权，但每次都没有涉及到党同政府、经济组织、群众团体等等之间如何划分职权范围的问题。我们不是说不要强调党的集中统一，不是说任何情况下强调集中统一都不对，也不是说不要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问题都在于‘过分’。”^①这段充满辩证思维的话，可以说是指导我们处理好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最好思路。

总之，邓小平认为民主与集中，是互相联系，又互相制约的。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一方面，要有充分的民主，要坚决纠正“一言堂”、个人说了算、集体做了决定少数人不执行等毛病；另一方面，要坚决维护集中。在目前情况下，尤其需要重申强调个人服从组织。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统一；没有集中统一，党就没有战斗力。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而这个集中，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9页。

总是要在民主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地正确地实现。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集中，也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第十章 贯彻从严治党方针，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

邓小平执政党的建设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坚持从严治党，坚决惩治腐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他反复告诫全党：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我们不仅要把经济搞上去，而且要把人民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素质和社会秩序、社会风气搞好，特别是要把执政党的党风和廉政建设搞好；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于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①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走出一条适合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新路子。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页。

一、党风廉政建设关系到 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

**执政党的作风直接关系到党的性质和面貌，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要求我们更要
搞好党风廉政建设，经受住双重考验**

党的作风是党的性质的集中反映，同时对党的性质又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和反作用。我们党发展的历史证明，要保持党的先进性，必须加强党风建设。党是在同自己内部各种不良作风的斗争中发展、前进的，特别是在执政后党风建设被置于更加重要的地位。

早在 60 年代邓小平就明确提出：执政以后的党，如果放弃党的优良作风，党存在着变质的现实可能性，必须高度警惕由于党风不正而引起党的变质。尤其是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对党的思想建设、制度建设等工作的要求更高了，受消极思想侵蚀的危险性增大了，党面临着双重的严峻考验。因为“在改革过程中，难免带来某些消极的东西”，^①“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东西”，^② 不对付它，开放、搞活就会走到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42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39 页。

邪路上去。针对近几年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消极腐败现象滋长蔓延，还有一些党员干部不像人民公仆而做官当老爷，党群关系中出现的新问题，邓小平非常严肃地指出：“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①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经济搞不好会垮台；因党风不正引发腐败，严重脱离群众，也会垮台。因此，党风廉政建设的关系到我们党能否经得起改革开放考验的大问题，也是新时期党的建设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腐败现象令人担忧，主要原因是体制上存在弊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体制并存

邓小平认为，对党风的估价必须实事求是，不能以偏概全。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党员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也不可否认，从目前党组织的状况看，在党风廉政建设上确实存在着令人担忧的问题，突出的是腐败现象已经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为什么腐败现象会滋长蔓延？这固然有许多客观原因，如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给党风廉政建设带来了不少新问题等，但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邓小平的一贯思想是，前进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4页。

中出现的问题在所难免，关键在于党对出现的问题要保持正确的态度，即在出现矛盾和问题的时候，党首先应当从自身找原因。事实上，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①问题也往往主要出在党内。这是因为我们党和国家的行政机制，即政治体制存在着某些弊端，而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这一外部条件通过我们内部的弊端渗透进来，诱发出诸多腐败现象。可以说，主要原因是改革不够彻底，两种体制并存。一方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历史的必然，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现行的政治体制基本上是适应计划经济而不是适应市场经济的，加之社会转型期的监督制约机制软弱乏力，市场经济发育不健全，两种体制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因而带来了在党风方面新的令人担忧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权力直接进入市场。由于两种体制并存，容易产生权力的蜕变，有的人会凭借手中的权力去“腐化”，去搞权钱交易。如买卖“批文”、“批条”；利用职权索贿受贿；党政机关办公司，把国家拨的经费拿去做生意，官商不分、化公为私，等等。这种在党内政治生活和行政行为的权力腐败，是最直接、最普遍的腐败行为，导致这几年经济犯罪案件越来越大，党政干部和执法人员犯罪的比率也日益增大。二是在两种体制并存的状态下，政策法律制度不完善不配套、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等，产生了不少漏洞，使腐败分子有机可乘，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0页。

给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滋生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三是处于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的市场经济，由于发育不充分，仍与各种经济成分的所有制结合在一起，各种利益主体处在不同的竞争地位上，一方面容易诱发产生金钱拜物教和商品拜物教，腐蚀一些党员干部的灵魂，有的为获取金钱不惜铤而走险；一方面出现各种不规则的竞争，导致某些不正当的竞争行为发生，为腐败现象的滋生提供了温床。四是由于新体制的成长使旧体制不合理的弊端日益显现，但在转换过程中，现阶段旧体制暂时还不可置换，这就难免使党和政府在一定时期内陷于“两难选择”的尴尬境地。此外，从意识形态上讲，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也会受到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冲击与侵蚀，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也同样会增大，使一些人道德水准下降，缺乏精神支柱，成为产生腐败的一种思想基础。邓小平指出，“所有这些，都是党内的危险因素，腐败因素，是党内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的严重表现”。^① 因此，要加强党的建设，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抓好党风廉政建设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必须持之以恒地进行下去。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惩治腐败，促进党风政风的根本好转，“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②

因而可以这样说，在新的历史时期，只要我们党的作风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03页。

建设搞好了，全国人民就会跟着学。党外有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人，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党就能一往无前地领导、团结、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克服和纠正社会上的各种不正之风，在全社会树立起良好的风气，从而赢得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二、端正党风先要从领导干部做起

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是党的事业成败的决定因素，也是党风建设成败的重要因素，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对实现党风好转具有决定意义

端正党风要从高级干部做起、从领导做起，是邓小平从从严治党的一贯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对党的领导干部的作风更给予高度重视，多次指出：“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①过去战争年代，是靠干部以身作则带出了党和军队的好作风；在新的历史时期，搞好党风，端正党风，同样要靠党的干部以身作则，特别是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7页。

靠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领导干部不做出好样子，就带不出部队的好风气，就出不了战斗力”。^①一个领导干部在各方面率先垂范，严格要求自己，就是下属的一面旗帜，就是无声的命令，就可以对群众产生巨大的感召力、影响力和说服力。与此相反，如果要求群众做到的，领导干部却办不到，就会上梁不正下梁歪，就会一风吹，一切照旧，把社会风气也带坏。党的领导干部能做到勤政为民、廉洁自律，人民群众才能对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树立起信心；如果以权谋私、贪污贿赂，人民群众也会把这笔帐记在我们党的身上。因此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对实现党风的好转具有决定意义。邓小平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义不容辞地“把我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作风很好地恢复起来，坚持下去”，^②既要以身作则、廉洁奉公，又要无私无畏、敢抓敢管，特别强调秉公办事，手中有权“不要‘近水楼台先得月’……要同假公济私、开后门的现象作斗争”。^③

领导干部在端正党风上的表率作用是多方面的，关键是要率先纠正不正之风，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尤其是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

首先，要抓紧领导班子作风的整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4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0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5页。

会以来，邓小平多次提出要整顿好领导班子，“把作风整顿好。各级领导人的作风要转变，要解决官僚主义的问题、不深入实际的问题”，^①要克服形式主义，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还必须从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抓起，对腐败案件要从党员干部抓起，特别领导干部，要雷厉风行地抓，要公布于众，要按法律办事。尤其是对高级干部中的违法乱纪问题要从严处理，“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抓住典型”。^②坚持做到在党纪国法面前人人平等，使之成为全党为之肃然、全民为之振奋的端正党风的关键性措施。

其次，要带头增强党性修养，提高拒腐防变能力。邓小平认为，从世界观和党性修养入手抓党风问题，是党成功的经验。领导干部要作出表率。首先是思想作风要有高标准，增强党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精神状态上有显著的进步，为人民服务而不谋私利的觉悟有显著的提高。这里有个思想觉悟锻炼和修养的过程。只有真正从思想上入党，牢固树立党的领导干部的公仆意识，保持清正廉洁的共产党人的本质和纯洁性，才能自觉拒腐防变，有效地抵制以权谋私等消极腐败现象的侵蚀。领导干部的反腐保廉的自觉性增强了，端正党风和反腐败斗争也就有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三，要带头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艰苦奋斗，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作风，也是党的领导干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3页。

^② 《邓小平论党的建设》第242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1月第1版。

部必须具备的政治素质。我们党正是靠艰苦奋斗不断发展起来的。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新的事业，一无现成的本本可搬，二无现成的模式可套，在改革和发展中不可能一帆风顺，会遇到很多艰难险阻，也难免有这样那样的坎坎坷坷，需要我们保持开拓进取、永不停息的拼搏精神，磨炼不畏艰难、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发扬坚韧不拔、励精图治的奋斗作风。邓小平对经济取得新的发展、人民生活有了初步改善时出现的违反艰苦奋斗精神的种种现象十分担忧，反复指出新的历史时期仍然必须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明确地把艰苦奋斗作为一项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端正党风、保证我们事业立于不败之地的战略措施。如果认为党内有人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丢掉艰苦奋斗传统无关紧要，那是十分危险的，强调艰苦奋斗“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①这就是说，领导干部带头艰苦创业，不仅能用自已的模范行动影响和带动周围的人们，还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在端正党风上作表率。改革开放以来，少数党员干部就是因为丢掉了这一优良作风，经受不住形形色色的名与利的诱惑，贪图享受，以权谋私，最后陷进犯罪的泥坑。这也从反面告诉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只有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才能有效地抵制铺张浪费之风和奢靡腐朽生活方式的侵蚀，廉政勤政，带领人民群众去实现振兴中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6页。

三、党风廉政建设一靠教育，二靠法制

我们党在执政 46 年的实践中，党风廉政建设上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深刻地总结了这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从新的历史条件出发，指出了新时期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一靠教育，二靠法制”的治本之策。一方面，通过教育增强党员的党性觉悟和纪律观念，从思想建设这个根本上来治理党风；另一方面，加强法制建设，制定和完善党纪党规，建立健全防范以权谋私等行为的监督制约机制，开辟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新途径。

端正党风的根本问题是抓好思想教育，着力提高党员队伍的政治素质

邓小平认为，端正党风的“根本问题是教育人”^①，通过思想教育，增强党性，真正提高思想觉悟，从根本上保证党风的好转。要从世界观和党性修养入手，通过思想建设来治理党风。党风中存在和发生的各种问题，实质上是党员队伍的思想认识、世界观的问题。这些年部分党员干部腐败蜕变，

^① 《邓小平论党的建设》，第 247 页。

主要是由于放松或拒绝世界观的改造,从思想上蜕变开始的。因而,邓小平在认真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思想作风和纪律状况时明确指出:我们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不解决党员队伍的思想觉悟问题,党风廉政建设就难以标本兼治。我们党历来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党的建设的首位,作为提高自身凝聚力、战斗力的一条十分重要的经验,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坚持拒腐防变的一项根本性措施。如何抓好教育?邓小平结合新时期的实际作了许多富有新意的论述,强调指出:

要学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树立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培养坚强的党性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使党风廉政建设有坚实的思想基础和可靠的保证。

要抓好党内法规教育。党内法规,是党组织的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的规范,是党章中规定的党的纪律的具体化和执行纪律的量纪标准,也是党的各级组织、纪检机关和全体党员同违纪现象作斗争的有力武器。邓小平指出,严格的党纪是良好党风的必要保证。实践证明,认真学习贯彻党内法规,加强教育的力度和深度,不仅能使广大党员了解和懂得党规党纪的具体规定,增强党纪观念,提高遵纪守法的自觉性,而且能切实解决一些地方和单位存在的党不管党、纪律松弛、有法不依、执纪不严的问题,是搞好拒腐防变的有效形式。

要教育党员抵制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自觉保持清醒的头脑。目前党内不良风气的根源与历史上一样,都是

非无产阶级思想，尤其是封建残余思想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产物。因此，邓小平提出，新时期要继续批判和反对封建主义在党内外思想政治方面的种种残余思想……；要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批判和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迈出跨世纪的新步伐。

法制，是国家对社会发展实施管理的重要手段，同样也是党风廉政建设的治本之策。靠法制，就是把反腐败和党风廉政建设纳入制度化、法律化的轨道

邓小平指出，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属于法律范围的问题，“要用法制来解决”；^①对一些地方出现的丑恶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对它们的治理“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②必须尽快建立和完善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党风廉政制度，有一套完整的法规制度来保障、约束和规范。

这里，最主要的是坚持民主集中制，规范党内的权力结构、党的领导工作和党员行为，发扬党内民主，实行民主监督。邓小平一贯认为，扩大党内民主，接受群众监督，是搞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页。

好执政党作风的必要条件。他指出“宪法上规定了党的领导，党要领导好，就要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接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如果我们不接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①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更要重视发扬民主，主动接受民主监督。首先，必须切实保障党员和人民应有的民主权利。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的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②其次，必须实现党内生活正常化，在党内形成开展批评的良好风气。党委内部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有这种风气。不做思想工作，不搞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行。邓小平希望“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经常开展。党内不论什么人，不论职务高低，都要能接受批评和自我批评”。^③再次，要赋予群众实实在在的民主监督权利，充分发挥党内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和人大、政协、群众团体等民主监督的作用。特别要加强和健全党内监督，完善监督网络，突出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监督重点，健全监督制度，拓宽监督渠道，“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70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4页。

③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25页。

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①同时，严肃查处打击报复和诬告陷害的违纪者，保障人民群众实施民主监督的权利落到实处。

靠法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以制度建设和体制改革保证党风的好转。邓小平从现阶段党的建设的客观需要出发，提出加强制度建设，是搞好党风建设的根本性措施。他认为，抓党风建设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②党内过去的有些制度，不利于克服不正之风，妨碍民主和法制的实行，“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制度”，^③进行体制和制度改革。这些论述，既是我们党制度建设的经验总结，又为现阶段党风廉政建设指出了一条新路子。

依靠法制的关键环节，一是要针对旧体制、旧机制的弊端，通过改革，建立起能够有效地抑制消极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的新机制、新体制。同时，要针对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出现的带普遍性的新问题，抓紧研究制定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规和制度，明确经济活动中的政策界限，既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又使正确执纪、惩治腐败有可靠的依据。二是要抓廉政制度的完善配套。提倡什么、发扬什么、反对什么、禁止什么、廉政的标准是什么等等，都必须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并采取多种措施维护法制至高无上的尊严，保证执法人员不致受到任何领导人随心所欲的摆布，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8页。

消除执法人员“知法犯法”的隐患，确保法制不致受到任何形式的破坏。尤其要从制度上防范和消除以权谋私的行为。在进行体制改革的同时，认真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员干部应遵循的具体行为规范，建立健全权力优化、权力制衡、权力督察机制，包括：把好“授权关”，把能否清正廉洁、勤政为民作为选干授权的重要条件，对心术不正、作风不实、行为不廉的人，即使有才也决不重用，从制度上保证权力优化；规定权力实施的程序和标准、权力行使各个环节上的互相制衡（如管查分离、管理交叉、岗位轮换）、政务“三公开”（公开办事制度、公开办事程序、公开办事结果）、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和离任审计制度、回避和地域交流制度等等。还要健全和完善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制度、考核考察制度、定期征求党内外群众意见的制度、民主评议制度，以及党内监督工作的行为规范和监督活动各个环节的工作程序，以硬性约束和制度规范来充当党风廉政建设的可靠护卫。

四、坚持从严治党，坚决惩治腐败分子

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必须从严治党，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高层的腐败

我们党的历史证明，反对腐败是党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

保证。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认为从严治党必须惩治腐败，并把它提高到关系我们的战略目标能否实现、党和国家成败的战略高度来认识。他告诫全党：对我们来说，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①只有惩治腐败，拿事实给人民看，人民的心里才会平静，才能保证改革开放在安定团结的环境中继续顺利进行；只有惩治腐败，才能取信于民，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保证改革开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发展；只有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高层的腐败现象，才能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促进党风廉政建设的深化发展。

为什么把反腐败提到这样的高度？邓小平明确指出，这些年虽然做了大量工作，但我们的一些同志埋头于搞具体事务，对政治动态不关心，对思想工作不重视，对腐败现象警惕不足，纠正的措施也不得力，致使党和政府内少数人利用职权，贪污受贿，投机倒把，出售机密，中饱私囊；少数干部做官当老爷，横行霸道，侵占群众利益；一些干部讲排场、图享乐，搞特殊化；还有少数人高高在上，推诿拖拉，不负责任，不办实事，弄虚作假，搞形式主义，误国误民，等等。总之腐败现象“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②而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有失人心。他在同有关中央领导同志的谈话中强调：这个教训一定要记取。党必须痛下决心，排除阻力，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7页。

惩治腐败，取信于民。这个关一定要过好。

**惩治腐败，要一抓到底，决不手软；要坚持
长期性与阶段性的统一，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

必须严肃查处各类腐败案件。这是惩治腐败的中心环节，要重点查处违背党的基本路线、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抵制和对抗改革开放政策、干扰阻碍重大改革措施实施的案件；查处贪污盗窃、索贿受贿、严重以权谋私、严重官僚主义失职和渎职案件；查处奢侈浪费、挥霍国家资财案件；查处道德败坏、腐化堕落案件；查处严重组织纪律涣散和内外不分、泄漏和出卖机密，以及严重的行业不正之风等案件，严明党的纪律，坚决清除腐败分子。对揭露出来的大案要案，不管涉及哪一级干部，都要查个水落石出，按党纪国法惩处，该杀头的就杀头，该判刑的就判刑，谁搞官官相护、包庇姑息，也一抓到底，严惩不贷。

必须狠抓官场，加大反腐败的力度和深度。人民最痛恨的是高层领导干部的腐败。邓小平指出，惩治腐败问题长期搞不通，就是因为我们的党的高级干部或他们的家庭陷进去的比较多；惩治腐败问题讲了多少次，讲了好多年，下不去手，成效不大，原因就在党内，在高层。党能否过好这一关，关键在于能否首先纠正党的各级领导，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当中的各种作风问题和腐败案件。对高级干部中的任何违法乱纪问题都要从严查处。因为“这些人犯罪危害大，抓了、处

理了，效果也大”，^①表明我们下决心克服一切阻力从严治党。要加大查处领导机关干部，以及经济管理、执法监督部门的工作人员的严重以权谋私、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等问题的力度，从快、从严、从重。透明度要高，处理不能迟，“真正抓紧实干，不能手软”。^②对已发现的腐败案件，尤其是领导机关干部的重大案件，迟迟不查不办的，要追究主要领导的责任；对说情的，要批评教育；对袒护包庇违法犯罪行为、干扰正常查处工作的，要绳之以纪、绳之以法；对侵犯党员民主权利、压制检举揭发、搞打击报复，或者搞诬告陷害的人和事，要认真进行查处，以赢得民心，稳定形势，提高人民群众反腐败的信心，把反腐败斗争不断引向深入。

必须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从根本上铲除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赖以生存的土壤。历史的经验早已告诉我们，在短期内根除腐败现象是不客观的，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也是不切实际的，惩治腐败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一定要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惩治腐败分子不仅要严厉，而且要长期坚持，贯穿整个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即“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端正党风的工作就得干多久，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就得干多久，……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开放、搞活政策的正确执行”。^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清醒地认识到：全国各族人民的眼睛

① 《邓小平论党的建设》，第24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2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4页。

盯着我们，看我们能不能拿出惩治腐败的实际行动来。必须在近期办几件使党心民心为之振奋的事情。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制定防止和惩治腐败的制度，使党风有明显的好转，恢复和加强党和群众的密切联系。因此，惩治腐败的基本方针，必须是坚持长期性与阶段性的统一，在某个时期加大斗争力度，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同时，着力深化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从严治党、惩治腐败走上法律化、制度化轨道，从根本上铲除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赖以生存的土壤，取得反腐败斗争的最后胜利。

第十一章 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个重要建党原则，也是我们党 70 多年来始终坚持的一个优良传统。邓小平历来重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教育党的干部充分认识党的基层组织地位、作用，把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作为新时期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突出环节抓紧抓好。在新的形势下，党的基层组织遇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我们要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必须以改革的精神切实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高度重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在解决新问题中开拓前进，不断迈上新台阶，把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成为团结带领群众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战斗堡垒。

一、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 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和我们党长期斗争实践的经验，党的基层组织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担负着直接联系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团结群众，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到基层的重要责任，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是有组织的整体，基层组织是党的组织基础，作为执政党在新形势下尤其要重视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基层组织是党的组织体系的基础。我们党是根据党的纲领和党章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是由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互相连接所形成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织体系。历史证明，党所以能够成为革命和建设的领导核心，所以具有战无不胜的伟大力量，不仅在于党集合了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而且还在于这些分子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有机的战斗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基层组织是基本细胞，党就是通过成千上万个基层组织把广大党员组织起来，形成了成千上万个战斗堡垒。没有基层组织，党就成了空中楼阁。同时，党对广大党员的管理、教育和监督，新党

员的培养与发展，也都要依靠党的基层组织来进行。只有党的基层组织坚强健全，整个党组织才能生机勃勃，才能有强大的战斗力。邓小平在党的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就对我们党执政后的基层组织建设作了详细论述，指出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人民解放军连队和其他基层单位，凡是有正式党员的，都应当成立党的基层组织；要求根据党员数量分别建立基层党委、党总支和党支部三种类型的基层党组织。如果没有党委、总支和支部把广大党员组织在各个党的基层组织中，党就无法领导这些党员，无法监察、督促党员履行应尽的义务，党就会变成一盘散沙，党的战斗力就会大大削弱。

因此，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对执政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把基层组织建设好，我们党才能经受住执政的考验，特别是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考验。几十年来，正是由于充分发挥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我们党的领导才有了坚实的基础。在新形势下我们必须从巩固和加强党的执政地位这个战略高度来重视和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社会基层单位的政治核心。基层组织是否坚强有力，直接关系到党的领导能否得以实现，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否顺利建立

基层党组织是社会基层单位的政治核心。在我们国家，为

了组织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建立了各种类型的生产、工作等基层单位，每个公民都在一定单位中工作和生活，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都要通过这些基层单位去贯彻落实。而“党是领导一切的核心”，^①任何社会基层组织都要服从于党的政治领导。党的基层组织处于生产、工作和科研的第一线，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最终要依靠它动员、组织广大党员和群众来贯彻执行。这就是说，党的基层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是党的领导在社会基层单位中的具体体现。基层党组织建设得好，作用发挥得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就有了可靠的保证。反之，如果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那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就会落空，党的领导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当前，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重要时期。环境虽然变了，但是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没有变，党的基层组织更要发挥社会基层单位的政治核心作用，必须“树立和加强各级党委的领导核心，特别是县以下和企业党委的领导核心”。^②基层党组织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直接组织者，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开创性的事业，必须依靠基层党组织团结和带领人民群众来实现。同时，新旧体制的转换和过渡，是一场涉及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重大变革，特别是深化改革的各项措施出台，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有的还会使某些人的利益暂时受到影响，从而产生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基层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66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19页。

党组织处在第一线，人民内部矛盾又多数产生在基层，基层党组织对化解这些矛盾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也处于最有利的地位，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只有真正把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党才能有坚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维护社会稳定，顺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有了可靠的组织保证。

基层组织是党联系广大群众的基本纽带，能否发挥作用，直接影响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影响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

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是中国共产党的优势、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邓小平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党的优势不仅在于政权中的适当数量，主要在于群众的拥护。”^①因为党的基层组织是“党联系广大群众的基本纽带”，^②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直接和人民群众打交道，是人民群众认识、了解党的“窗口”，也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了解人民群众愿望、倾听群众呼声的重要渠道。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党是依靠全体党员和全党的各个组织，来联系广大的人民群众的。为了从人民群众中收集他们的意见和经验，为了向人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把它变为人民群众自己的主张，并且组织人民群众加以执行，一般地都必须经过党员的努力，经过党的下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9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53页。

级组织的努力”。^①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人民群众往往是从基层党组织的工作和周围党员的表现来评价我们的党，以决定自己对党的态度和感情的。今天，我们党要领导人民夺取现代化事业的胜利，必须赢得人民的真心拥护和支持，这就不仅要求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最大限度地代表人民的利益，为群众带来切实的利益，更要求我们的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勤勤恳恳、公正廉明地为人民服务，关心群众疾苦，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这些要求，哪一项也离不开党的基层组织。因此，无论是宣传党的主张，还是倾听群众的呼声、团结带领群众实现党的任务和奋斗目标；无论是教育督促党员干部自觉地为人民群众服务，还是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减少和防止各种违法乱纪、以权谋私等现象的发生，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都离不开基层党组织的建设。

二、用改革的精神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切实改进基层党组织的活动内容和工作方式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各类基层党组织团结带领群众开拓创新，艰苦奋斗，创造了新的业绩，取得了不少成功的经验。与此同时，基层党组织建设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主要是随着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利益关系的调整 and 经营形式的多样化，基层党组织的工作如何加强和改进；在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25页。

新建立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中如何从实际出发建立党的组织并有效地开展活动，特别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企业党组织如何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大批劳动力在产业间转移和地区间流动，如何采取有效措施管理和教育好流动中的党员，发挥他们的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共产党员如何正确处理按价值规律办事与坚持党性原则的关系，坚持党的宗旨，保持工人阶级先锋战士的本色等。尤其是目前还有一部分党的基层组织软弱涣散，有的甚至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有些基层干部作风不正，脱离群众，一些党员不起模范作用等等。这就要求我们高度重视，运用已有的成功经验，用改革的精神切实加强和改进基层党组织的建设，特别要改进其活动内容和工作方式。一方面，要大力提倡调查研究，摸清新时期基层党建工作存在的问题和症结，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办法，不断总结经验，摸索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的新路子；另一方面，也应不断改进党组织的自身建设，把继承传统和改革创新结合起来，及时调整党组织设置，改进工作方式和活动方式，注重实际效果，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使党的基层组织更好地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要求。

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体制要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用改革的精神加强和改进基层党组织建设，必须大胆探索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基层党建新机制

邓小平一贯重视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1950年就指

出：“严格党的支部生活极端重要，没有支部生活就没有战斗力。”^① 1979年在谈到调整、安排各级领导班子时，又特意提到“包括党支部”。^② 以后针对基层党组织领导体制变化的情况，又多次提到加强和改善的问题，指出：“关于改善党的领导，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比如，我们历来说，工厂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这样是不是有利于工厂和大学的工作？能不能体现党的领导作用？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可能损害党的领导。”^③ 面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新任务，就得大胆探索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基层党建新机制。

一是建立新的基层党组织管理机制。现在不少基层党组织陷于繁忙的日常行政事务中，党组织本身的正常管理活动薄弱，出现了党不管党的现象。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要求基层党组织建立起新的组织管理体制。从内容上说，基层党组织首先要牢固树立“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观念，坚持一手抓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一手抓自身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克服“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带领群众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在群众中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其次是抓好班子建设，提高战斗力。邓小平指出：“解决地方问题，包括企业单位的问题，就是首先解决领导班子。”^④ 领导班子的素质如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60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22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0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页。

何，直接影响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和战斗力。基层党组织所处的地位和作用，要求它的领导班子要有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要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和组织能力，要具备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品质和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与专业知识。解决的办法，“主要是配备好一、二把手”。^①选拔要坚持三条标准，“一是坚决拥护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二是大公无私，严守法纪，坚持党性，根绝派性；三是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心，有胜任工作的业务能力。”^②对那些思想作风严重不纯，群众意见大，或能力差、不适应继续留任的人要下决心调整出去。同时，坚持精干、高效的原则，设置党的工作机构，配置好工作人员。在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中，精简机构和减少非生产性人员，应注意保留必要的党务政工机构和有关人员，而不应过多地削减或盲目撤销。还要抓好制度建设，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活力，使基层组织建设真正得到落实。

二是建立新的党员管理机制，促进党员在实现党的中心任务中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邓小平认为“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③走出自己的新路。过去实行计划经济，党员的管理规范大多是基于党员的工作环境和活动方式相对稳定的条件下而确立的，属于一种静态管理。现在，劳动力的配置主要由市场调节，党员相对固定在某个地方和岗位的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转而在最能发挥其潜能的地方和岗位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22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

上流动，并且经常发生，有的还很频繁。在这种情况下，静态管理显然不适应了，因而必须改静态管理为动态管理。建立和实施与新形势下党员的活动范围、活动方式相适应的动态管理规范，以利于党员放手参与竞争，在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建功立业，在有效的管理和约束中受到教育，保持党员的先进性，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和战斗力。

三是建立新的干部管理机制。在当前的新形势下，干部的管理、领导班子的配备，决定了基层单位两个文明建设的好坏，成为改进基层党组织活动内容和工作方式的基本环节。新的干部管理机制的建立，首先必须解放思想，冲破老框框，树立起大市场中的人才观念，打破常规去发现和使用人才，“对那些真正有本事的人，要放手提拔”。^①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把他们放进领导班子特别是重要岗位，使人民感到我们是真心诚意地在搞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真正做到疏通渠道，开源节流，汇集人才。其次是努力形成全方位的干部培训网络，把干同学结合起来，把学同干挂起钩来，做到博学与精学相结合，组织学习与自学相结合，岗位轮训与脱产培训相结合，使干部培训教育机制走向正规化、系统化、科学化。再次是建立健全各种奖惩制度，形成人人力争上游的竞争机制。干部管理中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调动干部的积极性，高质量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因此，新的干部管理机制必须实行有效的干部奖惩制度。针对各级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许多事情无人负责的现象，邓小平主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18页。

张“要通过加强责任制，通过赏罚严明，在各条战线上形成你追我赶、争当先进、奋发向上的风气”。^①主要是要把奖惩同干部的实际工作及个人利益切实联系起来，真正做到奖优惩劣，形成后进赶先进、先进更先进的开拓奋进的新局面。

坚持分类指导，明确责任，理顺关系，采取新措施，抓出新成效

“经常检查和改进基层组织的工作，是党的领导机关的重要政治任务。”^②从目前对基层党建工作的具体指导看，如何按照新形势的要求，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使之在改进中加强，在发展中提高，我们的工作还存在许多不适应的地方。邓小平曾经指出：“无论在城市和农村中，许多领导机关，往往只忙于指使基层组织执行一项又一项的任务，却很少去检查一下究竟这些基层组织是在怎样地在那里工作着，很少给基层组织中的党员以具体的教育和帮助。”^③主要表现是搞“一刀切”，一般化的号召多，原则性的要求多，照抄照转的措施多，具体的指导帮助少，使基层党的工作无所遵循，甚至“打乱仗”。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分类指导，明确责任，了解基层党组织工作存在的问题，帮助他们分析问题的原因，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1—15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53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53页。

找出解决的办法。

首先，建立严格的责任制，明确加强城市基层党组织建设责任主要在市委，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关键在县委。这是对基层党建实施分类指导的重要组织保证。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严格的目标考核责任制，把各级党委书记作为基层党建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将是否及时“得出改进对于基层组织的领导的必要的结论”^①作为其称职与否的一个重要依据，一级抓一级，切实履行职责，负起责任，使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其次，突出重点，加强具体的指导和帮助。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党组织，要重点指导研究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如何发挥政治核心作用、怎样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机构如何设置、工作方法如何改进等新问题；对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等新的经济组织的党建工作，必须强化指导，加大力度，突出搞好建立健全党组织，扩大党的工作的覆盖面，理顺隶属关系，明确管理职责，以利于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党组织的领导和管理，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对农村和街道党组织，基本目标是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促进农村和街道各项工作的全面进步为重点，加强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基层政权建设，增强凝聚力和战斗力；至于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单位的基层党组织，重点则是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行政首长负责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53页。

制的领导体制，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把他们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同心协力发展各项事业。

第三，上级领导机关要爱护和帮助基层干部。关心群众、爱护干部，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加强和改进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邓小平几次谈到，我们的历史经验是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关心群众、爱护干部。“过去领导同志到一个单位去，首先到厨房去看看，还要看看厕所，看看洗澡的地方”。^①这个问题不是说一句话就可以解决的，要做许多踏踏实实的工作。在基层党组织工作的干部很辛苦，上级的各项指示任务，最终都要由基层干部带领广大群众去执行和完成。就农村而言，征粮、征地、派款、派工、修路、修水利、计划生育等等，各项工作都要由基层干部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去完成。他们在工作中难免要碰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情况比过去复杂，会遇到许多以往不曾有的难点和疑点，更需要上级领导机关的指导和帮助。特别要在政治上和生活上关心爱护基层干部，支持他们的工作，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使他们进一步提高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自觉性，真抓实干，在解决新问题中开拓前进。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28页。

用改革的精神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还必须切实改进方法，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继承与创新、形式与实效等关系，提高党的活动的有效性、针对性

开会、学习、谈心，是过去基层党组织活动的主要方式，今天我们的有些活动也仍然采取这种方式。但在新形势下需要改进和创新，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许多事实说明，工作方法很重要，方法不当，不仅达不到预期目的，有时还会带来负效应，影响基层党组织的活力。这正如邓小平所提醒的：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那么，如何去改进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的积极倡导下，广大党务工作者勤于实践，勇于改革，积极探索了许多新方法。

第一，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一是继承和创新的关系。邓小平认为，继承传统和开拓创新是辩证的统一，对党的优良传统、方法、经验和作风，必须继承与发扬。但也必须看到，光靠老经验、老办法已经不够，要积极研究新情况，摸清新规律，创造新经验，解决新问题。二是统一规定与自主安排的关系。在一定范围或一个时期内，上

级党的领导机关要根据党的中心工作，提出贯彻意见，作为统一的规定和要求，但必须考虑基层党组织的特点，让他们从实际情况出发，自行安排抓好落实。三是形式与实效的关系。不能图形式，搞应付，更不能搞那些看起来轰轰烈烈，听起来热热闹闹，而实际对党的自身建设没有好处的形式主义。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运用切合实际的新形式来增强有效性。

第二，党的活动必须服从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融为一体。这里，主要是围绕所在部门和单位的改革发展及经营管理来开展党的工作，要求党员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方面敢闯敢试、吃苦在前，成为行家里手；党组织积极参与经济工作的重大决策，发挥好保证监督作用；围绕利益方面的难点，注意化解矛盾，消除压力，在形成良性竞争机制上下功夫；围绕思想观念的新变化，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包括：社会协商讨论的方式；提倡平等讨论、互教互学的方式；注意区别对象、分类分层次施教；建设文明单位；举办业余党校等灵活形式，以及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为原则的疏导方法，等等，使之更贴近实际，更富有生机和活力。

第三，运用新载体，把基层党建活动搞活。历史上我们运用得最熟练、最起作用的群众运动这一活动载体，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已难于奏效，必须寻找新载体。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已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多次指出因为时代不同了，条件不同了，对象不同了，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同。只有改进才能真正适应新时期的发展需要，切实

抓出成效来。比如，以文化为载体，大力推进企业文化、社区文化、街道文化、校园文化、家庭文化等一系列文化建设，把基层党建的活动内容和思想政治工作寓于上述文化建设中，创造健康文明的精神氛围，使人们从中受到启迪和感召，激发树立健康向上的理想、道德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形成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思想侵蚀的良好环境。还有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类活动为载体，如党员演讲比赛、革命歌曲电视大赛、学理论知识竞赛、形势研讨，等等，精心策划，周密组织，赋予它们多种教育内涵，使广大党员和群众既乐于参加，又从中受到教育，增强感召力，提高有效性。

三、在改革开放中加强党性锻炼， 提高党员干部的素质和能力

加强党性锻炼，提高党员的素质，是我们党的建设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更具有重要意义。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尤其重视和关心提高党员队伍的素质，他从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高度，就新时期党员的党性锻炼和重新学习等问题，作了许多精辟的论述，特别强调“党的任务是要一步一步地提高党员的觉悟，使他们在思想上行动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把

这一任务作为自己的经常任务”。^①为此，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把“提高素质，增强觉悟”作为新时期各级党组织建设的一项基本目标，要求党员干部在改革开放中努力加强党性锻炼，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和能力。

**加强党性锻炼，提高党员干部素质，不仅是
保持我们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使党经受住
执政和改革开放考验的大事，而且是完成党的任
务的关键**

党性，作为一个政党固有的本质特征，一是体现在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上；二是具体体现在每个党员的思想、言论和行动中。每个党员的党性锻炼程度，不仅决定着党员党性觉悟的高低，而且直接影响着党的队伍素质的高低。

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高度讲，只有加强党性锻炼，才能保持我们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经受住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作为工人阶级先锋战士的共产党员，是历史上最先进的革命者。但是，我们共产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也就是从中国社会中产生的，还经常和这个社会一些残存的旧东西接触，会或多或少地受到旧社会的思想意识和习惯的影响。因此，共产党员必须加强自己的党性锻炼，不断改造和消除自己身上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58页。

的一切陈旧的落后的东西，形成共产主义的新思想、新意识，保持应有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使党的肌体更加健康有力，进而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同时，随着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形势发展，我们党的任务更加艰巨，广大党员面临的考验也更为严峻，“合不合乎党员的资格，合不合乎党员的条件，这个问题不只是提到新党员面前，也提到一部分老党员面前了。”^①有些党员在改革开放的考验面前打了败仗，消极腐败现象比较突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忽视党性锻炼和修养，无产阶级思想少了，非无产阶级思想占了上风。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努力加强党性锻炼，自觉用无产阶级思想去战胜非无产阶级思想，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

从新时期党员必须具备的条件上讲，只有加强党性锻炼，才能使自己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一个人组织上入了党，不等于思想上真正入党，只有不断加强党性锻炼和修养，才能保持自己的先进性，解决思想入党的问题。这种不断锻炼和修养，不仅仅是对“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的那种人，即便是入党时候具备党员条件的，或者是当了什么先进的，都同样需要。因为社会在发展，形势在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和改造。另外，由于党所处的环境地位发生了变化，我们党员的思想也会变化，有些人打过仗、立过功，当了英雄模范，有的当了先进典型，甚至被列为接班人的人选，但由于放松了思想改造和党性锻炼，结果犯了错误，甚至腐化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69页。

堕落。这种现象，在改革开放以来并不少见。所以，每个党员都必须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坚持党性锻炼，全面提高素质，才能跟上新时代的步伐，成为历史前进的动力，保证党的任务的实现。

加强党性锻炼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自觉的过程，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特别要加强理论修养、思想道德修养、优良作风修养、组织纪律修养，以及科学文化和业务素质的提高，以全面提高党员、干部的素质和能力

加强理论修养，是加强党性锻炼的首要问题。必须把提高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自觉性和水平作为理论修养的核心，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我们要用马列主义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指导，辨别是非，认清目标，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同时通过学习，更换脑筋，灵活地分析和解决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成为坚持改革开放、搞好经济建设、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先锋战士，做一个头脑清醒的革命者。

二是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这是思想和道德修养的核心内容。根本点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去战胜我们头脑中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用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树立共产主义的人生观、权力观、苦乐观

和价值观，保持共产党人思想上的纯洁性。党员、干部思想道德修养好坏和党性觉悟高低，事关党的事业的成败。因此，邓小平告诫我们，切不可把这个问题看作是“软任务”，说起来重要，做起来又是另一回事。其实这个“软任务”硬得很，很多事情办不好，都是因为这个“软任务”没有完成好。

三是加强优良作风的修养。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整套作风，包括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谦虚谨慎的作风、实事求是的作风、艰苦奋斗的作风、公道正派的作风，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党的优良作风，也是我们党的巨大政治优势。邓小平高度重视党的作风问题，多次强调党员和干部“继承和发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等优良作风。要使他们懂得……不只是有了业务知识就能解决问题，还要有好的作风”。^① 在新形势下，发扬优良作风，纠正不正之风，消除腐败现象，是党员加强党性锻炼的重要课题。我们每个党员干部只有自觉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党组织才有凝聚力和战斗力，党才能改造和转变社会风气，加快我国现代化的进程。

四是加强组织纪律的修养。严格的组织纪律是实现党的集中统一的根本条件。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革命，就是靠纪律，而且是自觉的纪律。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最好的风气就是这个”。^② 并反复强调所有的共产党员都要增强党性，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0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08页。

遵守党的章程，“一个党如果允许它的党员完全按个人的意愿自由发表言论，自由行动，这个党当然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意志，不可能有战斗力”。^①因此，每个党员必须自觉加强组织纪律修养，服从党的领导，遵守党的纪律，执行党的决议，反对和纠正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等现象，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同党保持一致。同时，党员在党纪面前人人平等，不论职位高低、资历深浅、功劳大小，都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在党内不允许有不受党纪约束的特殊党员，不允许把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而这些，都得靠加强党性锻炼，提高纪律修养来保证。

五是加强科学文化和业务素质的锻炼和修养。学习科学、文化和业务，是党员必须履行的义务之一。邓小平指出：学习好，才可能领导好高速度、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此，他要求在全党进行一次重新学习。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必须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和具备一定的专业能力。没有的要学，有的要继续学，实在不能学、不愿学的要调整。他认为，一个共产党员不认真学习专业知识，在本职工作上长期当外行，就不可能对四个现代化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其所谓的政治觉悟和先进性也是空谈。我们要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必须大力提高党员干部的文化、科学技术和业务水平。每个党员应把学习和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当作党性的要求和必备的修养，努力学习科学文化，学习经济和管理方面的知识，懂技术、会管理，做到又红又专，成为政治强、业务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1页。

精、纪律严、作风正的有真才实学的所在岗位的行家里手，在新时期更好地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第十二章 走依靠改革和从制度上建设党的新路子

注重从制度上建设党，是邓小平执政党的建设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突出特点。过去，人们一般只注意从政治、思想、组织、作风方面去考虑党的建设问题。通过对“文化大革命”历史的反思，邓小平深刻地指出，对我们党来说，要从根本上防止发生类似“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灾难，就要通过加强党的制度建设，使党和国家形成一整套好的制度。同时，如果我们只是依靠政治运动来搞党的建设，势必会造成党的思想、组织上的混乱，以及党内斗争的扩大化。因此，邓小平提出要走出一条不依靠政治运动，而依靠改革和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的新路子。无疑，这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一个突出的新贡献。

一、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 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强调制度问题的重要性，既是对我们党历史
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又是改革开放新形势的客
观要求**

1980年8月，邓小平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中，对全党振聋发聩地强调了制度建设这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他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①

邓小平对制度建设问题的论述，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后提出来的，是对毛泽东建党学说的丰富和发展，对新时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

期执政党的建设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制度，一般是指有关行为的法规和标准。党的制度，就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必须遵守的办事规程和行为准则，亦即党内各种行为规范的总和。党的制度大体上有：一是组织制度，主要包括选举制度、机构设置制度、发展和管理党员制度、基层组织制度、干部制度、纪律处分制度等；二是领导制度，主要包括党委集体领导制度、党对各级组织领导制度、党组制度、党政分开制度等；三是工作制度，主要包括请示报告制度、会议制度、档案管理制度、保密制度、财务制度、文书制度等；四是生活制度，主要包括民主生活会制度、学习制度、监督保障制度等。

强调制度问题的重要性，是对我们党历史的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我们党早期，大体上是从一大到六大，党的制度建设，主要是抓了党章这一党的根本法规的制定和修改。中央到了延安，在党的七大期间，抓了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的建立。但由于是战争年代，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党成熟状况的影响，还不可能制定出较为完整的党内规章制度来，只能说是有了一个较好的框架，为党的制度建设打下了基础。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后，最初几年，基本上是沿用过去的传统制度。在党的八大上，我们党着眼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任务，认真考虑了党的制度建设问题。但是，由于后来“左”的思想在党内发展，主观意志被无限夸大，把阶级斗争说成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纲”，把政治运动作为解决一切矛盾的主要方法，这就使党的制度建设受到空前的破坏。特别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治占了统治地位，领导人的一句话，

就可以否定党章国法，根本就没有任何制度可言。邓小平正是针对党和国家民主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而提出制度建设的。他尖锐地批评了个人决定重大问题，凌驾于组织之上，权力不受限制，搞人身依附关系等家长制、“一言堂”作风，指出从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来说，这些弊端主要表现为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官僚主义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这些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将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所以，邓小平多次提出，为了避免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再发生，就要“从改革制度着手”，“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因为“制度是决定因素”。

强调制度问题的重要性，是改革开放新形势的客观要求。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而对外开放，一方面能把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管理经验引进来，另一方面却不可避免地让资产阶级某些腐朽的思想观念乘虚而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首先要求要用制度来扫除改革的障碍。改革的障碍，大体上一是“左”的僵化的东西，二是右的习惯势力，三是以改革为名，谋私利为实等。像对待后者，如果没有严格的制度，怎能避免有人钻两种体制转换的空子，以权谋私，用损害国家和人民长远的根本利益的手段，来谋取小团体的利益和个人私利呢？其次，是要求用制度来保护改革的进程。改革必须有序地进行。无序，就是混乱，就要出大问题。而有序，最重要的是决策有序，这样才能保证

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如果没有必要的制度加以规范，让个人说了算、拍脑袋决策，使错误的改革措施得以出台，改革不是要夭折么？第三，是要求用制度来巩固改革的成果。改革是亿万群众的事业。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创造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和方法，取得了丰硕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这些，都要求用制度加以规范化，以利于稳定和推广。正因为这样，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就对新时期执政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思路，要求我们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来。

制度问题的重要性，还可以从制度本身的特征去加深理解

制度建设，是从人治走向法治的飞跃。制度问题的重要性，还可从制度本身的特征去加深理解。作为制度，它按照一定的程序制定形成后，就有强大的约束力，以调整党内关系，规范党内行动，维持党内秩序，实现党的整体意志。这个党内之法，具有五个明显特征：

一是客观性。制度是人制定的，但绝不是随意制定的，而是遵照客观规律制定出来的。党的各种制度的制定，必须遵循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新时期的目标、任务，从党的自身建设实际出发，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所以，制度建设是党的建设自身规律的反映，绝不是某个领导人意志的

产物。制度一经制定出来，就应当成为超越个人意志之上的法定规范，并具有相对的固定性和可检验性，不应当受领导者个人或领导层意志所左右，而是建立和维持改革开放中党内新秩序、新关系的有力武器。

二是权威性。既然制度建设是党的自身建设的客观要求，是通过一定程序的民主与集中之后制定出来的，这就是说，制度是党的意志的体现，因而就有严肃的权威性。特别是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准则》是党内的重要法规，对全党都具有约束力，所有党组织和全体党员，任何时候都必须严格遵守，认真执行，决不允许打折扣，搞阳奉阴违。至于党的具体制度，同样具有权威性，它不是可执行可不执行，更不是可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如果违反制度，轻的要批评教育，重的要受到惩处。对任何违反制度的行为都绝不能姑息迁就。

三是平等性。我们说在党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同样，在党的制度面前也是人人平等。这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平等，是对不平等而言，是对特殊而言。制度一经制定，就有相应的效力，不论是谁，职位多高，资格多老，人人都要遵守，领导干部要遵守，普通党员要遵守，决不能有不受党的制度约束的特殊人物。换句话说，就是只有真正实行在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才能克服以言代制、以言废制那种重人治不重法治的现象，解决从严治党的问题。

四是规范性。制度本身就是一种规范。党的制度在调整党内关系和党内行为时，对有关的职责、权限、权利、义务、程序等，或是作质的界定，或是作量的界定，对于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哪些怎样去做，都有具体的规范，让党组织和

党员共同去遵守和执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党的制度就是要使党的自身建设规范化、程序化，从而排斥长官意志、以权乱法等专断作风，使之有条不紊地进行。执政党内部生活规范化、制度化了，国家生活才能走上法治的轨道。

五是稳定性。党的制度的制定，必须经过一定的授权机关，通过一定的程序和手续，取得一定范围的认可。同样，它的实施、修改和废止，也要经过相应的程序和严格的手续。当然，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有一个过程，但这种制度的变化绝不是随意变更，更不能朝令夕改，它制定出来后，就有相对的稳定性，在一定时期内不作大的变动，不会因时、因地、因人的变化而变化。可以说，制度是通过成文规章这种形式表现出来的秩序，它的作用在于克服无序状态，制止反序状态，纠正失序状态，使党的建设从整体到局部都有章可循。

毛泽东建党思想中，突出的一点是从思想上建党，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重大贡献。但是，由于受“左”的影响，过多地依赖从意识形态上调整党内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发展成为没完没了的“思想改造”和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使党内生活极不正常。所谓“思想批评从严，组织处理从宽”，偏重于道义上的谴责，而缺乏必要的制度约束，就使党的建设出现了极大的误区。邓小平高屋建瓴地看到了问题的实质，因而提出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在党的建设中要把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结合起来，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这就为发展毛泽东的建党思想、丰富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作出了新的历史贡献。

二、新时期制度建设的目标、 重点和应遵循的原则

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严肃地提出了制度建设问题，指出：“切实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对于党的正确路线的巩固和发展，对于党的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对于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十分重要。”同时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党的建设上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

这就是我们党依据邓小平关于党的制度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而提出来的新时期党的制度建设的目标。

党的制度建设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在新的历史时期，党所处的环境和肩负的任务有了很大变化，党的自身建设面临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对此，制度建设就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进行。

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切实解决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问题

改革党的领导制度，主要是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解决党如何领导和善于领导的问题。我们党是执政党，如何执政？过去曾强调过所谓“一元化领导”，把权力高度集

中于党委领导机关，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这样，就必然出现两种倾向：一是党的领导机关陷于事务主义，进而产生官僚主义，脱离群众；二是基层缺乏自主权，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很难得以调动和发挥。针对这种领导体制上的弊端，邓小平提出了要实行党政分开的原则，党章作了进一步的规范，明确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党的执政，即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其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政分开，是因为党与国家政权机关不仅性质不同、职能不同，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也不同。这就要求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以及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工作；而党自身主要是抓好民主的科学的决策，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时做好党自身建设的工作，党要管党，发挥全体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也就是说，领导制度改革目的是适应形势的发展和情况的变化，使党改进领导方式和方法，提高领导水平。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这些年来，改革党的领导制度按照党政职能分开的原则，在中央组织和地方组织中，重点抓了调整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机构，不再设立不在政府任职但又分管政府工作的专职书记、常委，撤销与政府机构重叠对口的部门；同时，进一步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等。在基层组织，则重点抓了企业党组织在新时期的地位作用问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中，广东在这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他们依

据“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坚持和完善厂长负责制,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指导思想,从国有企业、股份制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的实际出发,抓住特点,突出重点,研究企业的领导模式、党组织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方式,在“如何卓有成效地发挥企业党组织的保证监督作用”这个课题下,总结出许多有启迪意义的经验和做法来。总之,领导制度的改革是如何更好地做到“党要管党”,提高驾驭矛盾、总揽全局的执政水平的大事,必须在实践中积极而又慎重地搞好。

改革党的干部制度,建立起有利于优秀人才 脱颖而出的有效机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关于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邓小平用战略的眼光选准了突破口,就是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邓小平身体力行,作出表率。以后,他又从多个角度论述干部制度的改革,包括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任期、离退休等。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提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培养和造就一支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宏大的党的干部队伍。他站在保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历史高度上,要求对新老干部的交替与合作制度加以规范。根据邓小平关于改革党的干部制度的思路,这些年来,主要从两个方面加大力度,深化改革。第一,是全面提高现有领导干部的素质。作为执政党,现代化建设需要党的干部具有较强的总揽全局、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但从实际看,大多数干部还很不适应,存在较大的差距。

这就要改变重视用人、忽视育人的偏向，把培养教育干部作为一项事关全局的基础性工作抓好。这里，首先是要抓好德，要求忠诚于马克思主义，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努力成为讲党性、顾大局、能驾驭全局、会治党治国的政治家。其次是要抓好才，就是要有知识、懂业务、成为胜任本职工作的内行，能够深入实际，联系群众，协调各方面的力量，不断开拓工作新局面。为此，就必须根据不同层次领导职务的不同要求，改革和加强干部的教育、培训、考核等制度，全面提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第二，是抓紧培养和选拔优秀的年轻干部。要求我们站在保证党的政策的连续性、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高度来抓好这方面的制度改革。主要有：破除论资排辈、求全责备、迁就照顾等陈旧观念，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把年轻干部放到关键的领导岗位压担子，或放到条件艰苦、情况复杂的环境中经受考验，放手让他们在实践中锻炼成长；扩大选拔任用领导干部工作中的民主，完善干部的考核、交流、升降、奖惩等制度，形成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等等。广东的实践已充分证明，哪个地方人才辈出，那个地方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就搞得朝气蓬勃。

健全民主集中制，形成全党统一的意志，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邓小平指出，从50年代后期开始，民主集中制就贯彻得

不够好，这是因为“没有形成严格的完善的制度”。作为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民主集中制被破坏，必然导致产生像“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错误，给党和国家造成巨大灾难和沉痛教训。因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非常重视这项制度建设，使党内政治生活日益正常。但从目前的情况看，还存在不少问题，作为制度，党组织都建立了，但实际上，民主不够和集中不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原因是我们有些同志对这一根本制度认识肤浅，或者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从制度建设的高度看，起点要高，用理论作指导，在充分认识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和组织建设中的运用的基础上，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在民主方面，主要是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现在的问题，一是民主渠道不畅，党员的意见、建议得不到及时反映，反映了也未能及时改进，这就影响了党员积极性的发挥；二是党员的民主权利得不到保障，党章规定的党员八项权利，不是被无视就是不被尊重，严重的甚至遭到践踏。对此，既要教育党的领导干部克服“一言堂”、家长制、个人专断作风，更要建立制度，用制度来疏通和扩大民主的渠道，用制度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行使。发展党内民主还有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实行民主决策，要求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不仅要建立领导、专家相结合的咨询、论证、决策机制，更要发扬民主作风，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及时吸取群众的智慧和首创精神，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正确的科学的决策。在集中方面，主要是强调“四个服从”。在这“四个服从”中，最重要的是全党服从中央。现在，主要是要用制

度来解决一些党员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克服自由主义；解决班子中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自行其是的现象，克服软弱涣散状态；解决某些地方组织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克服分散主义，等等。

加强党风廉政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反腐保廉的防范、约束机制

邓小平曾经多次强调，党风问题是关系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问题。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紧迫性、长期性和艰巨性。他指出，在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中都要反腐败，把端正党风和加强廉政建设作为一件大事，下决心抓出成效，取信于民。他特别强调，廉政建设要靠教育，更要靠法制。邓小平这些论述，为我们党的廉政建设从根本上指明了方向。关于党风上的制度建设，这些年来可以说是普遍重视，全面开展。包括改革领导制度，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健全党内民主制度，肃清封建主义残余；改革人事制度，克服任人唯亲的弊端；完善监督制度，纠正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等。特别是用制度来规范反腐保廉约束机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总结出许多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做法来。如强化监督方面，一是严格两种生活会制度，即党小组生活会制度和党的各级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制度，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防止产生不接受任何监督的特殊党员。二是坚持和完善干部民主评议制度，通过干部述职报告制度、考核评议制度等，让领导干部直接接

受党员和群众的监督。三是坚持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制度，及时发现党的政策在贯彻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以纠正偏差，消除消极面。四是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加大透明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群众知道。五是强化专门监督机关——纪委的职能，集中力量管好党纪，协助党委管好党风，等等。这样，就构成了包括党内监督、行政监督、法纪监督、群众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在内的多层次、多方面、多途径的监督网络，健全了党内和党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监督制度，强化了反腐保廉约束机制，有效地防范了以权谋私，制约了行业不正之风。

制度建设是一项十分严肃认真的工作，对此，邓小平还提出了必须遵循的一系列原则。包括：制度建设必须有利于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制度的制定只能巩固和加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强化我们党作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的作用，而绝不能弱化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制度建设要立足于改革。我们党在制度建设上有优良的传统，又有深刻的教训。现在进行制度建设，是要克服现行制度的某些弊端，而不是全盘否定。对体现我们党政治优势的好的传统制度，要加以肯定和发扬。立足于改革还要体现在适应新形势上，即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因地因时充实、完善、健全各项具体制度；党的制度建设要与思想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制度在于规范人的行动，而人的行动是受一定的思想所支配的，思想素质越高，他执行制度的自觉性就越高，相反，人的素质低劣，即使有好的制度，也可能成为一纸空文。因此，制定制度与思想教育绝不是彼消此长、互相矛盾的关系，而

是互相促进、水涨船高的关系。我们要把握好两者的辩证关系，克服片面性，防止让一个倾向掩盖了另一个倾向；党的制度建设要与国家的法制建设相衔接。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一个党员，必须遵守党纪、政纪和法纪，党的制度是属于党纪的范畴，它不能与政纪、法纪相抵触，更不能以此来代替政纪、法纪，如果涉及到这三者关系的调整，一定要严格按照有关程序进行。这样，才能保持制度建设的科学性和严肃性，等等。

三、大胆学习、借鉴外国一切有用的东西，逐步建立健全“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由于过去长期忽视、起步晚、理论准备和实践准备都不足等原因，当前制度建设还存在不少问题

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的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是我们党进行制度建设的纲领性的文件。但是，由于当时政治体制改革刚处于起步阶段，所以党的制度建设还没有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直到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召开，才首次提出，在

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党的建设上要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自此,党的各级组织在制度建设上做了大量的工作,总结了不少成功的经验和做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从总的情况看来,由于过去长期忽视,起步晚,理论准备和实践准备都不足等原因,这就使当前制度建设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

——缺乏科学性和权威性。原因主要是制定得草率。有的党组织开一次会就制定一项制度,有的领导班子变换一次又重新制定制度,甚至某个领导人想到某个问题就制定一项制度。随意性大的制度必然缺乏严密性、统一性和科学性,在理论上就经不起推敲,在实践上就难于执行。

——缺乏操作性和可行性。这主要是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在作怪。制定制度有的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有的是做个样子给人看,有的连质的定性和量的界定都没有,有的对什么是实体性制度、什么是程序性制度都不知道,这样制定出来的制度,就只能是“写在纸上,讲在嘴上,贴在墙上,就是落实不到行动上”。

——与思想教育脱节。制度是靠人去执行的,而人的素质却有高低,如果是素质低的,再好的制度也会走样。现在有些单位,制度一定就以为什么问题都能解决,而没有通过组织学习、开展教育、进行培训,去提高党员的思想认识和觉悟水平,结果,你定你的制度,他搞他的不正之风。

客观地说,党的制度建设如同国家的法制建设一样,现在许多方面还处于待完善阶段和待健全阶段,甚至还是起步阶段,可以说,一些规则还模糊,一些法度并不严谨,一些

章程还互相矛盾，一些规范还受领导人的意志所左右，一些地方还是人治大于法治，等等。这就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制度建设中的这些问题，认真加以解决。

解决现存问题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大胆学习、借鉴外国制度建设的经验，逐步建立健全有中国特色的更加定型的制度

为什么要借鉴外国的东西？

拿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无论是政党的制度建设还是国家的法制建设都搞了几百年，才达到现在的水平。像某些国家，不论政坛如何风云变幻，甚至出现政权更迭、领导人变换，但它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是稳定的，因而社会仍然是发展的。由此看来，这些国家已从人治的历史阶段迈进了法治的历史阶段。要用全人类的知识武装自己，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邓小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更提出了开放是我们的基本国策，要求我们学习发达国家一切有用的东西，其中，就包括了向这些国家学习如何进行制度建设。

广东各级党组织发扬“闯”和“试”的精神，在许多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借鉴和探索。

以廉政制度建设为例，新加坡和香港就很有特色。

新加坡是一个高度法制化的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相当完备。据不完全统计，现行法规达400多种。其中，关于廉政的制度规定更是非常严密，覆盖的范围包括政治生活、经济

生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收受礼品到呈报财产，从借款贷款到购买股票，从接受宴请到兼职工作，从进舞厅到入赌场，即使是个人衣食住行，凡是涉及到有碍公务员廉洁之处，都有详细、具体的规定。如果说，“多”是新加坡廉政制度的第一个特点，那“快”就是第二个特点。由于实体性法规十分具体，是与非、罪与非罪的界限就划分得很清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是违法，什么是犯罪，对照规定就一目了然；加之程序性法规的配套，就有高度的可操作性，一旦有违犯现象出现，就能迅速简便地从快处理。第三个特点是“严”。“严刑峻法”对于新加坡来说，绝不是一句空话。上自政府高官，下到平民百姓，违法乱纪，一样从严查处，决不姑息迁就。这些，就使新加坡的政府公务员牢固确立“不想贪”、“不能贪”、“不敢贪”的观念，保持了政府的廉洁高效。

香港廉政则是以其专门机构——廉政公署而闻名于世。早年，在这个殖民地社会中，贪污受贿可以说是无孔不入，成为困扰港英政府的一个突出问题。1973年10月，当时的港督麦理浩在立法局上宣布成立一个新的、独立的反贪污机构，即香港廉政公署，自此，就掀起一场持续不断的“廉政风暴”。廉署地位特殊，独立性强，直接向港督负责，不属于政府公务员系列；廉署机构设置科学高效，如防止贪污处，其职能是专门设法堵塞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在组织和行政程序上的漏洞，以减少贪污受贿的机会；廉署的在职人员要求高，训练有素，工薪福利也较好；廉署的职权独特，可以直接调查可能导致贪污或与贪污行为有关的任何人；如抗拒或妨碍廉

署人员执行职责，即属违法；廉署采取“治标、治本、根除”“三管齐下”的方针，而把打击贪污分子的行动作为“三管”之首。廉署在实践中总结出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如举报，就有四条主要途径：一是电话举报，廉署的举报电话在香港可说是大热线，市民无人不晓；二是投函举报，可具名，也可匿名；三是上门举报，其举报中心全年的每日24小时都有人当值，举报者一到即得接见；四是由政府部门转交举报。举报处理程序严格高效，如需将举报转送其他监督部门处理，通常在24小时内办妥；一般若情况许可则尽快将调查结果通知举报人。这样，廉署的出现就形成肃贪倡廉的强大威慑力量，使香港社会的政风为之一新。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各级党组织和有关部门，多次派专人到新加坡和香港进行以廉政建设为专题的考察，取其所长，结合自身的实际，建立和健全了反腐保廉的机制，使党风廉政建设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以深圳经济特区来说，1988年3月，深圳经济罪案举报中心在全国第一家挂牌成立，被称为“检察工作贯彻群众路线的创举”。自此之后，深圳致力于激发党员和群众的参与感，建立起一个广泛而高效的举报投诉网络。以电话投诉网络为例，计有投诉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的电话41个（包括市长专线电话），投诉城市管理与卫生工作的电话18个，投诉交通、口岸管理的电话49个，投诉财贸金融的电话22个，等等。此外，在每个市场、交通要道、公共服务设施等，都在最显著的位置标示具体的投诉电话号码。这仅是就群众监督网络而言。深圳各级党组织还采取多种有效措施，同时抓好党内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社会监

督、舆论监督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约束机制，严厉惩治腐败，保持党和国家机关的廉洁，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特区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经济建设高速稳定地发展。

在制度建设中，我们还有许多方面可以借鉴。

比如，新加坡对公务员给以必要的待遇，以俸养廉，客观造成“不用贪”的良好环境。他们从1955年起推行公积金制度，工作年限越长，数额就越大，有保障退休生活、购买住房、家庭保险等多种功能。如果公务员贪污受贿，一经查实，你这几万、几十万的公积金就会被全部没收……

又如，西方的资产阶级政党一般是党籍管理松懈，党员观念较淡薄，界限较模糊，这对发挥组织的战斗力是不利的。但是，他们有一点颇突出，就是让党员享有较充分的民主权利，不仅作出有关规定，更在实践中实行民主的党内选举提名程序与差额选举，扩大党内事务透明度，为党员提供更多的直接参与机会。这种“粘合剂”就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党员观念不强的缺陷。

再如，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盛行弹劾制度，这是国家议会由政府高级官员犯罪或严重失职行为进行检举控告和追究责任一种制度。弹劾案成立，可以对受弹劾者实行罢免，取消其担任公职的资格，使之下台，直到追究法律责任。

当然，对这些制度不是生搬硬套地拿来，而是要结合我国国情从实际出发去“扬弃”。我国最大的国情是什么呢？一是共产党是执政党，二是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三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党的制度建设首先是要发扬我们

党的优良传统，在此基础上学习别人的经验。学习外国的经验要把好四个原则：第一，要有利于党员干部尽职尽责，当好人民的公仆，防止“公仆”转化成“老爷”；第二，要有利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真正让人民群众行使国家主人的权利；第三，要有利于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形成“能者快上，庸者必下，贪者严惩”的态势；第四，要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党风、政风，以此带出好的社会风气。指导思想明确了，在实际工作中就有计划、有目标地进行，考察透彻了的、成熟了的就先学，把握不准的或条件还不具备的就慢学，有副作用和消极面的就扬长避短去学，不符合我们国情的就不学。这样，经过不断的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我们就能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依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党的建设的新路子来。

后 记

本书以建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关于党的领导和建设的论述和实践活动为基础和主线，力求完整、准确地把握邓小平执政党的建设理论的精神实质和基本特征，对邓小平执政党的建设理论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阐述，同时也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进行了一些探索、发挥，旨在为新时期深入学习、研究邓小平执政党的建设理论，并运用这一理论更好地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和改进党的自身建设提供参考，尽一点微薄之力。

作为广东省《邓小平理论与广东实践研究丛书》的课题之一，本书从写作构想的提出、提纲的拟定以至整个撰写过程，都是在这套丛书的主编，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于幼军同志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他对此书提出了许多具体的、中肯的意见，还为本书写了序。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广东党建学会会长黄绥泉同志也对此项工作给予了热情的帮助。

本书的总体策划和具体组织工作由曹子鑣教授负责。各部分的作者分别为：总论曹子鑣；领导篇张小杰（第一～第六章）；建设篇周其若（第七、八、九、十二章）、任宝根（第十、十一章）。最后由曹子鑣、张小杰对全书修改定稿。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借鉴、吸收了国内同行专家学者的许多研究成果，得到了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江友德、广东人民出版社姜玉玲、广东党建学会黄玲的支持、协助，在此深表谢忱。

作 者

1995 年 12 月